

背荫河畔设魔窟

李茂森

背荫河村地处五常县城以北，省会哈尔滨之南，是拉滨铁路北段的一个小站，哈五（哈尔滨至五常）公路从村内穿过。交通方便。南靠硕大户山麓，东部丘陵起伏，西部则是一望无垠的平原。镇东有东南转向西南的一条小河，名背荫河，故村名亦称背荫河。

日军进驻背荫河之后，便召集日盛祥等商号头家和周围居民开会，会上松田宣布“三天内全部倒房子，皇军要占用”，然后布告全境。背荫河火车站东三里之内万余米宅地及建筑物全部被日军占用，然后在南部又强占 20 余垧麦田作为军用。随之大批的日本人——诸如宪兵队、守备队、警备队等便陆续开入。

正值日盛祥等搬迁之时，伪背荫河警察分驻所所长李阴明、警士关托祥便被紧急召去伪警察第八署（拉林警察署）开会，会上命李阴明和村长逢文会从 105 甲中每甲轮派劳工 20 名，为皇军修建所谓“中马壕”。“中马城”是以日军中马大尉的名字命名。

到冬天这里已经建成一座阴森巨大的城堡，南北 450 米，东西 230 米，共约 10 350 平方米。内外三层套院，三道围墙，一道护城壕。墙各高 5 米，上安刺线电网，外墙四角相望，各修碉堡型炮台一座，上置探照灯，壕深 5 米，宽 10 米。城周只留西和西南两个大门，西门直通火车站，西南门直通机场，铁路专用线也从此进入。

1936年(伪满康德3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夜10时许，“中马城”内突然气笛长鸣，探照灯四射，枪声、哇喇哇喇的喊声混作一团，日军、伪警察倾巢出动，打着灯笼火把分四路搜查，挨家敲门查夜，惊醒了熟睡的人们，日军、伪警察追问“红胡子的有没有？”“外人有没有？”

就在日军、伪警察四处搜查之时，杨家桥屯农民杨伯去地里看庄稼，发现两个带脚镣子的“犯人”，近前一问，他们说：“是从背荫河监狱里跑出来的，快帮忙把脚镣子给砸开。”又说：“跑出30多人。”杨便去阎家洼子屯借一把大斧，将两个人的脚镣子给砸开，二人往东跑去了。

抗联战士杨克俭从“中马城”跑到八家子时，让伪自卫团的尤宪斋抓住，押送到自卫团部，被团总吴连元枪杀，并把头砍下挂在树上。

同年8月，“中马城”因两次被我破坏，加之抗联的两次袭击，感到秘密已经泄露，不得不秘密搬迁。

(摘自《五常县文史资料》)

从背荫河畔到平房

榎原秀夫 田村良雄

秦正氏 萩原英夫

溥杰译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窃幸良机已到，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并把他们当作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

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这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寤寐以求的事情，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在背荫河充作实验的人员中，有几位抗日救国勇士，利用1934年夏季某日的暴雨，打倒看守，逃出了虎口，平安地回到杨靖宇将军那里。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石井因害怕泄露秘密和遭到中国人民的攻击，立即准备迁移。声称背荫河部飘失火，其实是自己放的火。在哈尔滨市郊南岗庙，哈尔滨陆军医院以南，修建数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继续进行罪恶活动。这个所谓的“医院南栋”，实质上就是在平房镇大兴土木，正式迁移的一个开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以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180户、800人撵到西面去住。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500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

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全部迁到平房来，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二辑）

组建七三一细菌部队

韩 晓 卞培林

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之始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的研究，真正大规模地搞起来了。其“功劳”应归于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改为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4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充当东京陆军医院军医。1930年，他受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铁山的派遣，以日本驻外武官的身份两次周游欧洲各地，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质是进行“特务旅

行”。在欧洲他看到了纳粹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深深感到日本没有细菌武器是“国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别是他了解到14世纪中叶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灾害使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至今还心有余悸，并把鼠疫菌排除在研究之外时，更增加了对鼠疫菌研究的兴趣。他认为，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应该单独研究并仅有的一种武器。回国后，他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少佐），继续在陆军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教官。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时得到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毒瓦斯和当时最新的关于细菌战、化学战的资料，极力鼓吹准备细菌战的必要性，叫嚷“战争专靠实力，这已过去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坏物质的有力武器，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指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还说：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恶性膨胀，战争狂热到了极点。他们野蛮凶残、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阴谋策划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于是，石井四郎研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反动当局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后晋升为少将）的推荐，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梶塙隆二等人的支持。

于是军部立即晋升石井四郎为军医少佐，并于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他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当时，它设在防疫部的一处地下室里，规模较小，石井四郎也仅有5名助手，然而，石井四郎在防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以细菌战为目的细菌研究和培养的罪恶

活动却从此开始了。

为了加紧细菌战活动，1932年底，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并晋升他为军医中佐。

1933年，为了扩大细菌研究活动，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对细菌研究室进行了扩建，不仅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机械室、变电室和仓库，而且还修建了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扩建之后，改称为“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这里实际上成了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大批的研究人员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等细菌的培养、使用和预防方法的研究；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在水面上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因此，在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里，设有培植细菌和研制细菌武器的秘密工厂。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反复地作着动物血液注入人体、人关闭在染有炭疽菌的屋子里、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等各种实验，还把中国士兵的尸体肢解，将头颅及身体各部分作为标本进行陈列；把囚犯饿死，将其躯体完整地保存起来，以备研究之用。他们还把被俘的苏联军人如何被残酷地致死，分别注入鼻疽菌的马如何发病而死，以及检验马尸的全过程等拍摄成纪录影片，给研究人员观看。除传授技术，宣传细菌战，让他们相信自己研制的细菌武器威力外，还以此培养他们杀人不眨眼的野兽的“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性格。

石井四郎为了防止泄露机密和避免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唾骂，对这些研究资料严格控制。他把200份实验致死的人员登记表作为绝密材料锁在地下室的一个特别房间里，责成其亲信保管，并且只允许直接参加实验的人员查阅，但也必须签

名具结，保证不将看到的资料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个研究所在研究和制造细菌杀人武器上有所成效，还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石井四郎洋洋得意地说，它是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

祸移中国东北

一、险恶的用心

就在石井四郎领导的“防疫研究所”恶性发展的时候，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亲自执笔写出一份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这个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并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细菌部队。

他们选择在“满洲”建立细菌研究基地，主要考虑到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它靠近苏联国土，气候也与其相仿佛，一旦与苏军交战，将会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但在设置的具体地点上，发生了争议。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把它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结果，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大本营的支持。1933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实质是细菌研究所的“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

“石井部队”建立以后，石井四郎一直没有露面。原来，这是因为他已成为各国情报机关关注的人物，他担心这次来“满洲”组建细菌部队的活动露出马脚。因此，石井四郎为了把石

井部队隐蔽起来，首先给它化名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并定了另一个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他还为了不让外界把自己和石井部队联系在一起，在“满洲医大”挂了个教授的虚衔，然后秘密地潜入哈尔滨，自己也改姓为“东乡”。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他就龟缩到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的活动。

二、背荫河的“中马城”

“中马城”是石井部队（即“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别称。它附属于石井部队，和石井部队本部几乎是同时建立的。

背荫河距拉林镇不远，是一个不足200户居民的山村。自从拉（法）滨（哈尔滨）线铁路建成并在这里建立车站以后，它就逐步地形成了农副产品的小集散地，村东头还办起了一些杂货店、果子铺、饭馆，颇有一派农村小城镇特有的景象。

好景不长。1932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选场址。他们来到背荫河，看中了这块宝地，决定在这里设“兵营”。“加茂部队”派来一个名字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于是，人们称它为“中马城”。

“中马城”占去了背荫河的半个屯子，堵塞了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它变成了与世隔绝极端秘密的军事城堡。它周围有3米多高的围墙，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挖有两米半宽的护城壕。它的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在护城壕下；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这里不仅中国人一律不许靠近它，而且还将其附近的交通全部切断，过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要将车窗帘布放下，严禁旅客向车外看望。这里的日军人员禁止一切外出，禁止使用日本真名，即使用化名同国内家属通信也得经

过关东军司令部审查。

被监押在“中马城”里的人脑海里的问号，过不长的时间，即死亡临头的时候，才找到了答案。他们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针管强行在他们的动脉血管上抽血。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没有使用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注射一种剧毒药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业人员拖去炼油，剩下的尸骨拖进炼人炉里焚烧，骨灰就地埋掉。在监狱西侧墙外，那座经常冒出令人作呕气味的浓烟的高大烟囱，就是“中马城”监狱的焚尸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一个日本雇员回忆说：“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这里的工作，当时化名叫细谷。被试验致死的爱国者，由日本人将其尸体秘密运到这里进行焚化，骨灰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

1933年，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那里进行活人试验的情况。

三、“中马城”秘密的暴露及其迁移

“中马城”的秘密在它建成后不久就暴露了。1933年中秋节夜晚，这里发生了暴动，30多人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幸存。他们投奔抗日联军后，把“中马城”的罪行揭露出来了。

这次越狱事件发生后，日寇就预想到秘密会暴露，但他们存有侥幸心理。因此，仍在这里继续进行着细菌试验活动。11月16日，远藤中佐还会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前去视察细菌试验的情况。越狱事件的发生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马城”的警戒，并通过日伪当局在外围实行“并屯政策”，对中国人民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中马城”越狱事件发生后，石井四郎感到自己把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是选错了地址，把它建在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游击区是一大失策。于是，他产生了将其迁走

的想法，但为了减轻或推卸自己的责任，就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此后，虽然坚持细菌试验活动，但由于抗联第三军对它不断的袭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促使石井四郎决心对“中马城”前途作出最后的决策。因此，是年年底，即12月27日深夜，石井四郎才用电话向远藤汇报了“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他们为了处理“事故”决定第二天去背荫河观察。

12月28日，远藤三郎中佐和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在哈尔滨没有停留，直奔背荫河“中马城”。“中马城”实行了戒严，前来迎接的有中马大尉、伊达（即太田澄）大尉，还有石井四郎的二哥细谷刚男少尉。在视察监狱的时候，石井四郎大发雷霆。细谷刚男少尉和中马大尉一个是管监狱的，一个是负责营区警戒的，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们吓得面如土色，一声不吱。伊达大尉是细菌研究专家，当初是石井四郎点名要来的，石井四郎对他很尊重；这次越狱事件，他又毫无责任。因此，他代替细谷和中马做了检讨，使石井四郎未再大发雷霆。远藤中佐听取了详细的汇报后，就如何吸取教训、加强警戒、尽快恢复研究实验活动以及如何听从处理等问题作了指示。远藤中佐和石井四郎还作出了“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而对“中马城”搬迁的具体打算，他们一句也没有透露。

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当时传说不一，有的说日寇不慎引起爆炸，有的说是抗联给炸的。为此，中马大尉还追查过责任，致使警备队的两个班发生了流血冲突。于是，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马城”转移。其研究人员先行撤走，留下部分守卫人员拆卸机器设备，装上盖着苫布的大汽车，运往哈尔滨。他们将拆下来的房架子、门窗等卖给了村民。至此，“中马城”变成了废墟。

据“中马城”日军留守人员透露，“中马城”的日军撤到“南栋”去了。“南栋”就是加茂部队的本部。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之角，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进行着秘密细菌研究活动。

盘踞平房

一、平房的历史沿革

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了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它在靠近平房屯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小站，定名为“平房站”。

自1936年日本侵略军的两支部队侵入东北，特别是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关于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第539号命令之后，平房地区成为军事要地，逐渐为人们所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随着其细菌战及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露，平房更举世闻名了。

平房站附近，除了铁路职工家属和小商小贩外，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平房镇街道两旁挂着日本入开办的“吉川屋”、“稻保”、“料理店”等招牌，还有日本人、朝鲜人开设的妓院等。

如果把平房站附近的平房镇和4公里之外的日本空军第八三七工部队的营区和4公里之外的日本第七三一部队的营区等特别军事区域的面积统计在内，平房地区的范围有120平方公里。

二、大规模的修建

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细菌计划，早在青浦河“中马城”崩溃的前夕就酝酿成熟了。于是，石井四郎以“意外的火灾”为由，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申请，不久，就得到裕仁天皇的批准。

其迁移地点是距哈尔滨市 20 公里的平房镇。1936 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了两支特种部队：一是侵驻哈尔滨市平房的石井部队（即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侵驻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满洲第一〇〇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石井部队的营建，是极为保密的一项重要工程，被称之为“特殊工业”。因此，只能由日本关东军御用的建设株式会社设计和施工。当时兼任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长春进行了工程招标，最后确定由 4 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它们分别派出了强有力的大林组、藤田组、松村组、铃木组，按期地开进了平房。尽管如此，对他们的信任也是有限的。为防止他们发现更多的秘密，在分配任务时，只让他们各自担负一个项目。这些施工单位中，最受器重的是铃木组。尽管它全员仅有 500 人，在日本千叶县是个很小的施工单位，但因为其头目铃木茂是石井四郎的同乡亲戚，所以也被从日本的加茂地方招募来，并承担内部工程，而把外体工程分给大林组、藤田组和松村组。1939 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这些施工组被陆续撤走，而铃木组却一手包办了收尾工程。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石井四郎对铃木组的信任，这就是：铃木茂的儿子“小铃木”是铃木组的材料员，他把施工用的钢材用汽车拉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变卖，中饱私囊。石井四郎发现后虽然很气愤，本应军法处置，但却没予追究，反而对铃木茂信任如故。

两年多的时间，石井部队的营建工程就全面完成了。1938 年 6 月，石井部队的人员和设备都移驻到这里。其机构得到迅速扩大，“南栋”改为它的第三部（即防疫给水部）。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平房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

战基地。

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远藤三郎少将，于1939年末亲临平房试验现场视察，看了平房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同1933年背荫河细菌试验场相比后，“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庞大的机构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历经3年的时间在平房建成。表面上看，它是背荫河细菌工厂的搬迁，实质上是石井部队的扩大。1938年6月，它的本部正式移驻平房，哈尔滨市内的“南栋”变成它的第三部。这时，对外的“加茂部队”的名称立即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后两个月，启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在1945年5月，当苏联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垂死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又将它改称“满洲二五二〇二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支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其侵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它的规模来说，远远超出了德国法西斯建立的所谓“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杀人工厂。就它在日本侵略军中的地位来说，名义上是编在关东军序列，而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因此，它的人员配备非同一般，比其他部队高出一等。它配有1名中将和4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全员为2 600余人。

七三一部队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年3月至8月又由石井四郎中将重任。

七三一部队下设8个部、4个支队、1个所。

8个部是：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

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

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市内宣化街，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重新组建的。

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

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

器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

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

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4个支队是：

林口支队，又称一六二支队，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榎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六七三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拥有日本研究人员136名，西俊英中佐兼任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五四三支队，设在海拉尔市西南3公里之地，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加藤恒则少佐任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六四三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名，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

1个所是：

设在大连市内的“满铁卫生研究所”，拥有日本研究、工作人员92名，由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它的任务是培植疫苗。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石井魔窟参观记

(日) 吉房虎雄①

溥杰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作出自掘坟墓的最后挣扎。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中将对中国人民日渐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慌了手脚，一过了年就带着从事防谍和“特移极”②工作的我（吉房虎雄中佐），到齐齐哈尔宪兵队巡视，归途来到石井部队。

人所皆知的石井部队，就是驻在哈尔滨市郊平房挂着“陆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招牌，实际上则是以活人作实验，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部队。往这个部队里送活人的，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它把由全东北各宪兵队逮捕的“间谍”、“不轨人物”中，“不肯招认”和“事无凭证”的人，也就是无法送法院的人，用“特移极”的名义送到石井部队这个活地狱加以残害。仅一年中，在宪兵队长申请、宪兵司令官的认可之下，就“移送”了300多名爱国人士。

到哈尔滨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原守和我便乘汽车离开名古屋饭店，驶过积雪的田野和土路来到石井部队驻地前方辟为机场的广场。石井和副官们都在那里等候着。

① 吉房虎雄，当时任关东军新京宪兵队长，后调往日本驻朝鲜军平壤宪兵队队长，升为宪兵大佐。

② 即作为细菌等项实验的活人，一般为日本宪兵队逮捕的“犯人”，为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称其为“特移极”，以表示“特别移送处罪”之意，并在文件上盖有“特移极”三字的朱戳。

二人周旋一阵过后，石井便向飞机方向发令：“开始轰炸演习。”只见东方三四百米处，一架飞机立即飞升，旋回着增加了高度。

石井望着上升的飞机说：“驾驶和轰炸都是由军医来做的。”石井的面庞被防寒外套和帽子所遮，看不清轮廓，但他那八字胡却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脸发青而且水肿，说话有些哑嗓子。看他那撅起的下巴和大声说话的神气，决不像个医生的样子。

石井说明道：“这是演习用的炸弹，最重要的是对它的炸裂声音进行调整。”原守总是似笑非笑地望着石井，稍稍点了点头。

“轰”的一声，炸弹在约500米附近的地方爆炸了。白色的烟雾在五六十米的地方飘荡着。炸裂声不太大。石井注视着发烟的方向，带着不自然的声音说：“啊！过高了。”

又“轰”的一声，第二颗炸弹在离上次稍远的地方，比方才稍低些爆炸了。因为天气寒冷，石井咧着僵硬的嘴唇，呲着使人看着难受的牙说道：“这回不错，必须这种程度才行。”

原守仍旧是点着头，显出怕冷的样子，向飞机的方向看着。我对于爆炸声“高”还是“低”怎样才算是“恰好”？又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等问题，都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没有提问的机会，只好默默地听着。

飞机由七八百米高空转了一大弯，快速地对着我站着的地方冲下来，就像是大铁块一样，毫无音响地从天而降。吉房觉得飞机仿佛就要撞着自己，正在拔腿不及的瞬间，飞机的螺旋桨发出声音来，飞腾而起，向东方消逝。石井的胡须上挂了冰茬，就像魔鬼呲牙似的难看。

“天太冷，请进屋谈吧。”石井一边向原守劝驾，一边迈步就走。很高的烟囱映入眼帘了。更看到一栋两层楼房围在青砖

高墙里面，两旁有纵横七八栋长形的房屋。既不像工场、又不像兵营，也不像监狱或医院，简直是使人莫名其妙的一座建筑。就在其中有 40 多位爱国人士，为了正义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以致都活生生地被感染上细菌，遭到血腥的屠杀。

原守问：“细菌有多少种？”

石井回答说：“因作战目的目标的性质不同，细菌的种类也有所不同。例如鼠疫、霍乱、伤寒……等等。”

我一边听一边在想着：不论怎样的大城市，都可能在大量细菌的空投下而归于毁灭，跟着两个人的脚步走着。进了大铁门，又向前走了约 20 米，就来到叫做办公室兼客厅的房间。石井请原守在屋中央的桌旁上首就坐，他自己在一旁相陪。

“承您帮忙，这种研究才顺利地进行着。”

接着，石井对我俩这仅有的客人，发出大声说：“说老实话，关于细菌战，我有这样的想法……”以此作为开场白，就继续地谈了下去：“细菌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效力极大。因为炮击和轰炸，仅限在落弹、炸裂的周围一定范围内，有对人马杀伤和对物体的破坏力。细菌战则不仅限于直接攻击的一点，可以从一点把效力圈无限扩大。再说炮击和轰炸的杀伤率并不大，即使负伤，还可恢复再参加战斗。细菌则是可以渗透人马的肉体组织，所以它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不死，健康恢复也极慢，很难立即参加战斗。而且，并不限于人马之类的动物，也可使水稻、麦子等农作物枯死，还可以使水和其他食物不能供人使用。第二个特点是需要的经费少。”接着他又说明例如日本这样经济力不足、产铁量小的国家，采用这种战法最为相宜等等。

他说得口角上冒出了白沫，就像螃蟹吐沫子那样，也全不在意。

我犹如受到催眠术一样听入了神，在心中暗想：日本对于

这样的细菌战，大约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毒瓦斯一样，将来日本作战以此进行急袭亦未可知，一定要好好协力去搞。

原守在静听着石井讲话，一边在纸烟上点火，一边问道：“细菌战的效果，当用什么方法来确认？我认为同一般战术的结合极为重要。”我对此问题很感兴趣，注视着他们二人的脸。原守和石井的面庞大小、容貌形相虽各不相同，但那青白的颜色和表现内心执拗的额上皱纹、尤其是那无法形容的冷酷无情的神气，却有共同之处。

石井把剩下的茶一口饮干，说道：“细菌战效果的鉴定问题，在华北作战时，敌方的记者就作出了有系统的调查……”大意是说从直接攻击的一点，渐渐能把效力扩大的状态充分搞明。再和水流、道路方向以及物资移动状态互相加以判断，也是必要的。

原守又问：“是啊，是不是意味着先用细菌攻击敌人，再做一般的攻击？”

石井说：“对把敌人赶到适合于细菌攻击的地方再进行一般攻击也是一个方法。一个美国人曾给我捎信说只有这件事，千万不要做！足见对此的恐怖。”

石井像是要抓住原守的心似地盯着他说：“给敌人以巨大的精神打击，是细菌战的第三个特点。对敌国内部加以广泛深入的攻击，对破坏作战意志，有政治上的极大效果。”

原守看了石井一眼，连连点着头说：“摧毁作战意志是极其重要的。”

石井领着原守走到右边门前说了一声：“为了预防危险……”就煞有介事地让他穿上橡胶外衣套、靴子，带上手套、口罩等，在他的前引下走过一段宽1.5米、长约15米的木板走廊。石井在稍右前方的暗室门口，向内窥了一下说：“这是跳蚤。是

搬运鼠疫菌的‘袖珍坦克’！”看到无数的跳蚤，结成比手掌大有两倍的黑褐色大块在蠕动着。

石井拿过一个玻璃瓶子，半面斜映着阳光补充说：“这是为了赋予这些‘袖珍坦克’以面向黑暗的习性。请看，不是都向那边移动着吗！”看那些跳蚤上上下下滚成一团蠕动着的形象，很像在大草原上缓缓移动着的羊群。

“骑兵说马是‘战友’，是‘活机器’，所以细菌战时才把跳蚤叫作‘袖珍坦克’。这样多的跳蚤，可以搬运几千万的鼠疫菌。石井部队拼命搜集的老鼠，大约每一只就能带几百万细菌，足见细菌战的威力之大……”我正在作种种无用的幻想，一边向里张望着，这时原守和石井已经迈步走了。走到过廊的中间，石井手指右边说：“在那里正用人感染鼠疫菌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加快脚步走着。原守回过头来向在后边紧紧跟随的我说：“喝，走的真快！”同时递个眼色让向右边看。

从过廊的中段又通向右边，两旁有像拘留所那样的成排的小房子。屋中虽然看不清楚，但靠左边的第一间安有铁条，是一个约2米平方的屋子。里面有一个身穿浅蓝色工人服、年约40岁左右的人仰面躺卧。在微弱的光线下紧闭双眼，面色苍白，犹如死人一般。不知是被捆绑不能动弹，还是被灌了安眠药而在昏睡？总之，像是贮尸室内的死尸一样。我的心里想着，这就是准备细菌战的第一步啊！

走廊尽处立向右拐，走不几步在那里有3个农民样的男子，都带着脚镣，坐在地上把两手放到两膝上，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年龄好像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一个脸色青白，另外两个脸晒得黑黑的，全瘦成皮包骨，从眼里发出愤恨的光。

从廊道向左一拐，石井边走边指着左边高板墙小声说：“在那里，放有‘实验材料’。”猛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药味扑鼻，旋

即走到右方解剖室的门口。有3个身穿白色工作服带口罩的军医把头聚集在一起，像在做着什么，他们看到石井，马上一齐行礼。里面究竟是怎样情形，固然不很清楚，只见是一间宽约3米的房间，地面是用水泥灌成的。也不知是水还是药湿淋淋的，军医都穿着橡胶靴子，在屋当中台上，放着解剖过的身腔、赤血犹新，清楚露出一根根的肋骨。

石井说，这是解剖室，指着里面靠左的灶口说道：“解剖过的尸体，用电热一烧即能完全烧尽，为免使尸臭残留，才特意把烟囱砌高的。”原守对向他敬礼的三个军医道了一声“辛苦”，和石井并肩走出。

“担任解剖的军医，甚至有发狂的，精神一松弛就会受不住。”石井鄙夷地说。

“怯懦还做得了什么事！”原守表示非常同意附和着说。

“这个研究非常重要，一天解剖一个，一年就需要365件材料……”当我正在这样心里盘算时，已从廊道向左一拐，来到像是参考室模样的房间。板架上排列着用酒精泡着的种种人骨和被细菌弄枯的小麦、水稻之类。石井立即走近屋角他新发明的所谓“石井滤水器”那里，泡沫横飞地说明道：“只需经过‘滤过’的物理作用，任何污水即能彻底消毒，乃是野战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个滤水器，就是为掩盖滔天罪行，称作“防疫给水部”的来由。在军、师团的“防疫给水部”的招牌下，被当做实验而牺牲的中国人尸体，接连不断被运往日本。仅在昭和15年(1940年)一年之内，在日本兰浦担任卸船工作的东京宪兵队，就用过四艘大货轮以上的船只。

“想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就是‘材料’不够，不能满足需要。例如在轰炸碉堡时，应该撒多远才保安全？诸如此类的事，都

非经过实验不可。”这是石井在做暗示：须把“特移极”多多送来！

原守也认为在今后的训练上非常重要，就答应来了。

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韩 晓 辛培林

一、“A”号实验队

据历史档案的记载，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班于1942年5月中旬成立了代号为“A”的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方法制造的疫苗，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对活人进行两种疫苗的对比性实验。实验地点在“特别班”7号8号牢房内。

在监号里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首先对他们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还有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这些活动是小林嘱托和细井技师亲手干的。

山内是第一次进到对日本人来说都是秘密的场所，一无所知，于是好奇地问班附小林准尉：“被试验的都是什么人？”小林恶狠狠地说：“是匪贼！这不是部队随便抓来的，都是经军司令部许可、由外部送来的死刑犯！用不着担心这些，只好好工作就是了”。

免疫处理20天后，进行了人体的感染试验。川名技师和千

叶技师把霍乱生菌（疫苗）混入牛奶里，让被实验者喝下去。感染用的霍乱菌，对人的致死量为1%克，而这次用量是2%克，因此，被实验者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疫苗的人中，除1人稍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二天就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被注射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的人中，多数上吐下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被预防接种的那4个人都先后发病，第三天皆死。后来，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这种类似的试验，都证明超声波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便命令菌苗班大量生产超声疫苗。

9月下旬，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发生了鼠疫。与此同时，农安县也发生了鼠疫。对此，石井四郎欣喜若狂，因为这对他们到预谋的鼠疫地区去进行实地研究大有好处。于是，七三一部队紧急组织工所谓的“防疫班”，石井四郎也亲赴疫区督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挂在长春街头。

石井要求菌苗班迅速提供大量的鼠疫菌苗。因此，菌苗班全员出动，昼夜不停地赶制。但由于混入的杂菌多，延迟了供菌的进度，渡边在电话里受到石井四郎的叱责。渡边说明设备条件有限，又遭到石井的大骂。为此渡边当夜乘火车去长春。可是，第二天早晨，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发现了渡边的尸体。传说他死于交通事故，但七三一部队的一些人都认为是被石井四郎害死的。这件事引起了菌苗班的人心浮动，不少人想离开七三一部队。为缓和矛盾，石井四郎一反常态，答应了菌苗班去大连卫生研究所的要求。同年12月，山内庸员和石井庸员带着4台超声波设备，先行去了大连。

二、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见闻和罪恶活动的自述

川岛队三谷班是鼠疫研究班。它不仅研究鼠疫菌种，而且还亲自做验证毒力的活人试验。上田弥太郎雇员就是曾经多次作过活人实验的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作为江田武一曹长助手的上田弥太郎雇员要到7号栋监狱去，对牢房受过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进行病变的观测。这是他的本职，天天要这样做。当时，江田提醒他在这里边不准随便说日本话，并带有神秘的语气解释说：“里边押有朝鲜人，他们都会日语。”江田又嘱咐他：“所拿的器械不能放在窗台上，注意不要把手伸到窗口内。那里的爱国分子很厉害哩！弄不好，他们抓起器械砸你，或者把你手折断。”

上田在入口处，出示了“特别许可证”，并领了一张“细菌试验观察记录表”。

上田跟着江田到7栋内南侧楼下的一个牢房前。这里边监押着5个人，他们的实际年龄都不太大，大约二三十岁，非人的折磨使他们变得苍老。一天前，他们接受了一次鼠疫菌液注射试验，如今虽然还能走动，但距离死亡为期已经不远了。上田按照号码分别把他们叫到观测窗口前，按观测记录表上的要求逐项检查，并进行填写。第三天，上田照例去这个牢房观察时，发现1名被试验者死了。他立即通知警备队人员，把尸体送进了解剖室，进行了解剖，最后，尸体被推进特别班的焚尸炉里烧掉了。

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上田又按照小林松藏技师的命令到7号栋内北侧楼下的牢房，对5名被试验者作观察记录。当他在一个被试验者右臂动脉管上抽血时，发现那个人胳膊上有注射针眼，知道对这个人的试验的时间不太久。次日，当1名被试验者

死后，上田跟随推尸小车来到解剖室。这次，他看到的是执行者采取的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这具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天下午，上田又看见两个被试验的人死了。其中一名年纪约30多岁，手指特别细，看样子不像经常劳动的人，是不久前被抓来的。其余两名幸运地活下来了，一周后复原。上田明白，人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在另一次或另一种试验中死去。

三、在城乡各地居民区的实验

在海拉尔以南150公里的鄂温克旗的辉索木，日本宪兵逮捕了企图杀死日本特务上牧赖三郎的蒙古青年牧民马萨尔等人。几天后，马萨尔等被杀害，两名青年被放回辉索木。被放回来的青年都发高烧，上吐下泻，两三天即身亡。接着，在辉索木就发生了类似的传染病，瘟疫在迅猛地扩散着。辉索木的牧民要求日本人给予防治，但他们不敢到辉索木去，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一种汉族常发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天神”也是无能为力的。结果，辉索木在这场瘟疫中死了240多人。后来查明，被放回的那两个青年在监狱里时，五四三细菌部队曾给他们进行了菌液注射，并让他们吃了放进了细菌的面包和奶茶。实际上，这是海拉尔支队在少数民族地区秘密进行的一次细菌传染实验。

这样的罪恶活动，不止一次，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这种试验把人和动物都杀死了。岛崎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

在日本侵略军盘踞中国东北时期，不少地方出现了病原体不明的无名热。因它多发生在虎林、孙吴一带，故称“虎林热”和“孙吴热”。当时在满洲医大任教的北野政次，对此很感兴趣。他企图将这种流行性出血热变为“细菌武器”。当他担任七三一部队长后，立即把它作为主攻对象。在他指挥下，第一部笠原班发现了其病原体是滤过性病毒的一种，是用显微镜几乎都看不见的极小的微生物，寄生于老鼠的“扁虱”体内，并以“扁虱”为媒介传染病毒。

1944年12月，北野在由各部长、支队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意地说：“将流行性出血热的患者血液给猿注射上，猿便呈现出和人同样的症状。寄生于流行地带鼠身上的壁虱，将其血液也给猿注射，同样可以发病的。”可见，北野政次已经完成了对活人进行的这种传染实验。

四、残酷的毒气试验

毒气试验是七三一部队在以活人为材料的试验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七三一部队的实验人员每天三次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试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

1942年2月，由于被试验者的反抗，打乱了技师伊藤的注射试验的计划。于是，他们气急败坏，使用毒气将7号牢房的人全部毒死。这个日本刽子手竟毫无人性地说：“正好要搞一次毒气试验，那就让他们先享受享受吧！”

同年4月，又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对活人的毒气试验。那天，第四部第三班正准备研制鼠疫干燥菌，要到第一班去取生菌。当上田弥太郎路过中心走廊时，突然闻到从7、8号牢房散发出来的浓厚的瓦斯气味，并被熏得睁不开眼睛，流着泪。

七三一部队在特别监狱里更大规模地使用毒气杀害被关押的人是在1945年。当时，7号牢房二楼的一个房间发生了暴动，发起者是一位苏联人。这些被关押者采取的办法是，有人向特别班谎报说那个苏联人得了病，把看守的日本人骗进牢房时举事。果然，在日本警备人员进入牢房内查看时，那个苏联人突然地跳起，抡起铁铸将其砸昏，随即夺得了手枪和开牢门的钥匙。然后各室也冲出牢房，但因整个监狱的大门锁着，造反的人在走廊里东冲西闯，跑不出来。于是石井四郎当即命使用毒瓦斯，把7号房的人全部毒死。为此，七三一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

五、冻伤试验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专设了一个冻伤研究班，班长叫吉村寿人，因此，对外称“吉村班”。它研究的内容有：人在什么样冰冷的气候下能冻伤，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治愈冻伤。

七三一部队研究冻伤完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中国东北。同时，它还准备北进苏联。这样，它就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严寒地区条件和在严寒地区作战问题，于是，七三一部队承担了预防和治疗冻伤的研究任务。

他们感到，冻伤试验以动物为对象，不能取得直接的效果，因此必须用人进行。

平房位于北纬46度，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天气最寒冷，有时低于零下35℃。吉村班常常利用这个天然实验场对活人进行冷冻试验，把作为“特别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苏联人，还有女的，从特别监狱押出来，关进桶式的大院里，让其带着手

铐脚镣，在端着上有刺刀步枪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别班队员的监视下，露出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试验。在严寒的室外，他们都陆续失去了知觉，当吉村班的试验者用木棒敲他们的胳膊和腿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将其一个一个地拖进室内。

吉村班对活人的冻伤试验，还经常改换方式。“抗寒”试验就是其中的一种，1940年冬天，细菌研究室的山内丰纪雇员无意中透过窗户发现，在吉村的亲自监视下，院子里有6名中国人都穿着单衣背着很重的物品，按照指定时间和路段反复吃力地走着，连续进行了十多天。山内丰纪观察发现，开始时他们都很健壮，后来逐渐地消瘦，当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活动也就停止了，不久便产生冻伤，人员也逐渐地减少，最后都无影无踪了。

山内丰纪联想到夏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吉村班的人迫使几名中国人作类似这样的活动，累得他们满头大汗，最后晕倒在地。他恍然大悟，那是进行耐热的实验。至于那些被试验者命运如何，山内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他想到是不会活着出去的。

后来，七三一部队的冻伤试验可以在室内进行了。1943年4月，上田弥太郎奉命到7、8栋特设监狱里给被试验者测量体温，突然传来一阵拼命的叫喊声，他看见2名警备队队员和3名冻伤研究班的人把1名中国人往一个玻璃屋里推。这个玻璃小屋就是吉村班的冷冻实验室。只见穿着棉衣的警备队员，强行将这个人的手浸在结冰的水盆中，不一会又给拽出来，旁边电扇开动着，那个人在痛苦中倒下去，造成了冻伤。至此，残忍的室内冻伤试验告一段落。不久，上田弥太郎在7栋监狱里看见了这个被试验者，他的手指已被切去，只剩下光秃的手掌了。

在1943年夏季，吉村班在四方楼外东北修筑了一座更大的

冷冻实验室。从此，冷冻试验随时都进行了。

解冻试验是很残酷的。七三一部队队员用凉水往一部分被试验者身上泼去，顿时他们的冻伤部位结一层冰，不一会，冰便融化了，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着。另一部分被试验者的手脚被插进温水或热水中，立刻红肿起来，有的还脱了皮。不少被试验者在折磨中死去；幸存者得不到治疗，冻伤部位溃烂，骨头变黑而被截去。

对冻伤进行“治疗”，也是一种残忍的试验。有的轻度冻伤者被涂上治冻伤的药膏后，虽然生命保住了，但留下的手指和脚趾都是残缺不整的。被涂上染菌药膏的人，他们处境更坏，往往死在得不到治疗的人的前面。

这样，七三一部队通过在被试验者身上进行冻伤、解冻和“治疗”试验，得到了资料。

六、撞死在解剖台上的中国少年

1943年，七三一部队想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特医监禁室没有这样“实验对象”。于是，他们按照北野部队长决定：春季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少年。但是为了避免造成意外的麻烦，他们没有从平房附近捕捉，而是采取了“外部进货”的办法。这个任务交给了七三一部队的宪兵官兵。在春日中一翻蹲窑的指挥下，“协防班”成员奔趁长春，在长春街头寻找。他们在归降关东军司令部的门前，发现了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中国流浪儿。于是，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并带回平房，关进了七三一部队的拘留所。当晚，春日中一来到拘留所，把这个小孩领走了。这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被带进解剖室后，被扒光衣服，推到铁制的手术台旁。几个“白色野兽”扑了过来，将其按在手术台上，用

扣带紧紧地固定住了挣扎的四肢。在小孩身上用酒精棉擦拭消毒后，便注入了麻醉剂，不一会他就失去了知觉。“白衣野兽”们找好部位，一刀将腹部切开，直到变成一具空壳的尸体后被秘密地投入炼人炉。

第二天清早，春日中一有意识地来到拘留所。当“协防班”人员问及那个小孩怎么处理的时候，春日中一假惺惺地说，他是一个要饭的流浪儿，经审查他没有什么问题，怪可怜的，昨天晚上就把他放走了。“协防班”的人都不相信春日中一的话是真的。

战后，原七三一部队的一名队员承认了这一事实：“把抓来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等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研、碎填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

七、阴森可怕的焚尸炉

随着细菌部队的高大建筑物的落成，在四方楼西北20多米处也竖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它几乎昼夜不停地吐着滚滚的浓烟，顺风时可以闻到从浓烟中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异味。它四周用2米多高的木板墙挡住人们的视线，不许中国劳工靠近它，更不让让他们知道它的用途。有一次，中国劳工王志兴指着大烟囱问日本看守户口：“那里边炼的是啥，怎么有一股腥气味？”户口有意地嗅了嗅，不耐烦地说：“中國苦力的诡话没有。这是军事秘密，不许随便打听。”在仓库服役的中国劳工王英富也曾问过一个与之很熟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却直言不讳地说：“人死啦的，马死啦的，那边火的给。”于是人们才知道这

是一座焚尸炉。

这些待焚化的人尸是从哪里来的呢？1943年6、7月间，中国劳工陈方东看到从铁路专用线旁边开过一辆像冷冻车的汽车，进了焚尸炉大院后，七三一部队队员立即把大门关闭了。中国劳工任广全告诉大家：“这冷冻车是拉人的。那里装的大部分是死人，也有活着的，他们哼哼呀呀的声音都能听到。都运到焚尸炉院里去了。”所以，每当“特别汽车”开进焚尸炉大院之后，焚尸炉的大烟囱就冒烟了。这样的事大部分发生在夜间。这些尸体来源包括安达特别实验场在内的野外实验场。七三一部队把在野外进行细菌实验而致死的人体，都一个不少地用汽车运回部队，投进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尸体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每个实验室以平均两天实验三个的速度，把“实验材料”从特别监狱押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转运解剖室，最后由解剖室通过地下暗道送至焚尸炉。甚至有的尚未咽气的活人，不经过解剖，径直地送去火化了。这是七三一部队用细菌杀人的全部过程，也是消灭“实验材料”的主要途径。他们的这个秘密，曾被中国劳工杨淮昌发现。炼人炉内像铁柜似的，每个铁抽匣里放一个人，浇上汽油，就开始火化。此外，从大烟囱吐出的烟雾，也露出了他们的破绽，每当气压低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异味。于是他们采取了保密措施，即借助于部队特设的气象班提供的天气预报决定开炉、停炉。这种措施虽然能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但不能满足七三一部队的需要，因为它每天实验致死的尸体有20多具，如果不连续地火化，就发生积压，停尸房里装不下。特别是夏季，尸体停放一天就会发臭。如果遇到鼠疫传染致死的尸体，停放时间越久，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七三一部队决定增设焚尸炉。增设的焚尸炉在北岗上。由于这里地势高，不论什么风向和风力，随时可

以开炉。但是有时还能闻到炼尸的气味，于是，他们又把烟囱接高几米。这座焚尸炉建成后，日本人公开让中国劳工运送死去的动物，这样，给外界的印象它是炼马炉。

七三一部队虽然对焚尸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致命的漏洞。例如，炼尸体是一种肮脏、危险的活，似乎应该交给中国劳工去干。可是，却全部由日本队员自己干，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焚尸炉与它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是连在一起的。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细菌战 ——七三一部队的野蛮行为

田村良雄

(防疫诊疗助手 兵长)

作为松花江流域的大城市，从古就为人所知的哈尔滨市，东端的香坊有一条道路。中国人民叫这条道路是杀人的道路，从心眼里憎恨它。

乘汽车跑 30 分钟，道路逐渐变狭窄，一直是笔直的道路在这里急剧拐弯，朝向平房车站。

如果注意来看，在这条弯曲的道路附近茂草当中还有一条道路，是通向七三一部队的。

在面临这条道路的一望无际的草丛中，一直延续着割掉麦子痕迹的田垄，而且在草原到处过着和平家庭生活的房屋也被点火烧掉，烧剩下的房柱好像是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为而

矗立着。

过去是和平农民的耕地，可以听到收割时愉快歌声的这块土地，由于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五常县的驻地转移到这里，改用石井部队的名称，不仅用刺刀把中国人民从住惯的土地上赶走，而且把散居的村落集中在五个地点，挂上“保护部落”的牌子。由于保守秘密和进行奴役的需要，把中国人民在这里监禁起来，剥夺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断绝和外部的一切来往，造成了这种荒野草原无人耕耘的地带。从此，这片神圣的土地变成细菌战部队的演习场所，刷毒的细菌污染了肥美的田地，对那些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使这里变成了死刑场所。

以对人类不允许的细菌战为任务的七三一部队，害怕特殊秘密的泄漏，在本部的入口处，垂直挂着“无关东军司令官许可无论何人均禁止入内”的牌子。灰色的三层四角大楼，乍看起来和普通楼房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里见方挖着深深的壕沟，环绕着高压电线，经常传出狙击人生命的恶魔吼声。

细菌战事魁石井四郎吹嘘说：“这是采用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在楼房中有用于监禁中国人民并用他们进行细菌实验的两栋秘密监狱，管理这里的班叫特别班。在这以外稍微离开的地方有三面包围的房屋。这里有向平房车站方向延伸的两条飞机跑道，是撒播细菌的航空班用的。

全世界的人们为把人类由病魔中拯救出来而拼死斗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反过来利用这种医学成果，在1939年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大肆进行细菌战。1940年以来还企图用细菌战的手段消灭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身上散播剧毒的细菌，使中国人民陷于死亡和病痛之中。他们竟敢犯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这样还不满足的日本侵略者，于1942年4月又策划更大

的细菌战，致力剧毒细菌的制造和研究。

刚刚过了 6 点钟，谁也都没来，全部房间像死一样寂静。蒙上尘土的暗淡的长明灯，照射在到处是制造消毒药水坑用手推车轨道的水泥地上，照射在铅灰色高压灭菌器及溶解锅上。从地下时常可以听到调节温度的孵卵室混有呻吟般的声音，也许是特别班传来的。还可以听到咚咚咚拖着脚链的声音，令人恐惧。腐烂的培养基和消毒药水的强烈臭味，从鼻腔渗透到脑髓，使头一跳一跳地疼。

比平时要早一点出去的我，从细菌工厂走廊往左拐，在两旁有堆得高高的培养罐的微暗道上摸索着往前走。咕咚咕咚，自己的脚步专用引起有人在追赶的错觉，好几次回过头来看，当然谁也没有。但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三天前，给中国人注射鼠疫菌，使他们感染上鼠疫，他们脸上充满仇恨。“鬼子！鬼子！”注射鼠疫菌时的那种情况，在眼前越来越清楚。“畜牲！”我胡乱挥着手，跳着脚，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挣扎着，东磕西碰着那到处皆是的培养罐，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进入那用板隔开的蒸馏室和冷却室之间的佣工室。

漆黑的佣工室里边点着一盏暗淡的电灯，灯下有穿着工作服的四五个人，团团围坐，说着什么似的互相紧靠着脸。或许是错把我当作军官，他们把旁边放着的肉精瓶惊慌地藏在床下。佣工说关于队内“机密”的话和说长官坏话的时候，对于突然进来的人，其蒙蔽手法就是开始大声发笑。我听到同伙的笑声，清醒过来，担心是不是让人看见了我那副因害怕中国人而抖的有失体面的样子，想要装作平静，故意喘了一口粗气，硬以平静的声音说道：“怎么？又揩细菌的油了吗？”然后向团团围坐的同伙走近。

“是田村吗？想吓唬人吗？”看见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是我，

身为柄泽班雇员的四十多岁的长岛次郎，一边拿出刚才藏在床下的肉精，一边恶狠狠地高声申斥着。他接着说：“喂，田村！听说一瓶就是15块钱，军官先生也是一批一批明目张胆地拿出去！还可以和老婆絮絮叨叨地互相品尝。这个……”

“军马、军犬、鸽子，还有叫做佣工的这些雇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不能尝到的吧！”田部井班的玉井抢过长岛的话题，胡乱插嘴。

我看到聚集在这里的人面孔，知道这正是老雇员常提过的他们的“信息交流”，也就不想立刻到特别班去了，只要他们不说“滚出去”，就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便坐下来。

他们每天都被告诫：“泄漏机密的人处以极刑！”即使处以极刑也没有意见——他们虽然这样的保证着，但为了与上级巧妙周旋，为了讨好上级，仍有必要了解部队现在在做什么。另外，佣工们还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总想把自己所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多么“绝密”，以此夸耀自己是取得上级信任的人。所以，值班的时候，各班的人常常聚在一起，悄悄地谈些小道消息。

把肉精放在茶碗里，倒进热水，一口喝干，被称为柄泽班十年组的雇员——候补技手^①奥寺，一边向上翻着眼珠看我，一边坐着蹭过来说：

“喂，田村！最近偷偷摸摸的干些什么？在这儿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奥寺这家伙，他知道我是在课长直接命令下到处活动的。有这样感觉的我，内心得意起来了。

“不能说，因为是绝密！”我吹牛道。

“什么绝密；混蛋！我们干的事都是绝密。小毛孩子的毛病！”

① 技手是日本在技师手下工作的技术员，旧称三等技术官。——译者

奥寺越来越焦急，总想叫我说出来，一直在追问道。奥寺越是焦急，我就越是得意。几天来在心底对中国人的恐怖感，变成了更残酷、更残忍地进行生物实验的功名心。

“等等，奥寺。田村只去了特别班，我们更要早听到的是玉井讲远征队的情况。没有时间了！”有人要缓和一下奥寺的气势汹汹，这样说道。今天聚集起来想听的是远征队的新情况——1942年春天，远征队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指挥下到华中华南地区去散播细菌，最近归来。其他三个人也在催促着。

“嗯，好吧！”奥寺像要显示显示先任职的雇员的威严似的，表示同意。

“玉井，在杭州买女人的这些事就省掉不说吧，好吗？”

我听说要讲远征队情况，咽下了一口唾沫，蹭过来侧耳静听。听说远征队归来后，课长、班长都焦躁不安，每天更加严厉地大声斥责班员，所以，部队全体都感到战战兢兢的。

“出什么事了？”我也很想听听。

“说说吧！可这是秘密中的秘密，要是败露了可要砍脑袋的呀！”苍白的圆胖脸的玉井放低声音开始说了。

“1942年3月组成的远征队，本部设在上海和汉口，以这些地方为据点散播细菌。”

“我们培养的细菌怎么样啦？”奥寺看来对自己做细菌放心不下，插问一句。

“听说柄泽班的细菌——老实说，不能使用，因为杂菌多，在运送途中腐烂了。就是没有腐烂的鼠疫菌，有时也没有毒性！”

“是吗？那最有效果的是哪个班做的？”

“第一是碇班！碇班把炭疽病菌放在金米糖或糖豆里面，从飞机上挂降落伞投下来。这样，孩子吃了身体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像是死了不少人。”玉井屈指数着说。

“第二是田中班的跳蚤吧？”

“唔，是的！鼠疫跳蚤好是好，可是，我们搞细菌战，把带着跳蚤的老鼠原封不动地扔了好几次，都传出去了。”

“真的吗？那可不得了。”

“真的。《解放日报》都把散播鼠疫跳蚤的方法照直登了出来，而且还附有照片。”

“要是那样，今后细菌的大量生产将会怎样呢？”大家和长岛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在这种场合，都看着最早任职的奥寺的脸色。

“传出去也好，没传出去也好，细菌生产的事能变更得了吗？如果是传出去了，培养毒性更强的细菌，就会无所畏惧地散播啦。怎么样？玉井！是这样吧？”

“啊，啊，所以最近‘丸太’^①被运来了！”

刚才听到大家说话的人事班的岛田，另起一个话题说：

“金井！特别班的色情小册子没有印刷吗？”

“你是想要一本吧？这个色鬼，每次去照相班，都要色情照片！”无论哪个家伙，都有从金井那里拿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的习惯，现在却装出君子的颜色，笑了起来。

部队长石井四郎，一方面是为了二木班的性病实验，另一方面是害怕中国人对细菌战的坚决、英勇的反抗，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一起推行实验，所以，让人制造了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

“对中国人怎么也不行。他们好像没有色情观念，给他们色情小册子也好，色情照片也好，看也不看就撕碎了。现在，色

^① 丸太，日文意为剥了皮的原木，可以成材。日本侵略者为进行细菌战，将中国人民或其他各国人民作为细菌实验的生体，故叫作原木，也有为掩盖其罪行而用隐语之意。——译者

情照片、小册子都不起作用了。”

“真的。所说‘丸太’真奇怪呀！没有好色心，也不怕枪炮子弹。”

“所以很难处理！有点好色心，哪怕稍微有点，也可以让他们老实点嘛！”

大家各自都进行着残酷的生物实验，都是杀害中国人，所以都说着同样的语言。

“作为一个人，又是那么年轻的男人，没有好色心，能想到吗？真是傻瓜！”人事班的岛田，好像怎么也不相信，环视着每个人的脸。

“那可是真的呀，岛田！我开始也像你那么想。对付田村做实验用的一个家伙，一次是用俄国女人，后来放进中国女人。我从钥匙眼里盯着看：女人进来了，两个人立刻握起手来。我想，这可好了。刚想下结论，那个男人像发疯似的高喊：‘鬼子！你们对什么罪也没有的女人干这种非人道的事情吗？绝不能允许！一定要消灭你们！’放进女人，他们非但不屈服，反而越发激起了反抗心。”

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精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

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目送过去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牲！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噜咕噜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我走近出口的时候，没想到迎面遇到实验的直接指挥者宇田清技手。宇田不该这么早就来。也许是因为我仔细端详，宇

田机敏地躲避我的视线。这是秘密的要做不能和人说的那种事情通常采取的态度。我没有问，就跪在他的后面。

宇田有些心神不定，回头看了一下，把嘴靠近我的耳根说道：“要做点有趣的事，你陪着我吗！”他很快抓住我的手臂，向我刚才来的方向快步走去。走到隐蔽之处第一个牢房前面，他说：“在这里给我看着那些当官的是不是来了，好吗？”他从口袋里掏出私人钥匙，插进锁孔里。打开牢房的锁本来是需要特别值班班长许可的。正想着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往里窥看，只见在水泥地上铺着薄薄的被褥，上面坐着一个像是在侧耳倾听外面声音的二十六七岁的妇女，她面容憔悴，剪着短发。

虽然明明知道，人生下来就具有爱恋母亲的心情，可是，对于关心自己孩子、关心自己民族命运而反抗侵略者的伟大母亲，却毫无道理地判处死刑，而且把她作为细菌战的实验对象来加以残杀，现在，侵略者甚至还要对这样的母亲进行野蛮的侮辱。

“干什么？”妇女的脸色更加苍白，眉毛倒竖，嘴唇气得发抖。六尺之躯进入三尺狗窝^①，因营养失调和拷问而失去身体自由的这个妇女，自然没有抵抗的力量，被那连现存人类的一点最低道德也没有的侵略者按倒，成了兽欲的牺牲品。

我一看到宇田强奸，就完全变成一条疯狗。我从锁孔中拔出钥匙，插进旁边那间牢房，但是转不动。我焦急地从窥视洞往里看，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妇女，在胸前紧紧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向这边凝视。孩子在也好，不在也好，这都无关紧要，我只想打开锁，但是钥匙不合适，当然打不开。我用足力气将钥匙拔出来，往下一个牢房锁孔里插了进去，听到咔嚓一声便打开了。在里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瘦弱得连站起来

^① 原意为“在人屋檐下怎得不低头”，此处为被迫受辱意思。——译者

的力气也没有的妇女，靠着墙壁，眼睛混浊无光，脸面浮肿。

妇女看到我，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你……什么事？”说完了，突然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我想，别人来了不合适，快点干吧，便凑近妇女蹲下来，想要搂住她的肩膀，妇女依旧闭着眼，从被里伸出手来，想要把我推开。

在这只手上没有指头，尖端露出黑色的骨头。我看吉村班冻伤实验的结果，就没有受阻的担心了。这一次用尽力气让女人横倒下来。妇女没有支持身体的力气，砰的一声当场仰面摔倒，没有指头的手抓着，痛得浑身乱动，皱着眉头，无光的眼睛猛然睁大，投出燃烧着憎恨烈火的光芒。

我像饿狼一样跟着她，要把这滚倒的妇女整个舔掉似的。从变成灰色的“病衣”里露出来的一只脚，已没有脚后跟了。另一只脚全部没有脚趾，黑色的肉露着骨头。“如果是不倒翁，那可正合理想”我这样想着。我在昏迷似的失去一切力气、什么抵抗力也没有的这个仰倒的妇女前面蹲了下来，用力掀开她的下襟。她尽力挣扎着，想要变换身体的位置，闪耀着羞耻和憎恨光芒的眼睛喷射着怒火。这个妇女因冻伤实验而冻掉了手足，现在被放到二本班第四性病的土壤鼠研究上，就要受到残酷的杀害。我扫视妇女下腹部，看到从下腹部到腹股沟紫红色地肿胀着，胀在腰板上流一大片。“呸，畜生！”我知道不能满足我的兽欲，用足力量在妇女的腰部踢了一脚便走出去了。

“混蛋！在这种东西上伸手……赶快去消毒！”脸上露出轻蔑笑容的宇田，一边把写有“实验中”的牌子插上，一边嘲笑似的责备我。“蠢货！在这样的东西上也能伸什么手吗？”我压制着焦躁而想大骂的心情，到特别班的解剖室去了。

解剖台上好像是解剖刚刚结束，在“血池”上，通红的鲜血正流着，啪嗒啪嗒地落在下面的玻璃瓶里。大的解剖刀，沾

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还带着鲜红的血浆。

“喂，田村，我打电话去了。你先把器材消一下毒，马上就要开始了！”宇田说完便出去了。

扑哧，扑哧，灭菌器中的器材这样翻滚的时候，课长大木启吾少佐和班副 细岛宏中尉全身包上橡胶防菌衣进来了。

“开始吧！”大木命令道。细岛用眼神暗示：把手术刀递过来。我并不知道用手术刀干什么，就原样递了过去。接着是暗示拿止血钳子。细岛拿着手术刀和止血钳子时，中国人躺在担架上被抬来了。今天早晨被我浇上消毒药水的中国人，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都预定今天解剖。中国人的脸紫胀着沾满了血，从担架上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大木提心吊胆地走过来，注视着中国人的脸喊道：

“喂，快煮樟脑液^①！这样拖下去就不能实验了。”

“是！”在旁边直立注视的细岛答应道。

“两支樟脑液！”他伸出两指命令我去注射。

抓住中国人穿的发黑的“病衣”脖领，特别班的八坂使足劲儿往下拽。“病衣”撕破，失去意识的临死的中国人咕咚一声被摔在铺瓷砖的三合土地上。

被注射了樟脑液、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顶棚。从极干渴的喉咙里，像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声似的，但是不能出声，仅是嘴动动而已。

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吱地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这一来，颈部的绳索勒了进

^① 注射樟脑液是为促进重病人的血液循环，防止其心脏麻痹而死。——译者

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我惊慌地擦去血，拿止血钳子等着的宇田，用钳子搅弄伤口，一看见颈动脉，咔咔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部分叫道：

“樟脑强心剂两支！”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

中国人心脏里尽管注射了樟脑强心剂，但是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项动脉流出的鲜血，朝我拿着的30cc.的软木塞瓶，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

“四支樟脑强心剂！”在稍微离开的地方，指挥这场残暴行为的大木叫道。但是，注射了四支樟脑强心剂，也不能再榨取中国人的鲜血了。

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

“把解剖刀递过来！”细岛侧拿着解剖刀，从上腹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向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分别拿着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疗用玻璃器皿，等待露出内脏的这三个人，是抓住肉不放的饿狼，他们为了制造细菌病菌杀害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

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我们四个人看着这个被虐杀的身体，像吃饱了的狼，哦的喘了一口粗气。大木、细岛、宇田和我，就这样按着顺序鱼贯钻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大木和细岛躲进了军官室，休息室里留下我和宇田两人。宇田脱下用消毒药水浸泡过的防菌衣。

“喂，田村，看过现在那个‘丸太’的肺了吗？肺鼠疫虽然没有错，可是到了第四天还没有完全致死的状态。”

“那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他们的反抗是绝食。这些家伙，恐怕是想不让我们进行细菌战，进行反抗吧。”——这不就是说，如果反抗就要被打死吗？嘴里没有说什么，我看着宇田的眼睛。

“那些八路军家伙，一定能生产比我们优秀的预防注射液——根据石田技师的说法，别看他们没有活菌疫苗。不管怎么说，不培养比这个毒性更强的细菌，是不能打细菌战的。”宇田用酒精大声嗽着口，接着说：“不制造出毒性更强的疫苗，受感染而死去的就是我们和友军士兵，细菌战本来就是不可避免地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嘛！”

“细菌战会同归于尽。”我嘴里嘟囔着，不顾一切地往全身浇消毒药水，咕噜咕噜地往嘴里倒酒精。

“喂，准备！”课长大木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脸上浮现出平时没有的笑容。

“这一次要做的是须藤良雄，是不许说的绝密！”我差点儿把手里拿着的指头消毒器掉到地下。大木从我的表情好像体察到什么，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我。这个眼光是允许我进入特别班时的眼光。我感觉到这是对我的考查，便压制住内心的波动，装作平静。

“是吗？”我看着大木的脸。

“好，你也是一个男子汉了。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大木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很少有的动作，开始穿防菌衣。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最近鼠疫菌的大量生产而感染了鼠疫菌。我以为他已被送到医院，谁想到把他也放到了监禁中国人以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班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敲着自己的脑袋进入解剖室。

须藤良雄赤身露体地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直到四

五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现在完全变了样了。他只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有无数紫色斑点，由于过分痛苦而搔伤了一大片胸部，血从撕破的伤口那里冒出来，在睁开的发呆的眼里流下泪水，嘴巴松弛无力地张着，痛苦地喘着气，一起一伏地抽动着肚子。

大木很早就看见过须藤和我的交往。遇到大木视线的我，开始用消毒水擦抹须藤的全身。为了装作心情平静，我尽可能干得粗暴些。

“好，科学家是必须冷静的。”课长表扬我啦，感觉到这一点后，我便像对待中国人一样地给他浇上消毒药水。大概是消毒水的冰冷，恢复了他的知觉。他睁开茫然若失的眼睛，动了动脑袋，想要环视一下周围。每动一次，颈上的绳索就勒紧一下。

“班长！班长！胸口……胸口……”由于痛苦，他脸已变形，咕噜咕噜从嘴里吐出黑紫色的血。

“班长！班长！”须藤自感染这种病以来，一直这样叫喊，他要求治疗。

在我头脑里显现出1939年开始侵略中国时须藤母亲的脸，她给了我一小筐水果，嘱咐我说：“和良雄要好好相处呀！”从那时以来，我们就共同卷入了罪恶的生活旋涡。

“给他帮点忙吧。”我在把手伸向药物箱想要取“凝血酶原”止血剂的一瞬间，心里这样想。“开始！”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的大木下了命令。

大木看着我的眼睛，命令从消毒器里取出解剖刀。“为天皇陛下效忠。”我压制了要帮助须藤的心情，把解剖刀递给了细岛。反握着解剖刀走近须藤的细岛，又想起了什么，改变了主意。

“喂，宇田技手，你做吧！”他把解剖刀交给了宇田。

宇田往大木脸上看一眼，接过解剖刀，为了看清切的地方，开始抚摩须藤的肚皮。完全想的是给自己治疗的须藤，正在挣扎之中。

“课长，对不起，请你给我快点做吧。痛苦呀，快点！快点！”须藤不断地叫道。拿着解剖刀的宇田，手稍微有些震颤。

从解剖台退后一步之后注视着的大木，用歇斯底里的声音高喊：

“快干！”

“须藤，成佛去吧！”宇田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

“救命呀！”从须藤的嘴里传出了呻吟声。宇田的手哆嗦起来。“窝囊废！怎么啦？”听到后面这大喝一声，宇田倏地把解剖刀下切去。他用翻手刀撕开胸部的皮肤，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啪嗒啪嗒地落下去。

“畜牲！”从流着血的须藤嘴里，喊出这样一句。与此同时，在解剖台上，内脏明显地露了出来。他死了。

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在暗处的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跑来跑去的鼠疫菌。

“这样不行，要使它通过动物的身体而加强毒性。好吗？细菌。”听到要更加残酷进行生物实验课长大木启吾少佐的命令，迷恋于未来军官地位的我，开始了将用于大量生产细菌的培养疫苗的工作。

我憎恨安然实行非人道罪孽的自己。这种罪孽决不能允许再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人类致力于和平劳动，是为求得人类的繁荣。侵略者、挑拨战争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不顾才疏学浅，一定要在这里暴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部队的部分罪行。

简 历

1939年5月，在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731部队)入伍。

1943年3月，退职。

1944年3月，在原关东军59师团32联队作为现役军人入伍。

1945年8月，任原关东军125师团军医部兵长。

1946年9月，混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3师卫生部。

1952年6月，在河北省永年县被捕。

原籍：千叶县长生郡。

出身阶级：雇农。

年龄：34岁。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731部队的残忍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毒气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违反国际法规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底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连株蔓及。

由战犯拘留到被释放，归国二十多年，生活虽然不算太富裕，但是能过着安稳的日子。这得归功于反省侵略战争、不允许再发生战争、坚持捍卫和平的日本国民的良知。我深深感谢。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持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

我认为，不知道战争的家庭多起来，是让人愉快的。因为，

这正说明和平在继续着。这些家庭的人们是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培养的，不像我们那样拿着武器侵入他国，随心所欲地杀害当地居民，还以为这是“正义战争”。但我希望战后成长的人们知道战争的实质：战争是邪恶的极团体。

最后，日本正在紧缩财政，一味大大突出军费，不断削减象征和平的福利。停止备战，把钱使用在社会福利上，用来解救世界饥饿的人们，用在亚洲各国友好上，用在世界的永久和平上，这不正是多数日本国民的愿望吗？

田村良雄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石井四郎秘闻三则

石井四郎（1892—1959年），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犯。1892年6月25日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现芝山街）。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1924年4月再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1926年毕业，从军，曾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日本侵华第一军军医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他逃回日本，将有关细菌战资料送予美国，受到美国庇护，未受法律制裁。至今，世人公认他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元凶，但有关他在中国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具体罪行尚未全部披露。为此，笔者依据档案史料，略举秘闻三则，聊以示众。

一、石井四郎与渡边博士

渡边博士原是日本神奈川县立卫生实验所所长。1939年至1940年间，他却成为石井细菌部队菌苗班班长，参与用活人试验超声波疫苗的罪恶活动，由学者变成杀人刽子手，这一变化完全是石井四郎一手导演的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1937年左右，渡边博士发明了用超声波发生器制造、改良菌苗的新技术，可以提高菌苗的产量与免疫能力。这引起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的重视。他几次前往卫生实验所了解渡边博士的研究情况，发现这项新技术能弥补细菌战研究的空白，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渡边博士诱入了魔窟——石井部队。

1937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新设置了“超声波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建于1932年8月，是石井四郎在日本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基地。此时他在该室设超声波研究室是企图利用齐全的实验设备、充足的实验经费诱惑渡边，让他进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而达到迫使渡边为其细菌战研究计划服务的最终目的。这一阴谋很快就得逞了。1938年7月，渡边博士欣然接受石井四郎的聘请，任军医学校嘱托，迈出走向魔窟的第一步。

渡边受聘后，每天上午还在卫生实验所工作，下午就与山内助手到军医学校进行研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用超声波改良霍乱菌苗。大约经过半年，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他们研制的超声波疫苗经过80人接种试验，效果比军医学校原制菌苗要好。于是石井四郎用军部命令强迫渡边博士与助手辞去了卫生实验所的职务，专职军医学校。

1939年，正当渡边博士准备继续攻克超声波疫苗人体注射

反应过大课题时，石井四郎又逼近渡边，胁迫他去哈尔滨石井部队完成下一步研究工作。渡边当时听说石井部队十分神秘，易进不易出，心里不愿去。石井则为达到最终目的极力劝说他。最后，石井对渡边说：“如果实在说不通你，那以军部命令你去研究如何？”渡边说如果去大连卫生实验所就去。石井又要一个花招，说：“可以，但先去哈尔滨。”渡边与助手山内迫于当时军部的压力，听信了石井的话，抱着将来去大连卫生实验所的希望，于1939年6月离开日本，踏上赴中国哈尔滨的路途。

渡边博士与助手到达哈尔滨时，石井部队正在扩建，实验设备不全，超声波疫苗的研究无法进行。石井把渡边安排在第四部任菌苗班班长。石井部队当时下设八部，第四部是生产部，负责生产细菌。菌苗班则负责供给关东军细菌作战所需之细菌，包括：伤寒、副伤寒、赤痢菌苗、霍乱菌苗以及流行性脑膜炎菌苗等。当时该班成员17人，定期生产60万人份细菌，且3个月后即失效，重新制造。

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爆发，石井部队组成细菌作战队赴前线进行细菌作战。菌苗班被抽出5名班员，剩下人员在渡边率领下生产细菌。由于当时生产任务极重，石井把安东洪次^①等派到该班帮助生产细菌武器。但是，石井作战队在战斗中受到苏军沉重打击，石井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滤水车亦被击毁，他们撒布的细菌污染了战区附近的河流，结果玩火者自焚；疫病在日军中蔓延。10月初，石井部队成员悻悻而归。10月末，北满孙吴（今黑龙江省孙吴县）等地发生病源不明之热性传染病，石井派渡边组成了调查班，渡边任班长。但经过约3个星期的调查未取得成果。

^① 细菌战犯，大连卫生实验所所长，战后回日本。

1940年3月，超声波发生器等实验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石井四郎下令进行人体实验。为此，菌苗班组成人体实验班，班员有川名技手、千叶技手、小林嘱托、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等。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负责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

5月，人体实验开始。他们把受试验的20名中国人分为三组。一组，8人，注射超声波霍乱疫苗。二组，8人，注射军医学校制霍乱疫苗。三组4人，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大约二星期后，又让上述20人喝下混有霍乱菌的牛奶，这种毒菌是石井部队培养的剧毒菌，对人致死量是1/千毫克，当时使用的感染量是1/500毫克。结果，“一组8人中仅有1人稍有间痛和腹痛，3天后复原。二组8人中多数患下痢，并有3人病情严重，1名死亡；作为对照的第三组4人，全部死亡。”^①

石井四郎得到试验报告后，将结果呈报关东军军医部，建议采用超声波疫苗作为细菌战时保护己方的“武器”，被采纳。于是石井下令大量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可渡边博士与助手山内还想去大连，就以设备不足为由，提出去大连制造菌苗的要求。石井不同意，要求他们利用现有设备生产。渡边看出石井不愿让他们去大连，原来的允诺成了口头支票。为此渡边几次与石井发生冲突，矛盾开始激化。最后一次，也是危及渡边生命的一次，发生在1940年9月。当时，长春发生了鼠疫，石井部队开始防疫。石井令菌苗班昼夜不停地生产防疫疫苗。但因生产被拖延，石井从长春打电话询问疫苗生产情况时，得知疫苗未制造出来，就叱责了渡边，并令渡边去长春。当夜渡边赶赴长春，住于大和旅馆。据他的助手山内说：“第二天，听说渡边博士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因交通事故而死，但我却总怀疑。”^②

^① 参见山内自述。
^② 山内自述。

结果，渡边去大连研究超声波疫苗的愿望成为泡影。

二、石井家族的不义财

荻原英夫是石井四郎的同乡，又是远房亲戚，他的叔父是石井家的女婿。1934年左右，石井四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筑细菌研究所，他把家乡大约20名青壮年招到满洲帮助建设。荻原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等都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了伪满。他们在伪满大约一年间，获得了大量钱财。然而，其中最突出的是石井的亲戚铃木茂。他开始时是做日工的木匠，后来却逐渐成为承包石井细菌研究所建设工程的组长。

1934年夏，几名关押在细菌研究所的抗日人员逃出虎口，这引起石井四郎不安，他怕自己的罪恶活动暴露于外，立即把该研究所迁到哈尔滨南岗。1936年，日本天皇下令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长。1938年，关东军下令在哈尔滨市郊平房建筑“军事特区”，作为石井部队研究、生产细菌武器的基地。石井四郎又从家乡招募了两批人员，充实铃木组，安装四方楼^①内的各种设施。

荻原英夫是第二批来满洲的人员，他参加了四方楼第七、八两栋内部安装工作。此项工程使他获得了“可观收入”。

1937年8、9月间，荻原同其他20名应募者一起，在东京都牛込区军医学校参加考试，被录取（考试只是形式）。1938年他们一行20人来到伪满。到伪满后，他们在第七、第八栋工作，当时建筑物的内部只有入口处和最里面间隔有房间，中间像个大礼堂，没隔断。第七、八栋被第三、四、五、六栋所包围，从外面完全看不到。入口处有一坚固大铁门。在第三、四、五、六

^① 即石井部队的实验楼，因形为四方称为四方楼，其第八栋是关押供实验用的活人的。

栋三楼的角上都装有探照灯，直接射向七、八栋。三栋的房顶上还建有更高的了望台。

他们开始干活前，建设班工藤技术员传达了石井部队长的命令：“七、八栋的内部工程今年内（1938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问题，同部队的任何人都不许议论，如有人议论，必予处罚。”^① 随后，他们开始刷第八栋内已间隔好房间的墙，并准备间隔其它房间，这是他们第一项工作。根据石井的指示，凡出入第七、八栋的人必由保密班（为保密而设立的机构）检查证明并搜身。木工和瓦工负责人则每天必须将内部设计图交给保密班保存。荻原的舅父青柳是这20人的负责人，他当天要向保密班报告到工地干活的人数、作业种类和地点。

但由于石井部队没按合同规定把荻原等算为部队职工，只给他们临时工的工资（荻原的日工资是二元八角，这是杂工中最低的），因此他们怠工，致使工程没有进展。后因工期迫近，铃木请示石井同意，又从家乡招了40名工人，参加七、八栋的内部施工。这40人于当年4月到达伪满，至此，千叶班人数增至60人。青柳仍继续任千叶班长职务。

第二梯队到哈尔滨后，开始承包，工程有了一定进展。荻原说：“我们将七、八栋一、二楼的29间房的墙壁刷好后，开始隔监狱。在此之前，曾在五常石井部队工作过的人，似乎也不知道七、八栋的用途。我是在二三个月后才听青柳说这是收容试验用活人的监牢。牢房入口有铁门，四周是水泥的，每间牢房都有厕所。1939年，七、八栋牢房基本完成。”^②

第二项工作是搬运、组装各种研究器材。如安装在三栋一层的灭菌器等。

^① 荻原供词。

^② 同上。

通过承包，荻原等每天有10至20元收入。有的收入多达三四十元。荻原说：“我刚来哈尔滨时，扣去每月20元伙食费，再往家里寄五六十元，手中就没多少钱了。后来，我每月寄家100元，还可添置西装等衣物。而且，星期天去哈尔滨时，我也可以出入妓院、咖啡馆。生活富裕了。我前后（1938—1939年）向家里寄了大约100元。”^①

以上只是荻原一人的情况。而铃木茂此时更富有，已“拥有家资十万！”^②石井四郎家的钱财更多。这些钱是石井四郎杀害中国人民而获得的不义之财，发散着浓烈的血腥气。^③

三、石井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1942年8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费被撤职，降级任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长。任职期间，他为防止细菌战中“自伤”日军，积极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他与助手曾多次举办训练班，提高军医的防疫水平。据战犯供认，石井四郎与助手渡边于1942年11月在太原举办训练班。由渡边讲授了病院内传染的预防办法，具体包括：病房及伙房的防疫设备、对水井的消毒办法、作战中对用水的检查法以及毒物检查法等内容。1943年4月初，石井四郎亲自到潞安（今长治市）陆军医院检查防疫工作，作了如下指示：“（1）令潞安陆军医院正确诊疗，让患者早愈，重返前线；（2）严肃军纪；进行精神教育；（3）军医需要进行医务学习，提高知识水平；（4）研究利用中药补充药源；（5）时刻注意防疫，提高防疫知识。”^④当时，潞安医院在石井亲自指挥下进行了防疫演习。演习内容是飞机投下鼠疫菌

① 荻原供词。

② 同上。

③ 种村立三供词。

后的防疫。潞安医院组成了防疫队，采用石灰水进行消毒，以及在军营与仓库间堆放的破席上撒施石灰等等防疫措施。

研究冻伤是石井的另一任务。战犯汤浅谦供称：“1942年12月，石井四郎亲到潞安医院进行巡视。当天上午，他召集军医讲授关于冻伤实验的结果。他说，过去冻伤用摩擦法不好。根据冻伤实验，凡冻伤严重到几乎心脏停止跳动时，可用37℃温水浸泡全身，即可复原。……当晚，他又召集下士官以下四百多人在司令部内看了有关诺门罕事件中防疫的电影。石井四郎现场说明了电影要旨。”战后，冈村宁次回日本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供认：“（石井）在完成其本职工作外，从事特别研究的使命，并获得很多成果；特别对于治疗冻伤，他得出了用37℃水浸泡伤处是最好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可见，石井当时关于冻伤的研究得到了冈村的赞赏与支持。

然而，这位从事细菌战的元凶，时时不忘其老本行，虽贬居山西，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从事推广细菌战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工作。石井到山西上任后（9月上任），首先就以太原防疫给水部作为试验中心，研究细菌战。1943年7月，石井在太原第一军司令部对参加太行山作战的军医们讲：“斑疹伤寒怎样传染？从前有人说是从口内传染，实际上是虱子传染，是患者在抓痒时，使细菌进入皮层内致病。”他还说：“这在太原防疫给水部用中国人作过斑疹伤寒试验予以证明的。”据当时有关人员讲：“太原防疫给水部的业务由石井亲自指挥。其中大桥和野口两人由石井直接指挥，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另外，他还上窜下跳四处传播细菌战理论。1943年3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崞县给下士官讲述了“疟疾传染情况”，并放映了日军攻打上海时部队患病情况的电影。4月和9月，石井又两次窜到潞安，讲述

了用发霉的芋叶与小麦里的黑疽病菌混合培养的比尔斯菌的作用，并阴毒地说：“如果天皇一旦有令，我们马上就可以将这种细菌撒在美国，来年将寸草不生。”

正是在石井四郎的宣传鼓动下，山西日军在垂死前多次向我人民使用细菌武器，造成严重损失。如战犯×××供称：“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我在太原市西洋市北支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工作。在河南作战时，日军在新乡一带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白面，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又据种村立三供认：“1944年4月，在潞安陆军病院任卫生准尉时，我在潞安西南约6公里的某村北边井内投过伤寒菌。经过15天后，听说得伤寒的老百姓有30名，其中3名死亡。”战犯五十嵐猛供述：“1945年7月上旬，我在山西曲沃县城外驻扎时（第114师团直辖炮兵大本部），……把从临汾县城部队司令部情报室领来的高热和下痢的毒品，扔到东头井里和村中的水井里。”

1944年夏，日本侵略者日薄西山，石井奉命离开山西回日本，筹组细菌战总部，这才结束其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牡丹江细菌支队

程吉恩

六四三支队坐落在海林城东北四华里处的福利村，伪满时叫“腰屯”，老百姓俗称为“东大营”。光复后改叫福利村。“东大营”占地面积约60垧左右，四面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部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

距营房以西三华里左右，岗顶有日本飞机场，两地彼此相望，并有汽车道相通。

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沟，驻有日军四五〇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沟有铁路专用线从六四三支队东侧通过，供四五〇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此外，营房南侧还有一日本兵营，番号二六二四部队。二六二四部队和六四三支队同驻在一个大院里，中间仅有一道之隔。这个部队主要房舍建筑一共有三处：一处是 C 型的汽车库；一处是四壁镶有瓷砖的地下室；一处是机械加工厂。在这个部队工作的都是穿着不带军衔军装的日本军人。六四三支队里的劳工尽管看到他们的人和汽车来往于六四三支队，但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二六二四部队与六四三支队有没有关系目前尚未查清。光复前两天，即 1945 年 8 月 13 日，二六二四部队和六四三支队的房舍一同被他们自行炸毁。

支队内曾繁殖和搜捕过鼠类（豚鼠、白老鼠）和家兔，这些动物都被送到第七三一部队去用以生产细菌和进行病菌实验。在营房后边设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室，有十几名日本兵在里边进行繁殖工作。该部队供给部部长神尾兼任动物室的领导，雇员岛屿和小林甲以及士兵井上专门负责饲养动物。先后在这里喂养老鼠的中国人有两名，一个是李宝昌，一个是李华民。李宝昌开始是喂鼠，后来各种鼠类动物不断增多，这项工作就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了。支队内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就从哈尔滨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那里领到白家鼠和白田鼠各 500 只来开始大批繁殖，繁殖的白家鼠和白田鼠都发送到七三一总部去。每月发送的白田鼠有 100—150 只，白家鼠 150—200 只，灰色的田鼠和家鼠每月发送 200 只。专有特备汽车从六四三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捕鼠工作在六四三支队是最有成绩的，曾受到七三一部队的表扬或嘉奖。该队共捕鼠达7 000余只。虽然支队的位置在牡丹江城外的海林，但常常派遣士兵到牡丹江城内去捕鼠。为了不使市民知道他们是日本军人，捕鼠的士兵全都换上便装才开始动作，以便保守秘密。

第六四三支队内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七三一部队中去染上鼠疫菌，使之成为一种细菌武器。

另外，六四三支队还进行过培养伤寒、副伤寒、赤痢结核等细菌工作，以便研究这些细菌的属性及其引起疫病的功效。在培养细菌时，他们研究过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赖以迅速繁殖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同时还想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

1943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田鼠白鼠及其它鼠类动物；同时还要扩增供大批制造细菌用的设备。

1945年5月，当石井四郎第二次任七三一部队长时，他给海林支队下过大批繁殖跳蚤的命令，支队长尾上正男立即派人到七三一部队去学习，学习时间为半月或一月。当他们学习回来后，就开始进行大批繁殖跳蚤的工作，尾上正男先后派出去的细菌实验干部共达160人，他们在那里经过学习训练后带回必要数量的母本跳蚤，在本支队内进行繁殖。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七三一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第七三一部队去，其余的东西则一概消灭。遵照七三一部队长、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命令，尾上正男于1945年8月13日把六四三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的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密码和容积为20—25公分的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到第七三

一部队司令部去，然后全体队员便仓皇开往牡丹江以东的爱河站前线去了。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

林口细菌支队

张清林①

原侵华日军一六二细菌研究所，设在林口与古城镇（曾叫新城公社）中间（也就是现在的火葬场后梁岗上），位于去马鹿沟村的路旁，占地范围约半华里，四周用铁丝网围着；中间有许多栋砖瓦房子。正中有座200米长的砖墙铁瓦盖的大车间，里边跨度5米，装有暖气，我就在这个车间里干活。我们车间前面的地下室就是“药房子”，其实就是细菌研究室，室内有医院用的全套针械器皿装置。再前面是锅炉房，最前面挨着南大门的就是部队长办公室。车间后边还有汽车库和仓库等。

院外西边，距离约300米处，靠近公路的山坡上设有一座日本兵营，驻有百余名日本兵。

院外北边约1500米处的岗顶上设有一个飞机场，细菌部队与飞机场之间有畅通的汽车道。

1944年1月，从日本东京新调来1名军衔是少佐（即相当于少校级）的日本军官，任日军一六二细菌部队的部队长。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申元秀夫。他瘦高个，瓜子脸上缀着一撮小胡子，年纪约三十八九岁。他就是这个细菌工厂的总管。

① 作者张清林，是在林口细菌支队干活的劳工。

我干活的厂房，东头一大间里专门喂养从日本国内运来的白鼠，约有2 000余只，由日本人负责管理。西头一间里则收养当地的各类老鼠，由1名日本兵领着4个中国劳工管理。此外，还饲养白兔四五十只，还有从日本国内运来的“海猫”（荷兰猪）约有七八十只。

每隔一个星期左右，部队长申元秀夫就领着日本兵来到我们车间给老鼠和兔子打一次针。有时还到地下室——“药房子”里，杀死当地鼠，取出血液，用做配制细菌用；有时也用狗血作实验。

每过一个星期，就用马车拉7至10笼（箱）老鼠送到林口火车站，运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总部去。当时有个日本兵，我俩相处得不错。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药的干活，力量大大的有，哈尔滨的去。”并且手指那成批的鼠笼。就这样，大量的细菌武器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送上细菌战场。

1945年7月，日本军官命令士兵往锅炉里装填文件和贵重仪器，用火烧掉罪证，准备撤退。8月11日，侵华日军一六二部队在撤离林口地区前，把细菌研究所的全部房舍烧毁。

（徐宜方整理，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孙吴细菌支队

杨柏林

1940年（伪满康德7年）9月，七三一部队孙吴支队细菌试验基地动工修建。调集大量劳工，在皮鞭、刺刀下日夜劳动，工程进度很快，当年12月完成房屋建造。孙吴支队对外番号为

“六七三部队”，位于孙吴县城西南方向约4公里的一个土山上。

孙吴支队初建时期的部长是佐佐木少佐，1942年由西俊英中佐接任，同时兼任七三一本部训练部部长。支队工作人员初期30多人，第二年（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日本投降时已达120人。

和七三一部队本部一样，孙吴支队试验基地主要培育与繁殖供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伪满时期，关东军在孙吴多次强迫群众交田鼠，学生停课捕捉老鼠。孙吴支队的15间鼠舍中，每间地下都有一个食物窖，共收养老鼠1000多只，还有10多只黄色的老鼠，俗名大眼贼，是属于松鼠科鼠类的原宗，还有江豚200只、兔子50多只、羊3只，每周从动物身上抽一次血。

在七三一部队孙吴支队之外，还有一个早于1938年即动工兴建的细菌试验基地，番号为二六四五部队（地址在关东军孙吴驻军东仓库内）。化验室和附设制药厂15间，养鼠室有房屋10间，饲养试验用动物有小白鼠、灰鼠300只、兔子40多只以及麻雀、江豚等。

从试验动物身上抽血，同时也大量抽取人血供做试验和生产菌苗。建于孙吴二六四五部队（东仓库）的细菌试验基地就曾以验血检查身体为名，抽取3000多名劳工的鲜血，源源送到七三一第四部（即生产部），据这个部的部长川岛少将证实，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至少能培养出3万万亿微生物，用做各类细菌武器。

8月11日到12日，孙吴支队在支队长监督下焚烧了文件、图书和所有饲养的动物，由大熊带领4名士兵在锅炉里烧毁。另据第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兼孙吴支队长西俊英中佐供述，8月14日遵照他的命令孙吴支队发给全体队员（120人）每人一剂

毒药，要他们遇有被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俘虏的危险时即服毒自尽。可是他本人，即使在被俘、预审甚至被拉上国家军事法庭的时候，也没有动用那一剂毒药。

(摘自《孙吴文史资料》)

日本关东军细菌战在开原老城的罪行

李师文 杜源佐 朱肇礼 尚国华

1946年夏季，瘟疫病在我国东北大肆流行。三四个月时间，开原县人民死亡约3 000余人。这次瘟疫的流行是日本细菌部队罪恶的又一直接后果。日本微生物学家笠原四郎教授，1985年8月13日晚在英国电视屏幕上郑重承认：“我感到罪孽深重，我做错了事。”就是这位日本学者，当年在我国东北，曾对盟国战俘和中国无辜平民，进行过骇人听闻的细菌效果试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曾建立了两个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其一，是设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镇一带的细菌战司令部，石井四郎为司令。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称第七三一部，即七三一部队。占地30多平方公里，拥有3 000多名日本“科学家”和其他人员，在那里专以活人为试验品，研究细菌战的可行性。其二，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秘称“第一〇〇部队”，设在长春距西南10公里之孟家屯^①，专司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

① 孟家屯今属长春市朝阳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内。

重的灾难，其罪行罄竹难书。

二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翌年，即1946年7、8月，由第一〇〇部队，将大量瘟疫病菌投放东北各地。致使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从镇内西街石塔、扶余，遍及南街，一直蔓延到东关、教军场各村。两个月时间，由于瘟疫肆虐流行，死亡达700余人。清河畔、黄龙岗墓地埋葬中华儿女尸体的坟包暴增。致使一些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一时间，老城镇街头，出殡报丧的人群接踵而过，几家棺材铺的棺材抢购一空，专以轿房抬杠为职业的轿夫，生意兴隆。一些患了瘟疫病而死人的家里没有棺木，不得不不用木柜改制棺椁。家境贫困的，用炕席卷尸，用破被、褥单裹尸。苦难的老城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血泪帐。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官吏对此熟视无睹，根本不加理睬。城内居民家家大门紧锁，轻易不敢出屋，唯恐染上瘟疫，闹个家破人亡。

老城镇首例瘟疫病人发生，在西关外一家姓陈的家里，全家5口人，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个吃奶的男孩儿，外加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1946年7月的一天，老太太突然发病，拉肚子、呕吐，不足半天时间便死去。家里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于是儿子和父亲张罗料理丧事，到镇上去买棺材，不料老头和儿子把棺材弄到家，没两袋烟工夫，老头也与世长辞了。儿子哭得死去活来，无奈儿子还得去买棺材，把棺材拉到家里一个多点的工夫，见到媳妇又病倒了，不一会儿又咽气了。结果仅仅一个上午，这位可怜的男人竟也一命呜呼了。5口人中剩下的吃奶男孩，被亲戚抢先抱走，才幸免一死。就这样，一条不足百米远的西关小巷，仅仅四五天时间，因患瘟疫病竟相继死亡90多人。

几乎家家都摊上了，活着的人所剩无几。当地老百姓说，那些天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头一天还在一起唠嗑，取乐打趣，第二天竟突然死掉。人死了开始还有人帮助出殡，后来人死多了，也就没人帮助给出殡了。

石塔街当年染上瘟疫病险些丧生的张凤琴老人回忆讲，她老人家当年是14岁的童养媳。一天去市场买菜回来磨米，突然感到头昏，嘴角麻木，吐绿水，拉肚子，便的像淘米泔水，病倒后昏迷，人事不醒。家里人准备了棺材，屋子里只剩她一人，房子被人用草绳子圈上，戒严封锁起来。她苏醒后，使出吃奶的劲，挣扎着爬到屋外。后来由亲戚用鸦片，止住了腹泄，才避免一死。

扶余街瘟疫病流行得也很严重。据张鸿超老人讲，当年他家院内5户人家，不到10天死了7口人，人死后，吓得没人敢给往外出殡。可见，当时的情景多么悲惨。

国民党当局对瘟疫病根本不予理睬，设立的所谓“隔离所”，如同人间地狱一样，不分病人轻重，一律对待。凡是进了“隔离所”的瘟疫病人，几乎没有治愈出院的，都死掉了。

由于当时医疗技术限制，特别是卫生防疫工作无人问津，一旦发生瘟疫，实在无法控制，也是当时老城瘟疫病流行高发的一个原因。

三

老城镇东郊教军场村，1946年，全村人口约七八百人，当年秋天，街面上一位从沈阳来的过路人，因病死被扔到村东大坑里。结果，成了教军场瘟疫侵入的传染源，闹得瘟疫流行达一个多月，波及全村2000多户人家。首先从村东头一些人家开始，逐步往村西方向蔓延，有的一家人死了3口。王富春老人当

年17岁，他老人家回忆说，他父亲、母亲得病后，家里由于贫寒，根本无钱买药治病，老父发病3天病故，接着不大工夫，年迈的老母也咽气死去。第二天，帮忙料理丧事的叔叔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王富春老人本人当时也染上了瘟疫，病势也比较重。多亏本家的叔叔、婶婶请了医生及时诊治，才幸免。村西头一家姓朱的5口人，竟在一天之中发病死掉了4口人。可见瘟疫病，当年是多么残酷无情啊。

一个150左右户的教军场村，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死于瘟疫病的竟达30多人。

一位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1981年11月出版的《恶魔的饱食》一书，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关东军在侵占东北期间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细菌实验中，投放了许多致命细菌，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民。“七三一部队”的首恶分子石井四郎，于1959年因癌症死去。

(开原县政协供稿)

日本侵略者用中国 活人作细菌杀人试验

——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词

马德润

我叫张绍恩，是日本特务，曾在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做过化验工作。我个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细菌战争，而先用中国活人做细菌试验，残害死无数的中国良民，这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

笔大血债！

1940年7月，我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因我在学校就参加了日本的秘密特务组织，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把我作为特殊人员分配到北票炭矿的本部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北票炭矿的中心医院，因医疗设备比较先进，基本是给日本人看病的。我到医院后，日本人把我分配到化验室工作，主要是熟悉和了解日本医学派的化验常规，使之能更好地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接受任务，我暗暗地作好了接头的准备。两周后的一天，我拿着学校发的两封特殊信件，递交给北票警察署。过了一会儿，我随着一个翻译官走进警察署的署长室。一个小个子的日本人见我走进来，打个手势，叫我坐下。那位领我进来的翻译对我介绍说：“这位是黑田先生。我姓赵，叫赵德生。以后我们是会熟识的。”这时，黑田站起身来，对我说：“张先生，来了很好，现在分配在哪工作？”我说在炭矿本部医院，将来还要分配到台吉医院工作。黑田拍了拍我的肩旁说：“好！您年轻有为，先熟悉熟悉情况，在这个地方好好干……”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北票的治安情况。我要走了，黑田拉着我的手说：“张先生，半个月后您到我这再来一次，咱们详细地谈谈吧。”我回到家已经夜幕降临了。

半个月后，一天中午我又去了警察署。一进署长室，就看见黑田正坐在屋里等着我，翻译老赵也在一旁站着。这次黑田再三告诉我：“等你到了台吉后，先熟悉一下矿上的情况。当前矿山情况很复杂，您要通过您的业务关系，注意一下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并要注意在和您接触的人物当中，发现可疑的行动和现象，随时有事向我汇报。”

就这样，我在局本部医院干了两个多月的化验工作，就把我调到台吉分院去了。

台吉医院，实际上是个门诊所。这里没有病床，只有两间观察室样子的房间，有时这里也住几个病人。当时，台吉分院有一名日本人当院长和一名日本事务长，还有日本护士三人。有中国大夫三人，护士四五人。其中有男护士一人，药房和事务人员各两人。日本人院长，只给日本人看病，看病的地点在西边房间。而中国人看病，只能在东边房间。

我到台吉医院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院长坂本把我叫到他的诊室，对我说：“我打算作两次试验，请您帮忙合作。这两次试验：一个是将斑疹伤寒病人的血静注到健康人的身上，观察病情和病人变化，由你帮助我打针，还做些别的病情观察；另一项试验是把回妇热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臀部肌肉上，然后再观察病情，必要时可作病理的切注。这次试验，由你替我作。必要的病理切注检查，由我自己来作。对这两次试验，将来我要写个论文，请你多加帮忙。”院长坂本说完了话，我当时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1941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忽然，日本院长坂本领着1名日本护士急忙来到我的房间。原来，这个大院是日本人在台吉矿秘密设立的又一个变相集中营——“建国寮”。这里住的都是从外地抓来的人。“建国寮”的四周都围着电网，日本兵把守森严。一进院，就感到阴森森的。住在“建国寮”的人集体上下班，统一行动，上下班都得有人看管着。

我们进了“建国寮”的一间小屋。坂本院长说：“快换衣服。”我们立即穿上胶皮靴子，戴上帽子、口罩，消了毒，然后，他们把我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去。一进屋，我突然愣住了，只见1个中国矿工被3个日本人架着两支胳膊，硬被捺倒在一个墨黑色的铁床上。那人在呻吟地挣脱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健康人。日本人把逼做试验的中国工人叫“木头”，这屋里已绑来十几名“木头”，被三四个持枪日本兵看守着。

试验开始时，他们叫“木头”只穿着裤衩，被绑在柱子上、或床上。好几个日本护士先从患伤寒病人身上抽血，每人抽5CC，然后再注射到健康人的血管里。就这样，一次就作了十几个人的试验。在这十几个人中，我作了四五个人，坂本作了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坂本院长对我说：“这次试验很危险，在这被作试验的十几个人中，大部分人是要死了死了的。”

一连好多天，我看坂本院长差不多每天都去“建国察”，每天早晚去两次，是到观察室去观察被作试验者的病情和看化验结果。

几天以后，坂本院长又一次地找我说：“今晚10点钟，你来我那里再帮帮忙吧。”10点钟我准时去了。这时，坂本正在事务室，我进屋后，他拉了我一下说：“走！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了他的诊室。一进屋，只见窗户遮得严严的，屋正中间放着一张手术床，床上躺着一个尸体，上面盖着一条白单子。我正惊慌呢，坂本对我说：“来帮忙做一下尸体解剖。”说完，我们俩就急忙地换上了衣服，开始了工作。还有个日本护士，在旁边帮忙。在手术中，坂本特别注意这个人的肝脏。只见他取了一片组织，放在了固定的容器中。然后又把尸体包扎好，就洗手换衣服了。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细菌研究吗？作完了手术，坂本对我说：“这个事，谁也不能说。”我哼了一声就赶紧走了。

第二年春天，我帮他作了一次试验。这次是在门诊室作的。这天大约9点钟，我进了门诊室，只见屋内有五六个病人。在这些病人中，有两个是患有回归热病症的，4个是健康的人。首先，坂本欺骗那几位有外伤的健康人说：“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是特别有效的。”开始，我从2名回归热病人的身上，各取10CC的血，分别注入2名健康人的肌肉中。然后，再给那2名病人各打一针606，就叫他们走了。那4名健康人就留在观察室

内观察。这次试验，都是我作的一般注射，三四天后，病人才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可达40℃以上，这时，再作血涂片检查。我发现这次试验未发生症状变化。到第5天，我又从被注射人的局部取一小块肌肉组织，再作化验，这才发现，在4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注射后发现了症状，我就取下了有症状变化的人的组织，交给了坂本院长。

那时，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我还干过出卖“朋友”的罪恶勾当。那是1941年春。在和我接触的病人中，有一位姓马的工人。这个人是台吉矿井下的放炮工人。他身体不好，经常来看病，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混熟了。他很热情、直率，有什么事都愿和我说说，还有时请我到他家做客，并吃顿饭，渐渐地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

6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下了班，吃完饭，顺便又到他家中串门。他的家就住在离台吉医院不远的西南角上。我走进他家的院子，发现老马的老婆和两个孩子正在外屋吃饭。他老婆看我进来，就赶忙地让坐、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过了。”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老马出去了？”他老婆就提高声音地说道：“在里屋不知干嘛呢？”我一进屋，猛然发现老马正慌慌张张地往床上推送着什么东西。我看见他神色不对，就追问他：“老马，怎么了，倒腾什么呢？”他说：“没啥，一个破广播匣子，修理修理。”我说：“那，咱们拿出来听听吧。”他听我这么一说，脸色有些变了，一面挡着我，一面用很低的声对我说：“老弟，咱俩交情可不错呀，这回事你可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呀！”我哼了一声。他又接着说：“这事你知、我知，心里明白，我就感恩不尽了。”我们俩又聊了一阵，我就回家了。

回来之后，我一连几天反复思考着这件事。想来想去，我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还是决定给他告密了。第二天，我

向警察署长黑田作了汇报。后来，我碰到了警察署的赵翻译，他对我：说：“那事你报告后不到半天，警察署就把那个姓马的抓去了。”又过了两个多月赵翻译又告诉我，那个人已死在警察署了。

我家住在兴城，1942年秋我父就来了一封信，要我回去自己开办一所医院。后来，我把父亲来信叫我回兴城的事告诉了坂本院长，又报告了黑田先生，还真得到了他们的许可。黑田对我说：“这也好，在哪里不是都一样的效忠天皇。可是你走之前，要再来警察署一趟啊。”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警察署，黑田和翻译赵德生都在，黑田对我说：“接关系的信都写好了。你到那里之后要好好的干，听你的消息。”我一看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兴城警察署的；一封是黑田亲自写给兴城宪兵队浜田个人的。我装好了这两封信，就告辞回家了。直到1942年年底，我才把一切关系办理完毕，去了兴城，又在那里干起了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勾当。我不但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用中国工人做细菌杀人试验，而且我在日本侵略者的豢养和怂恿下，也充当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成为人民的罪人。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

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

韩蔚

川岛芳子——北野——中村

1938年春季，我到北京见到金璧辉（川岛芳子）^①时，金曾对我说：“关东军军医部长榎塙隆二（中将）给我介绍一个北野大佐^②，今天晚间在我这里吃饭，你来得正好，有机会多认识一个日本朋友，是很有好处的。”接着她又说：“北野不但是军事家，还是个科学家。在华北的日军将领们都称赞他是个人物。跟他交往的人，在中国人里，恐怕只有家兄（指金璧东）^③，如果跟他拉拢上，要什么地位都不成问题。”

那天晚上8点多钟，北野身穿日本和服，带着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一个叫中村，另一个名字忘记了）走进了金璧辉的客厅。北野邀我第二天到日本饭店千代田去吃饭。在座的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今井参谋处长、松本大佐，和那个穿西装的中村吉二。北野在桌上介绍情况说：“今井处长和松本大佐你们都是熟人，中村医生是医学界的著名人士，也是现代的科学家。”原来中村得过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是专门研究细菌的。中村问我认识不认识吉林省卫生厅长望月升（日本人），我因为和望月升很熟，就详细介绍了望月升的近况，我俩聊得更亲热了。之后，

① 川岛芳子：清肃亲王善耆之女，为日本浪人川岛流连之养女，改日名。

② 北野大佐：日陆军军医北野政次，后升为少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任731部队长。

③ 金璧东：清肃亲王善耆之子，曾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

中村对我说，他最近要到满洲（东北）去工作，地理人情很生疏，希望我能多给他介绍几个中国朋友。

宴会之后，我到金璧辉的住处。她问我今天会见的都有谁？我说都是些熟人，只有中村吉二是初次见面。金说：“中村这个老小子见人就抓，也不怕棘手，你不要跟他接近，免受他的细菌感染。听说中村要到满洲去成立传染病院，已经辞去军医中佐的职位。他还不到退役年限，到满洲去恐怕是另有使命吧！”金又说：“中村是个中国通，新京（长春）他更熟悉，在十多年前他就在新京头道沟开过洋行，卖药贩毒（白面、鸦片），他很有钱，用钱找他行。据说他这次是受石井四郎的命令要到千早传染病院去进行生物试验。”

从金的谈话里得知，中村时常到她家去，很早就想要认识几个从满洲来的中国人。这次抓住我，当然不肯放松，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想法叫我到他家去串门。

我和中村接谈后的第二天，就到中村家去做客了。中村住的是一座中国式的四合瓦房，室内大部分是中式家具。这天中村全家有计划地接待我这个“满洲朋友”。中村穿了一身中国式袍褂，他老婆也穿的中国式旗袍，连侍女们都换上了中国服装，只是鸭子步没有改掉，冷眼看倒看不出“大和魂”味。全家都说北京话。中村对我说：“韩先生请到我这来住吧，我这比金司令^①那安静得多。有时间我们可以多谈些满洲情况。满洲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接着中村诉说了他是1928年从日本陆军医院退役到长春开设药房的，1937年他应召到日本大本营作过化学兵团的工作计划。中村又说：“我常听金司令阁下说，韩先生是笠原^②参谋长阁下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北部（英俊）中佐曾谈

① 金司令：即金璧辉，因曾当过“安国军”司令而得此名。

② 笠原：日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

过韩先生为大东亚共荣圈奔走过土耳其的和平，您真是一位忠诚的日满亲善者。我不瞒您说，我要去新京一〇〇部队工作，到新京时，还要请您多作向导。”

我听说过一〇〇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伪满警务总局参事官孙仁轩也向我透露过一些情况。还有千早传染病院和一〇〇部队秘密协作，经常给运传染患者和尸体，数字很大。究竟内情如何还是个谜。有一次，在中村喝醉酒后，我套出了他有关一〇〇部队的下述谈话。

中村说：“大量制造病菌，使之分泌毒素，一不用花费大批金钱，二不用特设制造工厂。论起现代化战术，日本在这方面（指细菌战）可是走在前边了。”“这种方法研究起来很有趣，在任何一个研究室里都可以大量制造。甚至在研究医用细菌的招牌下也可以进行。而且很多为工业发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能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毒品。”他说：“你不是开过制药厂吗？对化学是很有研究的吗？未来的科学战，细菌战是最便宜的。它可以用最小的本钱，大规模地消灭敌人。”中村还讲，日本早在三十几年前就着手进行细菌战研究，日本大本营里设有军事研究室，专门研究细菌战术。石井四郎就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说，鼠疫、霍乱或者伤寒病病菌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资都将受到损坏，而细菌战术只是使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中村还透露：日本陆军军事研究所正在研究海下原子炮，一旦成功威力更是强大。谈话末尾，中村嘱咐我：“我们今天的谈话都是科学家的幻想，日本这种新的科学战现在还保密，可别对外人说。”

见到石井四郎

中村从华北到伪满新京。他在千早传染病医院工作不久，就调到一〇〇部队。这期间他和我相处得很不错，我们经常到“日满料理店”和“军人会馆”去喝酒。中村的老婆是石井四郎的妹妹。石井四郎是日本出名的“细菌学专家”。不久以后，石井来到伪满新京。

我曾在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会见过石井四郎。石井中等身材，语音很尖，态度稳重，显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他说：“战争光靠兵力，对今天来讲已经过时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害物质的有力武器，既简单，又便宜。不久即可在无住宅区（作者按：石井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这样的话，中村也曾说过。

石井到新京不久，吉林省白城、前郭旗等地相继发生了百斯笃（即鼠疫），以后又蔓延到农安、德惠。

参观一〇〇部队

1941年5月，中村邀我到一〇〇部队去参观，里边的实验室皆用代号。进一个培养室要经过五道门。我们走到一个实验室，被一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阻止说：“现在正做试验，非本室人员不准入内。”中村说：“这里是传染病尸体化验室。”中村看出我有几分失望的样子，就领我到地下室的实验室去参观了。地下室设有湿度表、温度计和洗涤器具。洗完手，戴上口罩，换上白衣服，又经过消毒，才准许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排大小不同的电解槽，里面是用药水泡着的“琼脂”，又名洋菜，是用来培养细菌的一种食料。第二排案子上放着大小不同的培养皿，两边有大型烘箱，还有荧光灯、高压灭菌器等。再往里走，两

边是暗室。中村说：“这里是培养室。”又说：“生物杆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的媒介，生长于普通培养基，需氧气，不运动。如果把它放置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可以生存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如果放在完全干燥的空气中，二三日内即可死去。这种菌可生存在米谷、棉花上，加热到80℃即可死亡。但耐寒力很强，冰冻之下几乎可以无限期生存。”

又往里走出50多米，往左拐入地下暗室。这时顿觉空气阴森，一股令人作呕且又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逼得人难以自由呼吸。只见走廊两旁约有十几个门，全用红黑布制的门帘挡着。这时正值中间一个门开了，从里面推出一輛手术床，由3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推着；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地堆起至少三具尸体。当时，我心里感觉像有块石头猛地一沉。这时有个日本人把中村引向一边，背着我不知嘀咕些什么，好象问中村为什么把外人带进来。中村搪塞说：“这是楠本（关东军司令部附军事部最高顾问，中将）叫来的。”

再往前走，两边的屋子里陈列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干燥箱，有个屋子里都是化学药品。再进到另一座楼里，里面特别宽敞，安装着四个能容约1吨左右的形似灭菌器的装置（类似立式反应罐），正面装有冷凝管。另外几处都有人看守，并且有牌子写着“不准入内”。据中村说，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有指定的工作范围，不准随便乱窜，纪律特别严。

据我所知，日军在“七·七”事变前后，就曾使用过细菌武器和毒气。建立了以干旱病院为基础的细菌培养中心，之后又建立了一〇〇部队和七三一部队。他们以中国人（多半是所谓“政治犯”、“思想犯”，也有妇婴）作为细菌实验品。据说被实验者不下3000多人。中村就对我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一〇〇部队送活人作实验”。

“荣”字部队的细菌实验

1942年我在徐州时，曾接受“平林”师团的命令搜捕鼠类。因没完成任务，该师团参谋长把我召去开了一次会。因这个任务特别迫切，我曾问过板田（日军中佐，元泉参谋长的亲信，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当时交给我一个小册子，我看到板田用红笔在“荣”字部队上划出标记。我当时想乘机了解一下“荣”字部队是否跟满洲的七三一部队相同。有一次，我和板田在他家喝酒，板田说要老鼠是用来研究细菌武器。他说：“南京的‘荣’字部队设有石井式培养器200多具，能造出廉价的杀伤力强大的武器来。它可能消灭或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而不破坏他们的军用物资。”

“荣”字部队也叫一六四四部队，是1939年成立的，创始人也是石井四郎。该部队共设有12个支队，总共有1500人。石井离开该部队后，由石井推荐的太田大佐担任部队长。由太田设计的解育室装有石井式培养器200多具，每一周能制出细菌10公斤左右。这一内部情况是小野寺中佐（曾在“荣”字部队担任总务部长）和板田对我说的。

小野寺亲自参加过石井部队远征队的协助工作。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均使用过细菌武器。撒布的办法，都是用飞机撒放鼠疫跳蚤。他们还把撒放过程摄成电影。我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过这个秘密新闻纪录片。纪录片开头是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的下面；接着是飞机飞到“敌占区”上空，下面有“敌军”移动，还有村庄；然后是飞机返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四郎和另一个日本军人走出机舱；最后是银幕映出“结果”二字，映出中国报纸和报纸的日语译文，写着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

1942年，我在徐州平林师团司令部再次看到撒布细菌的纪录片。内容大体一样，只是镜头多些，解说词详细些。这次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和飞机着陆进行消毒的镜头，还有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衣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的镜头。

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

听说，石井四郎在1940年夏季，亲自率领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前往上海以南和华中汉口一带撒布细菌。据说，其目的是在具体战斗环境下进行一次大量散播细菌的实验。听小野说，鼠疫菌装在特制的瓶子里，这些瓶子装入金属制的盒子里，再把几个盒子装入放有冰块的特制大箱子里。飞机空投前，用鼠疫菌感染跳蚤。

1942年夏季，七三一部队派出100多人，与南京“荣”字部队共同组成远征队，撒布伤寒菌、副伤寒菌污浊我国居民的蓄水池和水井。特别是在南京战俘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

当时在南京有中国战俘营两处，约3 000人。石井四郎首先视察了战俘营，然后让战俘吃特制的烧饼。据参加这一罪恶活动的清水说，烧饼是由“远征队”做的，用注射器把细菌注入烧饼内。战俘吃完烧饼，就全部放走。其目的是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病流行。他们还把这些细菌注入西瓜和香瓜里，强迫战俘吃。

1944年春，我由华北回到伪满，在元泉少将^①家里见到宫田中佐（日本皇族）。宫田住处离我家很近，我们同坐一辆汽车回家。他下车时车上还有一个纸封筒，我招呼给他，他说：“那

① 元泉馨少将为关东军司令部附兼伪满军的高级顾问。

是给你的。”到家拆开一看，是日军十三军团的“秘密战勤参考”，其中有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如要求日本士兵带着石井特制的烧饼，宿营时放在睡铺左右，当作忘带走的食品留给中国居民。

投放腊肠杆菌

1945年，铁华部队^①接受命令：限期“肃清”北宁铁路沿线的“赤色分子”。但搜捕扫荡不见成效。于是请求“荣”字部队的别动队支援。后来可知少校弄到腊肠杆菌，派李兴棠带3个人去执行任务。李回来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一个用铅皮包装的木箱给铁华部队运去，是否使用和使用方式，他们都不知道。据说，那之后，在铁道沿线的两侧，一些蔬菜腐烂了，许多牲畜死亡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铁道两侧宣布为疫区，强迫老百姓迁移。

秦皇岛军事演习

1945年6月间，伪满军驻冀东宪兵团渡边科长和战地行动队可知少校，带翻译郝玉衡，到秦皇岛参加日军军事演习。郝玉衡回来后对我说，这次演习有一〇〇特种部队参加。一次演习是：先把两个“囚犯”放在指定地点，飞机低空飞行，在距前二三百米的时候，施放毒气和另一种化学毒品。结果两个被害者的皮肤都被灼伤，呼吸困难，两眼睁不开。30分钟过后，两个人的皮肤上都长出有扁豆大小的红斑，附近植物的叶子上也长出了白色的斑点。

另一次演习是飞机投放无声炸弹，爆炸时产生一股黑烟，接

^① 铁华部队：冀东伪军“铁石部队”中的特务部队“战地行动队”的别称，曾执行过撒布细菌的任务。

着地面上笼盖一层黑绿色的烟雾，烟雾消失30分钟以后，才验证被害者的中毒症状。被害者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流鼻涕、全身软弱无力、皮肤发热、呕吐、口流白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郝玉衡是伪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对中毒症状说得比较详细，我青年时也学过医，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的细菌战

内蒙古政协文史委

1939年7月初，在诺门罕布尔德诺尔和胡鲁斯台诺尔之间，日本关东军开来了一支奇特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周围布满了指向天空的高射炮，巡逻队牵着德国种的“黑盖”和日本种的“狼青”等优种警犬，戒备十分森严，即使是日军各作战部队，也不准许接近这片禁区。

当时日军的军服全是黄色，而这支部队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服装则是草绿色。军人上衣佩带着肩章、袖标、胸章，下面是马裤、靴子，帽子的前沿缀有一枚黄色的星星，翻着手枪和战刀。文职人员穿着草绿色的开襟面服，系草绿色的领带，也带肩章，胳膊上带“山”形臂章，胸前有的绣着一颗紫星，有的绣着黄星或白星。各种颜色的星，区别着每个人的等级。这支部队人数虽然不多，日军的各部队长们却都敬而远之。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细菌战部队的作战计划

关东军司令部在诺门罕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制定出在诺门罕地区和哈拉哈河两岸的细菌战作战计划。如果日军作战失利，细菌战应付诸施行。

石井四郎大佐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

1. 将装有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及食品的炮弹，用皇军炮兵阵地上的大炮发射出去。

2. 使用飞机空投石井瓷壳炸弹，这种瓷壳炸弹，里面装有5 000只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借助少量火药的作用，使它在稍为高出地面上炸开。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这样的瓷弹，去哈拉哈河两岸投掷。跳蚤一落地，就能发起一个扑寻热乎乎人血的行动了。

3. 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处投撒细菌和剧毒，使河水污染。为此，制作了精密的哈拉哈河西岸的供细菌作战的地图，上面标着可供细菌污染的饮用水源、河流、泉眼、湖、泡和水井等作战目标。

细菌战必须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甚至不能让友军知道。可是进行中又必须得到友军的协助，否则将出现误伤本军的事件。

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凭他多年从事间谍与反间谍的经验，对照目前关东军司令官向苏蒙军进攻的命令，认为石井四郎大佐的3个方案都不可行。

首先，用大炮发射细菌弹不可能保守机密。皇军炮兵阵地经常遭到苏军炮轰，细菌弹有可能在本军内被炸；用飞机空投有可能被苏军高射炮或苏机击落在东岸地区，将危及本军；敢死队深入敌后可能性不大，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军都严密把

守，而没有驻军的地方是一片空旷的沙原，既没水源也没有敢死队生存的条件；最后决定由石井部队碇常重少佐组织敢死队，一旦战争恶化，敢死队在哈拉哈河上游撒布细菌，打击苏蒙军的战斗力。并派白俄中校郭索夫到上游地区防卫的兴安师，进行防谍保密工作。

7月10日，当小松原中将在西岸和东岸的军事行动都归于失败进行战线整顿时，关东军司令部石井部队开始行动。

哈拉哈河被细菌污染

7月13日午后1时30分，石井大佐在胡鲁斯台河南岸的步兵第71联队都里通知说：“不要饮用河水，河水可能已被污染。”同时，日军第一线各部队普遍地使用了“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饮用过滤出来的水。

石井大佐到处“访问”，通知不准饮用河水，部队要喝过滤的水，并不是在搞战场卫生，而是他的细菌战敢死队开始了行动。

碇常重少佐带领着包括2名军官在内的22名敢死队员（这些敢死队员在哈尔滨平房防疫给水部出发前，都用鲜血签了名，宣誓不泄露任何机密，直至死去），偷偷摸摸地在兴安师后方距补给所不远的松林里，从汽车上卸下物品，然后，背起了沉重的行囊，沿着松林边缘向哈拉哈河岸走去。

用布包裹着的物品里有2只充气式大型胶皮船，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还有大型皮箱、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和绳索等。

到了哈拉哈河岸边，碇常重少佐用望远镜看了看对岸，没有发现苏军，天空也没有飞机，虽从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隆隆炮声，但距离这里不下20公里，少佐命令开始行动。敢死队就在

岸边一人多高茂密草丛中开始组装器材。胶皮船充气鼓起来后放进河里，又把两只船的船尾用绳索捆在岸边，把金属容器和铁水桶装进船里。他们上了小船，向河中心下游划去，当驶到岸上绳子拉紧的时候，两只船上的士兵同时打开了每个容器的盖子，然后将容器扔进河水中。

容器里装的是鼻疽菌，只要牲畜喝了被鼻疽菌感染的水，两周内就死亡，而人饮了就发高烧，浑身浮肿，四肢无力，最后死亡。在当时，还没有制服鼻疽菌的特效药物。容器里还有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

容器在水底下慢慢地、不断地放出鼻疽菌，顺水向下游漂去，两只胶皮船顶着水慢慢向上游划着，伤寒、霍乱和鼠疫菌的容器被丢在水里，两名军官在提取水样，测试温度，做着记录，并进行拍照。

这样行进了1公里，将带来的全部容器都抛进河内。投入河中的各种细菌共重22.5公斤。

历史在作证

诺门罕停战后，1939年10月2日，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向石井部队颁发了奖状。

诺门罕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照片底版及碇常重少佐等22人敢死队签名的血书，都保存在七三一细菌部队教育部长园田中佐的保险柜里。1949年12月26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庭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原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长西军医中佐作证时，证明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争发生时，使用过细菌武器，他在接任园田中佐的教育部长一职时，发现保险柜里存有碇常重少佐在诺门罕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和照片。铁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大量捕鼠繁殖细菌

榎原秀夫 田村良雄
秦正氏 萩原英夫

七三一部队及其支部，并不只限于捕鼠和繁殖白鼠，还令关东军的后方医院和物资仓库都饲育白鼠。也曾企图从伪“兴安西省”强制购买野生栗鼠代替老鼠。例如林口支部长榎原少佐即大肆宣传各种“鼠害”，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搜捕。只遭到七三一部队的鼠类，4月为1 000只，5月1万只，6月8 000只，7月7 000只，共达2.6万只之多。6月以后，各支部也都进行“饲蓄教育”，并各分得1公斤蚤开始饲育。

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四课参谋原守中佐，第一课参谋宫田协商“要伪满洲国每月搜交20万只老鼠”。7月中旬，派调查课长石光熏、课员秦中尉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物色生产鼠疫菌蚤的工厂。该月下旬，便以关东军嘱托的名义，派到司令部归原参谋调遣。还打算通过伪满洲国的警务总局，动员所有伪害；强迫每月从沈阳地区捕10万只，长春5万只，哈尔5万只老鼠，送到上述地区的生产工厂，尽全力生产鼠疫菌蚤，谎称为制造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标题由编者所加）

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市 收购老鼠搞细菌战活动

马恕知

这是伪满时，我在奉天南市场警察署任警察交通中队长身历目睹的事实。康德7年（1940年）7月至8月间，日本关东军某部派遣一部分人到沈阳日军总后勤医院（地址在马路湾大街南），在奉天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奉天宪兵总队协调下，逼令伪奉天市警察局转令南市警察署长牧野亚一，召集署下23个派出所及街道保甲组织等人，叫该地区住户居民用耗子打活耗子。大的老鼠给1角钱，小的给5分伪币，每天送交当地各派出所，有专人负责收鼠付款。日军用军用汽车（带碾子的），从各派出所将收的老鼠送到陆军医院内存放。收老鼠的日军穿白大褂，带口罩和胶皮手套，每天到派出所给收放老鼠的地方消毒。对外就宣称：大小西关和商埠地一带老鼠太多，容易闹百斯笃（鼠疫），故而在重点处收鼠做防疫试验。在7至8月两个月内，共收老鼠十万三千多只。日军分批把收的老鼠金数用大汽车运送到洮南火车站，又用汽车转送交白城子地区关东军某部设立的制造鼠疫细菌站，进行试验培植细菌。

在收老鼠的活动结束后，日军工作人员出钱委托南市场警察署长，对属下各派出所警官每人赏金5元，街道保甲长亦赏金5元，另外对负责收购老鼠的伪警另奖给10元。以此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三辑）

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覆灭

韩 晓 辛培林

销毁罪证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前的半个月，整个七三一部队处于内外松懈的状态。中国劳工看到，他们行动匆忙，精神紧张，在背着中国劳工干些什么勾当；对劳工的管制也有些放松了；那些曾耀武扬威的职员和士兵们却一反常态地萎靡不振，并唉声叹气地发起愁来；甚至有时吞吞吐吐地对中国劳工说，我们要走了，你们也要快回家了；那时，中国人当“掌柜”的，日本人“苦力”的干活。中国劳工从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这些情绪中，觉察到日本侵略者即将垮台的预兆。

就在这时，在七三一部队的从事细菌战的骨干人物更处在慌乱之中。他们一方面纠集先遣人员，向通化转移，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清理文件、资料，并分别打成捆、装上箱，用汽车或马车，不停地往动力班锅炉房运送。已经停火的暖气锅炉又开动起来。每当满载资料、文件的汽车或马车到来的时候，即把中国劳工撵得远远的，由日本人亲自把成捆成箱文件、资料扛到二楼，从投料口扬进正在燃烧着的炉膛里，并一直监视着，到烧光时才肯离开。动力班中国劳工韩建国就曾看到日本人用汽车往锅炉房拉东西，把各式各样的纸张、不同规格的木头箱子都投进锅炉里烧了。他在下面给收拾灰烬，日本人站在旁边监视，发现没烧尽的纸张，他们就拿到楼上重新去烧。由于焚烧的文件、资料太多，两台锅炉烧不完。于是，他们又把那座不

经常使用的锅炉也开动起来。据中国劳工证实，日本人还把一些贵重的仪器和装菌的玻璃瓶、试管也打上包装，扔到膛里焚之一尽。七三一部队这样大规模地焚烧文件、物品连续进行了半个多月。

8月10日晚上开始，七三一部队各个班的院内也都成了火海，成堆成堆的文件资料扔进火堆化为灰烬。一个个日本兵被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花脸”。他们尽管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还是烧不完，于是，就不得不把数百台精密的显微镜等贵重仪器摔碎；大量的一般性资料，无所顾及，任其飞散。八木班北边的场院里，原来为破坏中国或苏联的农作物而准备的三大堆黑穗病的麦桔也被点着了，大火照红了半边天。山口班贮存的大量细菌瓷弹壳，全部转移200米以外的地方砸碎。

与此同时，“四方楼”的院内更是浓烟滚滚，散发出一股扑鼻的腥臭味。原来，那两座“特别监狱”里还监押着没来得及使用的活人“实验材料”达400人之多，所以，他们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手段。他们为了加快速度，争取时间，使用了速效能的毒气，在不到几分钟时间就把这些“囚犯”置于死地。在他们施放毒气的时候，有的“囚犯”拼命地挣扎，甚至冲出铁制栅栏。但是，残暴的日本恶魔们开枪向手无寸铁的“囚犯”们疯狂扫射。然后，这些刽子手们把尸体拖进早已备好的大坑内，浇上汽油焚尸灭迹。由于尸体太多，摆了几层；加上他们逃跑心切，短时间内未烧透便匆忙地用土把尸体埋上。七三一部队的头目们觉得不彻底灭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于是，又下令把尸体再挖出来，进行第二次焚烧。一个在场的日本兵在其自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状：“许多尸体没有烧透，尸体溢出土坑，还有许多尸体，无法处理了。……一些烧得半生不熟的烂肉，和到处烧得糜烂的脏腑，简直叫人无法收拾。还有，仍带着像活

人的眼球，烧剩下的半张脸，……碎骨烂肉裹着血污，满地都是！使我精神麻木了，就像疯子一样失去了知觉。有些尸骨和陈列室里摆放的细菌实验的标本还装上汽车，在夜里，运到25公里外的松花江边，偷偷地投入江中。

据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贞夫证实，除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所有被关押在“特别监狱”的中国人外，对在日本战败前被抓进七三一部队并认为已经不再需要的中国人，还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方法毒死了一大批。他就曾在下雨天的夜晚用汽车把50个装尸骨的袋子运到松花江边，投进江里。

七三一部队列入破坏计划内的建筑物有“细菌实验中心”——四方楼、监押“囚犯”的“特别监狱”以及研制细菌武器的“兵器班”、装配与贮存细菌弹的“山口班”、培植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田中班”和为细菌实验服务的“动物饲养班”、“航空班”和“动力班”的建筑。于是，自从8月10日中午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撤退命令，对这些建筑物陆续开始破坏。据目击者证实，他们对这些建筑物破坏方法是，轰炸、爆破和焚烧，或兼而用之。

当时，由于整个七三一部队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谁也记不清日本鬼子破坏建筑物的准确日期，据大多数目击者追忆，8月11日开始放火烧毁田中班昆虫饲养舍和石井班动物饲养舍。“兵器班”大院里，百余辆福特牌大卡车和炮车被烈火吞噬着，成箱的有毒子弹爆豆似地响着；“东乡村”的日本官兵宿舍及大礼堂、神社等也燃起了大火；高寿官宿舍西部地下的百余个燃料罐，先是一片火海，随即连声巨响，最后只剩下一片深坑了。

对重要建筑物的破坏措施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8月13日早晨，潘义明、李起余、王子余、侯安钦等中国劳工从正黄旗

三屯到正黄旗五屯的“劳务班”去上工，当路过正黄旗头屯的时候，他们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往东南一看，高大的“四方楼”塌了一大片，它的上空有一股滚滚的烟尘。他们改变了去劳务班的想法，从正黄旗头屯向南走，当临近设有电网的围墙西侧时，就又听到一阵爆炸声。他们看到高等官宿舍、日本小学校、东乡神社淹没在一片浓烟中。

“四方楼”等一些建筑物都是钢筋水泥导制的，普通炸弹难以破坏。8月14上午，七三一部队在“航空班”飞机库旁架起数门大炮，连连向“动力班”锅炉房炮击，但大烟囱只遭到轻微的损伤。这种破坏效果，是七三一部队早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求援于工兵部队在“四方楼”、“特别监狱”等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开凿放置炸药的糟孔。然而，这十分困难。他们不得不马马虎虎地装上黄色烈性炸药，进行第二次爆破。

七三一部队在毁灭各种罪证的同时，充当门卫的保机队员，奉命放弃了对大门的看守，转向了对营区内外的昼夜巡逻。他们个个凶相毕露，见人就打，还没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劳工有的也被他们枪杀了。

杀人灭口

石井四郎认为，七三一部队有2000余名队员及其家属，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和那一些比较知情的中国翻译，在七三一部队溃败之后，如何防止泄露七三一部队的秘密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困难的问题。为此，石井四郎在8月10日晚召开各部部长紧急会议，决定杀人灭口。石井四郎主张迫使全体队员及其家属服毒自杀；对中国人毫不客气地全部杀掉。他的这个主张遭到了各个部长的反对。首先反对石井四郎主张的是第一部部长菊池少将。他认为，对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应

采取积极措施，设法营救回国，不宜让他们轻易地死去；至于对待中国人另作别论，但也不必采取一概处死的办法，因为还有用着他们的时候。一向飞扬跋扈的石井四郎，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第一次采纳了下级的意见。石井四郎等人杀人灭口的计划，首先选择的对象是几个中国籍的日语翻译，因为他们对第七三一部队的秘密知道得更多一些，留下来将会给日本带来后患。可是，有些中国翻译早有警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唯独与宪兵室的春日中一是把兄弟的李初亭没跑。他以为危难当头，日本人不致于背信弃义对他下毒手。然而，他错打了算盘。8月11日清晨，春日中一和劳务班头吕工藤，带着上司的密令乘坐中国马车夫赶的“斗子车”去找李初亭。“斗子车”刚上去正黄旗五屯的土包，遇到装满箱子柜橱、铜碗瓢盆一类家具和鼓鼓三条麻袋的两辆花轱辘马车迎面驶来。春日让马车停下，用中国话问：你们给谁搬家？车老板回答给李先生。于是，他立即放走了搬家的马车，催促着“斗子车”直奔屯内十字路口旁的李初亭家。李初亭迎出来后，春日用中国话说：石井部队长请他去一趟，有要事商量。

李初亭在春日陪同下，坐着“斗子车”来到本部大楼门前。春日让车夫稍等一下，然后和李初亭一起进了大院。不一会，春日出来对马车夫说：“不要等李先生了，他已经坐飞机去了东京。”当坐卧不安的李初亭的老婆孙爱珍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种可怕的念头使她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小时后，从“四方楼”里传出了连声巨响，使她更加意识到李初亭不会回来了。李初亭果然没有回来。后来得知，他被日本人杀死了。这件事，被一个曾在七三一部队当过宪兵的人证实。原来，李初亭被骗至本部大院后，春日事先安排的人在暗处用枪把他击毙，并从他腕上撸下金壳手表。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一是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狡诈、毒辣，当它需要你的时候，便装出一副亲善的面孔；当不需要你，甚至于对它不利的时候，便毫不留情，下毒手加以除掉。二是“走狗烹”，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借机报复

七三一部队干完了毁灭罪证的勾当后，一些高级头目、上层人物差不多都仓皇地逃命了，留下一些下级人员处理善后，并准备同运送最后一批日本人家属的列车一起离开这里。

8月14日，几个日本小头目在劳务班院里就地铺着苇席，拎着酒瓶狂饮。其中有个叫加藤的雇员对菊池雇员说：“那天我打了你，感到很对不起。如果当时潘德亮不告你的‘状’，我是不会打你的。”当时是麦收季节，菊池到仓库领镰刀。第二仓库的中国劳工小队长潘德亮按加藤的要求把旧镰刀给菊池，菊池不同意，硬是把新镰刀拿走了。当加藤发现新镰刀少了的时候，潘德亮就把菊池拿新镰刀的事如实地讲了。因此，菊池挨了加藤的打。这时又有个人叫“秋叶”的雇员也旧事重提。他也是因为在潘德亮没同意的情况下穿走了一双水靴子，加藤知道后责备了他。于是，菊池和秋叶就把仇恨都集中到了潘德亮身上。他们拾起战刀，走出大院，遇上了潘德亮，秋叶抢起战刀一下子把潘德亮的双手削掉，潘德亮忍痛跑到劳务班办公室，想找加藤理论，加藤却随手掏出手枪。潘德亮见势不妙，回身逃跑。当他跑到铁匠炉旁时，被加藤追上，一枪打倒，但没打死。这时，秋叶赶来，一刀从潘德亮的肩膀斜劈下去。赶车老板吴希昌目睹了这一惨景。

日寇在失败之时，无端杀人，发泄兽性，对此，许多中国劳工早有预料。所以在此之前，不少人趁其不备，逃出了虎口。

但在要害岗位的劳工，由于日本人看管得很严而无法逃脱。8月14日，四方楼爆炸后，这些劳工也都千方百计逃出魔窟。这时，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到各班去一看，一个劳工都没有了。

乱作一团

七三一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忙乱地做着逃跑的准备。

当时，平房火车站通知七三一部队去接收从外地发运来的一车“大眼贼”（黄鼠）。他们已顾及不了这些事了，管事的日本军官说：“真他妈的，没事干！”随即把电话摔了。8月13日，铁路专用线上鬼进了一列闷罐货车，日本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集中几十名中国劳工，迫使他们往火车上装大米、白面、豆瓣酱、酱油、白糖、罐头和一些衣物，甚至还有备用的铁管、锅炉等物资。

这天下午，日军的家属挤到“酒保”内的小卖部抢购逃跑时用的必需品。高等官、判任官、雇员及教育部食堂里，都在准备食品。据王世友、鞠复家、韩建成等人证实，训练教育部的头目不许做饭的中国劳工离开，命令加班给他们赶蒸馒头。因为做的数量大，面来不及发酵就做，蒸出来的馒头都是硬的。

这时，七三一部队的营区里更是乱了套。后半夜里，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窜来窜去；教育队的学员，忙着整理行装，闹得乌烟瘴气；东乡宿舍里，嘈杂声、谩骂声、哭嚎声连成一片；医院里的轻患者，不顾病痛奔回宿舍准备逃离，有的重患者，躺在病床上，看着床头上的一小瓶氯化钾流泪，有的在绝望地哭嚎；路上，日本妇女肩扛行李，手拎包袱或扯着小孩，鬼哭狼嚎地拥向铁路专用线，一窝蜂似地往闷罐车上拥挤，有的为争夺一块立足之地而当仁不让，甚至吵骂起来，昔日那种温文尔雅、谦谦让让、彬彬有礼的样子已

抛到九霄云外。事先制定的乘车计划、按部门分配车厢，统统没有人去管它，整趟列车挤得满满的。第一趟货车延续了几个小时后，总算是匆忙地开出了平房站。从这天开始，连续发出了几火车，但是还有些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和家属挤不上车。此时，就是上了车，抢到座的雇员也大骂起他们的上司和本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原来，石井四郎一伙曾下令把航空班的大部分飞机烧毁，仅留下的两架飞机，由他的女婿增田义穗少佐亲自驾驶。那些坐不着飞机，又挤不上火车的日本女人，顾不得地上的泥水，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有的日本人看实在无法逃走，只好另找活路；还有些下级官兵在地下室、仓库里自尽了。光复后，人们在这些地方，曾发现了3名尉官尸体。

树倒猢狲散

七三一部队自顾不暇的时候，远离它的各支队也是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了。

当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林口第一六二支队的时候，他们立刻乱了营，捕捉的老鼠和饲养的白鼠、海猫、兔子、跳蚤以及培养保存的细菌也无法送交七三一部队本部了。

根据驻屯地司令部的通报，得知苏联红旗第一军的坦克部队迫近八面通（林口南50公里，牡丹江东北80公里）时，决定将所有房屋塞满稻草、备足燃烧用的汽油，将乌斯浑河水源地的抽水机筒砸碎，间所少尉以下25名官兵和汽车5辆，作为后队暂时留守待命。

8月10日，榊原秀夫率领200人和50辆汽车（包括滤水车、消毒车各一辆）向牡丹江溃逃。此前，他命令留守队接到七三一命令时立即烧毁营舍，然后追赶大队；如果苏军迫近林口还未接到上级指令时，亦应及时焚烧。结果，第二天，留守队就

将房屋、设备以及各种动物都烧毁后奔逃了。一六二支队逃跑时携带着两套器材，共66捆包。经过龙爪附近的高湿地带时，行车困难，要在苏军战车进攻前到达牡丹江是不可能的。于是，8月10日晚，榎原秀夫命令支队庶务室机要员奥村军曹带领两名护卫兵，携带机密文件，由龙爪乘火车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

8月12日，逃跑的一六二支队到达七星时，苏军战车已迫近牡丹江。这时，他们不得不将卡车和器材一并烧毁。8月13日，在东安师团长的指挥下，一六二支队人员分乘两列火车向牡丹江逃去，但由于傍晚在桦林遭到苏军的攻击，队员四散，翌日集结了70名。榎原命令队员以10人为一组突围，由于苏军阻击，榎原和森军曹以及一名士兵掉队，于8月17日到横道河子。在这种情况下，榎原和牡丹江支队尾上少佐会面，并一起到牡丹江日军第五军司令部。军医部长佐藤少将转告他，七三一部队来电，命令一六二支队配属于第三军，令其速去延吉听从该军的指示。于是，榎原和集结在横道河子的70名队员，乘上了经由哈尔滨去延吉的火车，但火车只走一站就无法开动，他们只好徒步奔逃，最后，因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一山坡解散了。

驻扎在海林镇北的第六四三支队，在8月9日晚接到了七三一部队本部昆虫动物研究班长田中少佐给尾上正男支队长的电话，要求火速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但由于形势紧张，他们只想逃命，根本顾不得发送跳蚤。8月13日，他们焚烧营舍时，把各种动物及跳蚤一并烧毁。北野政次于年初批准拨给他们的总重量为三车及75吨的细菌生产设备和蛋白消化素、肉精、肉汁及煮盐等材料，大部分都没用上，也都烧毁在仓库里。他们与一六二支队沿着一条路线，仓皇往西逃窜，大部分人战死。

第六七三支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从平房返回孙吴后，企图

与驻地日军一起退至大兴安岭林中，以便作垂死挣扎。为了销毁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证，8月11日，由大熊带领4名日本兵，急忙把营舍、住宅、动物舍、设备、材料和各种文件等统统地烧掉了。为同样目的，在逃跑之前，给支队全体人员每人发一份毒药，以便在有被俘危险时服毒自尽。后来，这些队员并没按西俊英中佐的旨意办，大部分在败退的途中接受了苏军的劝降，只有1人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8月11日，苏军飞机轰炸海拉尔。日军开始慌乱，他们想把关押在五四三支队附近第十军管区军法处监狱里准备用做细菌试验的人杀死，但没有得逞，10名苏联人从浓烟烈火中冲了出去。8月13日，五四三支队奉命把营舍、实验室、动物舍以及所有设备、材料和重要资料付之一炬，然后，四处逃窜。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

刘天光 袁 丁整理

三岛理化研究所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的一所秘密监狱。它修建于1939年10月，坐落在佳木斯西郊瓦发屯的东北方向，东临佳——绥铁路，南面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隔路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北面是一片菜地。此地偏僻荒凉，很少有行人和车辆在此经过。

监狱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四周设有带高压电网的红砖墙，南面有两扇包着厚重铁皮的黑大门。院内是一圈四合房，共20间，分别建成18个双人牢房，窗上都安装着炉篦式的铁

条。被敌伪特务抓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只有两种结局：一是提供情况，然后被秘密处死；二是闭口不谈，即被送往七三一石井细菌部队当“马路大”（被作细菌试验人员的代称）。这里不是普通的监狱，而是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

血的证据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末日来临了。然而，自命对“东亚秩序负有使命”的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放下屠刀，在行将灭亡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8月12日午夜，佳木斯市笼罩在恐怖之中。一部黑色轿车，从伪三江省警务厅门前驶出，直奔三岛理化研究所。大约10分钟后，汽车来到这所魔窟门前，鸣笛三声，两扇黑大门应声而开，汽车直入院内东厢房南头猛然刹车停下。从车内钻出5个穿着普通服装的日本人，他们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的特务桥本喜一郎、佐藤正熊、井光男、谷口传三、高桥大郎，他们是奉保安局长北原的命令，到这里对监狱所有的人进行“最后处置”的。

这5个日本特务下车后，便从东厢房南头的房门鱼贯而入，然后沿着走廊，走近几个鸽子笼式的监房小铁窗口前，用凶狠而又低沉的声调对着小铁窗叫道：“米那，他待！”；“奥马爷，他待（站起来）！”当被关押的形销骨立的人们站起来后，这5个人便拔出手枪，分别对关押在各个监号里的人们开了枪。……5名行凶者退回暗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相互调换了各自行凶的监号，用手枪对着躺在血泊中的人们补枪，直到他们确认被关押的人已全部死去为止。

8月13日凌晨，这所孤伶伶的秘密监狱异常沉寂。经过这场血洗，共有36人惨遭毒手，就是平日为他们看大门、做饭的

白俄和朝鲜人也未得幸免。

然而，人们见到的仅是这次大屠杀的一角，更加令人惨不忍睹的事实还在这座院落西北角那个大坑内外。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远东部队进驻佳木斯。8月21日，地方维护持会组织一些人到三岛理化研究所掩埋死难者尸体，当时目睹现状的李枢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在这所阴森恐怖院落的西北角，有一个长约10米，宽8米，深2米的大坑，坑底横躺竖卧着14具无头尸体，已开始腐烂、变形，手腕和脚踝上都带着镣铐。在尸体下面和周围，还有一堆堆的白骨。坑南10米处有一堆被火烧过的各种刑具，当时尚可辨认出有绞架、电椅、电床、皮鞭、铁棍等。经过清点，院内共发现54具尸体，其中14具无头。当时院内腥风四合，空气窒息，目睹惨状的人们莫不潸然泪下。

同仇敌忾

地方保安局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是对苏派特务，抓捕苏联谍报员，刺探苏联军事、政治等各方面情报；二是破坏镇压我抗日救国运动。所以在保安局下设的秘密监狱里关押的全是政治要犯，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

8月12日夜时保安局血洗三岛理化研究所时，那里只有41个人了。其中36名在押的中国人，还有看门、做饭的4名白俄和1名朝鲜人。当5名特务行凶逃窜后，却奇迹般活过来4个人，他们是：

张人天，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10支部书记长；

何家训，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08支

部党员：

李广德，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

李遇迟，又名贾占河，共产党员、抗联战士、苏联谍报员。

上述4人也和其他死难人员一样，在凶手罪恶的枪口下倒在血泊中。

张人天左臂中两枪，伤势较轻；何家训身中三枪，其中一枪从左腿射入打掉四颗牙又从右腿穿出去；李遇迟连中八枪，胸部伤势严重；李广德身中八枪，伤势严重，右膝盖下骨折。当他们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首先意识到的是：“日本侵略者完蛋了。祖国光复了。”但一时还摸不透敌人还有什么阴谋要施展，便各自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相应的保护办法。张人天醒后立即把身体靠在死难者何振国的身后，并用受伤的左臂搂着脑袋；其他各监号活过来的人也在装死。他们都屏息静气，细心判断敌人的动向和自身的安危。

距枪杀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天渐渐亮了。当时有5个人卧在血泊中还活着。他们全神贯注地谛听这恐怖之夜所能发出的一切声息。当确信敌人不能再回来时，他们多么想即刻冲出这杀人魔窟。可是，敌人已经断绝他们饮食两天了，身上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窗口是粗重的铁条，房门还牢牢地紧锁着，幸而未死，却也无法逃离。在这濒于死亡的绝境，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促使他们艰难地活动起来。腿没受伤的支撑着站起来，腿不听用的爬着走。有的撕下衣角或用碎布卷起来蘸着地上的鲜血在监狱墙上写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等充满爱国激情的标语。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伤势较轻的张人天。他把砖头的一端磨成片状，用它抠开墙壁的灰口，这样每抠下一块砖都要消耗很

大体力，他那虚弱的身体累得汗流浃背。最后他终于把厚厚的牢墙抠出一个小洞钻出来，并用两个木杆爬上围墙，用棉被盖在电网上滚了出去。

接着，关在其它监号的何家训、赵连青也相继破坏了窗户或墙壁逃了出来。他们艰难地走到关押李遇迟、李广德的监号，打算把活着的两个难友救出来。但李遇迟和李广德都身中八枪，李遇迟仍处在昏迷状态，李广德神志清醒，但身体一动也不能动。当何家训说要救他们出去时，李广德呜咽了。他诚恳地告诉何家训、赵连青二人说：“我身中八枪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命在旦夕。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人没有指望的人，再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受到损失了……”李广德说着又昏过去。

何家训和赵连青眼含热泪离开铁窗。然而，赵连青因失血过多，走到监狱大门口便牺牲了。何家训悲痛地望着一起逃出来的赵连青，又回头看看关押李广德、李遇迟的铁窗，艰难地走出了牢门。

何家训走出牢门的时间是1945年8月14日下午。此时，在三岛理化研究所的院落中，只有国民党员李广德和共产党员李遇迟还有微弱的气息。当初，李广德和李遇迟同关在一个监号里。李遇迟是个被关押一年多的“老犯”，李广德刚入狱时，二人关系还好，可是彼此知道对方政治身份后，问题就来了。每当政见不同时，两个同监难友就背对背地坐着，长时间互不搭理。可是，当涉及对付敌人的问题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致起来。李广德入狱第一次受审，李遇迟怕他受不了酷刑，就告诉他说，万一挺不过去，就抓几个垫背的。并告诉他要装得像些，要像经过“痛苦思想斗争”后，再把那些汉奸供出来。李广德如法炮制，在一次审讯中他供出作恶多端的伪铁路警察张世利、郑贵勋二人是自己的“同伙”。结果，险些把两个坏蛋打

死，而李广德却被敌人“闲置”了一段时间，得到了恢复体力的机会。

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们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

何家训走后，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李广德再次苏醒过来。看到身旁的李遇迟也奄奄一息，他深感已无力从牢房走脱，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拆了自己的线毯搓成绳子，用尽全力挂到窗上……。可是，他忽然感到脚下有人在活动，他也随着从窗上栽了下来。当他睁开眼睛时，李遇迟正在用牙齿从他脖子上一条条往下撕那绳子。他不敢想象李遇迟在四肢几乎不能活动的情况下，是以怎样的毅力支撑身体将自己救下来的。当李遇迟劝他：“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时李广德不禁失声痛哭。这两句质朴的语言，又燃起了他的信念。

8月15日晨，他们终于从牢房破墙而出。他们来到厨房找到六个鸡蛋和几条黄瓜，吞吃后感到体力好像有些恢复。他们又发现西大墙下有个汽油库，便又回到厨房找到火柴，把汽油点着。顿时，三岛理化研究所浓烟蔽日，火光冲天，这座杀人魔窟成了一片火海。

这时，日本武装人员已从市内撤走。附近居民见这里烟火冲天，便三五成群拥入这个黑大门。因为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敌人的秘密监狱，特别是从这里跑出两个“犯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居民们都互相传告，并四处寻找。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大学生李长青：他从邻居家借了一辆手推车，跑到这里认真寻觅，终于在齐腰深的荆棘丛中找到了李广德，用车推回家中。当李广德告诉他，还有一位难友被人冲散走失时，他又推着车子出来，最后又把李遇迟找到，用车推回家中。

李长青的家是孤儿寡母，家境贫寒。母子俩以最珍贵的食

物——大米粥、煮鸡蛋，奉献给两位身负重伤的同胞。后来，经过简单的包扎，李广德被送进启哲医院，李遇迟被送进苏联红军司令部。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佟振宇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在中国满洲地区建立两支部队，专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研究。敕令中，指出这两支部队：“担负的是特殊的秘密任务。”第一〇〇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① 部队长是兽医少将、细菌学家若松次郎。其营地，设在长春市郊孟家屯，现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厂址。

第一〇〇部队与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是同一敕令建立的。所不同者，七三一细菌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即用细菌污染人类居住地区，制造人间疫病传染与死亡。第一〇〇部队，则是用病菌污染牧场、贮水池，制造牲畜间的疫病传染与死亡。这两支部队，名义上同属关东军司令部，但实际上直接听令于日本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里，除有专门委员会领导它们外，还各自有专职部门领导。第一〇〇部队，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兽医部指导，其负责人是中将兽医部长高桥隆笃。据有关资料证实，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里，有个兽医处，对外

^① 正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称马疫研究所，其处长安建诚太郎、中将北野政藏，都负有指导责任。

第一〇〇部队所需的经费，实际上是“依据需要，无限制地拔款”。但平常的经费来源有二：一是由日本陆军省直接拨给，用部队员的给养费的名义；一是由并东军司令部呈报陆军省批准，用制造军马防疫药品的名义。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41年1月至1945年4月1日，总计领到的经费，为100万日元。

—

第一〇〇部队建立后，分别于大连、拉古^①、克山，设立有三个支队。据军方资料证实，自1941年7月起，即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它除在四平设有支队外，同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里，都奉令设立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配合第一〇〇部队的研究工作。

在第一〇〇部队总部指挥下，仅设在长春孟家屯营房的部门，便有第一、二、三、四部和总务部。在总务部下，还设有研究、设计等分部。

它的第一部，主要研究关东军司令部所属各部队的军马，以及其他动物的血液。通过这一研究，来研制鼻疽菌、痘痘菌、传染性贫血菌的方法，并研究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与生产它的方法。

第二部，在1943年前，设有五个分部。这个部，主要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但各个分部，又各有分工。第一分部研究繁殖各种细菌，第二分部重点研究鼻疽、羊痘、牛痘、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三分部管理和繁殖供实验用的动物，第四分部研究

^① 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郊。

有机化学（实为毒性的药物），第五分部研究黑穗病等毒害农作物的病菌。

1943年12月，增设第六分部。它的建立，是因为七三一细菌部队研究鼠疫细菌武器成功，所以第一〇〇部队也设立这个部门，研制鼠疫细菌武器。正由于它是个秘密部门，因而在成立大会上，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亲临会场进行指导，第一〇〇部队长、兽医少将若松次郎亲自主持，并有许多高级官佐如：副部队长保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井田清技师等人参加。高桥隆笃即席讲话，强调“成立第六分部，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会后，他亲自主持制订计划，决定建立大批仓库于地下，并各自成一系统，以保藏细菌武器之用。原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富春，在1947年到长春任职时，特地到该部队的残址参观。他目测之后，认为第一〇〇部队所占土地面积，至少有20余平方公里。

第一〇〇部队的人员，时有变动，故人数不定。但人员仍经常保持在600到800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员，是兽医专家、医学家或学者。而对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员，也通过训练班的方法，进行细菌学基础知识的教育。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在其被俘时供认，他自1941年4月起，直到1944年10月，多次参加集训，学习炭疽热菌、鼻疽菌等的培植方法。他主要管理孵育器，负责繁殖细菌。在他主管期间，每个月分别可生产炭疽热菌1000公斤，或生产鼻疽菌500公斤，或生产黑穗病菌100公斤。

兽医师福住光由被俘时供认，第一〇〇部队研究用各种细菌毒杀牲畜的方法，是由许多兽医学家、细菌学家、化学家、农艺家等，共同配合进行研究工作的。

第六分部长平櫻全作被俘时供认，第一〇〇部队制造出的

大量细菌和化学药物，都储存在地下特殊仓库里。进入地下仓库，需有特别许可证，并要用浸透特种防疫、防毒药水的口罩，将口鼻捂严严的。还要戴上特制胶皮手套，才能去拿特制的铁盒。因为在这些特制的铁盒里，装有最烈性的细菌或化学毒药，所以必须防备自身的污染。为保密起见，这些特制的铁盒上，只用油漆涂写号码，决不许写上细菌或化学药物的名称。

二

第一〇〇部队的研究项目，虽是毒杀牲畜的细菌或化学药物。但，在进行实验时，是人畜并用的，一律称为“实验材料”。

1941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麿笃，奉命监督和指导第一〇〇部队，以牲畜作实验，一次少则几十头，多者上百头，用来实验各种细菌的效力。

1943年9月，在中苏边境^①组织所谓“关特演”的军事演习，关东军司令部要第一〇〇部队参加，进行细菌战的实验。为此，用300头牛马作目标，用烈性细菌和毒物作实验。关东军司令部特派高级军官，乘飞机从空中视察。实验结果，300头牛马，全部倒毙死亡。关东军司令通令嘉奖了第一〇〇部队。

据军部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8月20日，第一〇〇部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还继续犯罪。由其属下二六三〇支队技术员桑原明，在支队的马棚里，指挥士兵灌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长谷川等6人，将鼻疽菌掺入燕麦里，喂给60匹马。然后，全部驱赶到附近的村庄里。结果，使农村里的马匹染上了鼻疽症。

^① 据查是在黑龙江省的安达。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被俘后，供认：他在第一〇〇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的活动。他也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但与七三一细菌部队亦有不同处，即除少数留做继续实验用外，大多数是“实验”后枪杀。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就当三友一男的面，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其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连续进行多次实验。他奉松井技师之令，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说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等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全被“实验”折磨致死。

1943年8月，三友一男在实验室里，按松井技师的安排，在7名“实验材料”体上做毒物实验。他给其中一位的稀粥里，投入一分克“海洛英”。过了三十分钟后，这位“实验材料”便失去知觉。又过了十五六分钟死亡。三友一男对其他6名“实验材料”，分别使用了“海洛英”、“朝颜”、“巴克塔尔”、“蓖麻膏”等毒物。每个人和每次实验用的药量、致死时间，三友一男都留有记录，直到日本投降才烧毁。通过这些实验，寻找烈性毒物的使用方法。参加三友一男暴行的，除松井技师外，还有兽医师福住光山、实验员畠木章。

第一〇〇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还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宪兵水野、畠木二人执行。只一次化学毒物实验，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一〇〇部队毒杀或枪杀的“实验材料”，大多就近埋在牲畜棚外的大坑里。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方仁被拉夫当苦力，亲

眼见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从隔离室推出时，浑身已缠上白布，再也没放出来。刘方仁在日本投降后，特地到被日本人炸毁的残址去查看。他在牲畜棚外看见一个大坑。长宽四五十米。坑里，还能看见没有掩埋的人头、手、脚等。他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边装满了人骨灰。

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的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进去，强迫注射了一针药物。回家后，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妻子和儿子、媳妇。一个三代五口人的家庭，最后只剩下祖孙二人。

三

第一〇〇部队在中苏边境，曾组织了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特务部）批准，命令第一〇〇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櫻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

别动队出发前，第一〇〇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向平櫻全作进行训示的同时，亲自交给他一份盖有“极密”红印章的手令，严肃地告诉平櫻全作：这项命令，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命令内容是：日苏战争一旦发生，必须立即将染有各种病毒的牲畜，在日军撤退时，全部驱赶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为

此目的，要查清这个地区的牲畜总量以及牲畜中的常见病。以便准备出足够用于传染牲畜的病菌，制造大面积的病菌传染。命令中还估计到，“此一目的若达不到，就应准备出就地消灭这些染有病毒的牲畜的地方。”这就是说，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别动队在“远征”期间，据档案资料证实，平櫻全作先后向若松部队长、高桥隆笃兽医部长，做了两次汇报。

第一次的汇报时间是，1944年9月，即下达“远征”命令的半年之后，报告内容是：别动队的调查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弄清了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牧畜总数，夏冬牧场的准确方位和面积，也摸清了道路、贮水池以及居民的聚住点和分布情况。若松部队长听取汇报，并留有记录。

第二次汇报的时间是，1945年3月，距第一次汇报时间又过了半年。由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听录，并将平櫻全作的汇报，全部标定在军用地图之上，在此次汇报前，关东军司令部拨款8万日元，命令平櫻全作在海拉尔地区，购买了100头牛，3000只羊，还有许多马匹，全部暂停于附近的山沟里。故此次汇报后，高桥隆笃立即召集高级军医官会议，有兽医中佐峰坂、井田，以及苦松部队长等。作出四条决定：

一、在这批牛、羊、马匹中，准备使用炭疽热、牛瘟、鼻疽、羊痘等病毒，进行感染；

二、一旦战争爆发，除将这批染病的牲畜驱入苏境内，还利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航空队，向苏军后方空投细菌；

三、设法将当地居民之牲畜，也都感染上各种病菌；

四、一旦战争爆发，将上述两批牲畜混合，制造大面积的感染区，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平櫻全作率别动队，组织了频繁的实

验。只在1945年度的一次实验中，就在第二部长惠坂的指挥下，用氯化钾和马前霜等，毒杀了50匹马。

四

为在中苏边境上进行细菌战做充分的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发出作战命令，要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目的是考察一下在野战的条件下，或在寒冷的地带里，能否有大面积传染炭疽热菌、鼻疽菌的可能？为此，别动队“远征”前，先派出军医上尉浅尾带部分士兵，化装潜入北兴安省的三河区，在靠近中苏边境约15公里的地方，向河流中投放鼻疽菌，作为试探性的“远征”。其结果，成功了。别动队才开始“远征演习。”

别动队携带的病菌，全是第一〇〇部队自己培植的。在行军中，还携带了实验室，配备了技术人员。一路上，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传染实验，还对河流、水井进行了实战投放细菌的实验。

别动队在平櫻全作指挥下，在“远征演习”中，做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结尔布勒河和附近牧场的贮水池中，投放了鼻疽菌，考察牲畜在饮水时，能否感染病毒？二次是将鼻疽菌、炭疽热菌，撒播在牧场上，考察翻耕制造大面积的病毒感染？

只因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所长善医部长高桥隆笃，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微指麾，并先后三次向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

第一次汇报在1944年7月，即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司令部总司令官一职后不久，亲自会见了高桥隆笃。在汇报时，主要询问第一〇〇部队的性质，以及研究牛痘、羊痘、鼻疽、黑穗病菌等情况。

第二次汇报是1944年11月，主要汇报别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组织“远征演习”的可能性。山田乙三大将着重问及，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在细菌战中，将采用哪些细菌合宜？这次在座听汇报的还有参谋长笠原幸雄、副参谋长池田、若松部队长、部长松村知胜和筱井等将佐。

第三次汇报是1945年2月，在研究“远征演习”计划的同时，山田乙三大将传达了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要求第一〇〇部队在日苏战争发生时，应成为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还要第一〇〇部队保证，在进行破坏性的细菌战时，应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供应需用。

在这次会议后，山田乙三大将以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命令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〇〇部队，都应在实际上成为细菌战的部队。同时，下令给兽医部、医务部，要两个中将部长高桥隆笃和梶原隆二，立即给“两个细菌实验部队，配备足够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兽医学家，以及有关的技术干部，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3月，平樱全作向高桥隆笃作了“远征演习”的汇报后，立即奉命出发，率队去海拉尔地区。行前，若松部队长下令，将藏在山沟里的牲畜，分别染上炭疽热菌、鼻疽菌、牛痘、羊痘菌，等待日苏战争的爆发。后来，又将这些染病的牲畜，驱赶到海拉尔城西北约80里的山沟里。为指导这次阴谋计划的实施，若松部队长派出军医少佐山口、军医中佐雄坂远行。

1945年8月7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别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菌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所捕获，并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第一〇〇部队实验用的牲畜从何而来。笔者从1941年日伪时期的报纸找到一些线索。日军以“剿匪”、“防匪”为名，在辽西省和热河省西部，以及长城以北的一带地区，推行“集家并屯”的政策。将这一带地区的居民，1105万人撵出家园，烧毁房屋382万间，在175 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制造了无人区。就在这篇报道中，以“剿匪的缴获”为名，将居民饲养的748 700头牲畜，转交给第一〇〇部队。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遗迹的调查

邹世魁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设立的细菌工厂之一。它位于长春西郊孟家屯（现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所在地）。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几次反复调查和核实，基本弄清原第一〇〇部队现存遗迹。

一、现在的散热器厂的大门为正东向，往里走是一条笔直油漆马路，在120米处的路南（该厂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原来是一幢二层楼房框子，现已修建成完好的一幢二层灰楼。它原来是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司令部（设在二楼）和细菌标本室（在一楼）的残迹。现在该厂的技术科和夜班宿舍。

二、原司令部的路北，还存有原来的“一”字形和“工”字形的三幢养马红砖房遗迹。它们之间相距15米。长春解放初期，

已是一片瓦砾和残垣断壁，经散热器厂的修复后，建为办公室和车间。

三、原司令部西20米处，是原“王”字形楼房残迹和原来“王”字形楼房旁的大烟筒根残迹。它是原第一〇〇部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现改为红砖房。

四、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旁，现尚存原冷水塔残迹。

五、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楼房残迹西30米处，有三幢并排的红砖房残迹，它们原来是第一〇〇部队喂养小动物（鼠类）的地方。原只剩残垣断壁，现已建完好的红砖房。

六、原喂养鼠类的红砖房西南角30米处，现还残存一个碉堡残迹。

七、原喂养鼠类的红砖房西北角60米处，至今残存着大烟筒残迹。

八、在大烟筒西偏北20米处，还有四幢并排红砖房残迹，原是第一〇〇部队养牛、羊的房舍遗迹。

二

原司令部遗迹为二层楼，全长60米，高于地面6米，宽为12米，一楼原为细菌标本室，二楼是原第一〇〇部队司令部。现将它原来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研究内容等，搜集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1935年，日寇组建的第一〇〇部队的最高将领，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中将，在高桥之下，由若松次郎兽医少将任第一〇〇部队的部长长。

这个制造细菌武器的工厂，从1935年开始筹建，到1939年建成一座坚固的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和一些“研究”部门。这个工厂占地面积东西宽为500米，南北长为1000米的范围。不

仅如此，高桥受审供认：还在拉古站设立了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一个支队；在大连市内设一个分部；在佳木斯、东安、东宁、克山、鸡宁（今鸡西）等城内设立了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据点。

第一〇〇部队以实验细菌为业，配备有细菌学专家、化学专家、植物学专家以及兽医学专家等，这个细菌工厂人数约达600至800人。

它的组织机构：第一〇〇部队设有司令部，另外有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

总务部下，又分若干分部，例如：设计分部及研究分部，还管辖一处六十多垧地的“实验”农场和一个二十多垧地的大牧场。

第一部，主要是担任研究关东军各部队所属马匹以及关东军各部队所拥有动物的血液，目的是要确定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等病症。

第二部在初建时，即1943年前，分成五个分部，后增加一个分部（第六分部），主要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第一分部是研究实验和制造炭疽菌分部；第二分部是研究实验和制造鼻疽菌分部；第三分部是专门管理实验用的动物（鼠类）的分部；第四分部是有机化学分部。各分部的部长，是由细菌学专家、植物学专家、有机化学专家及病理学专家担任。其中有些是现役日本军官，有些是雇用的科学工作人员。

第二部拥有军官20名，科学工作人员30名，技术人员50名，共有100余名工作人员。

1943年12月间，日本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中将巡视这个部队后，在第二部内又成立了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争的准备工作。第二部的第五分部，是负责探索用细菌毒害和传

染植物的部门。第二部当时采用的是鼻疽、羊痘、牛瘟及炭疽热等病菌，作为进行细菌战的武器。

第一〇〇部队各个支队和据点需要的人员，都是第一〇〇部队负责培训，换句话说，第一〇〇部队不仅是研究和制造各种细菌战武器的中心，也是从事细菌战争人员的培训中心。

三

尚存的原“一”字和“工”字三幢红砖养马房遗迹以及四幢并排养牛、羊的红砖房遗迹，它们之间相距为15米，每幢房各长为80米，高为6米，宽为12米（经该厂维修一部分新砖墙和新的房盖），原残迹尚清晰可见。现将利用马、牛、羊等牲畜，制造各种细菌和实验规模及其危害，搜集整理的资料简介如下：

第一〇〇部队所研究制造炭疽病菌，分为侵害人、畜和侵害植物两种，它是以动物为主体，这种疾病又称脾脱疽，富有耐久性的炭疽菌由伤口进入，或混在食物里进入动物体内就会发病，在发高烧条件下，全身粘膜出血，一至两天内就会死亡，它是一种剧毒疫病。

还有鼻疽菌，是马、牛、羊等牲畜传染病，注射过这种病菌的马、牛、羊，如果潜入所谓“敌占地区”放牧，军马和家畜就会接二连三地感染；从鼻子里流出大量鼻涕，两周内就导致死亡。养马牛羊的饲养员也会因感染而致死。

据《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高桥供认：“首先是鼻疽和炭疽热细菌。”“第一〇〇部队在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余公斤炭疽菌；500余公斤鼻疽菌；其他化学毒药为100公斤。”

第一〇〇部队的“实验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器皿和仪器

里，还惨无人道地使用活人做材料进行实验研究。据《审判材料》第343页记载：“第六分部三友兽医供认：第一〇〇部队内用活人进行过实验”。当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宣布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犯罪状的消息传出后，在1950年2月，《长春新报》记者王亚晖调查了“第一〇〇部队”废墟，并访问了当地受害最严重的大广村农民。

王亚晖在《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中写道：“100部队第二处的地下室里，从东往西数，第三第四两个连接的小屋，都是4米见方的屋子，里边都有着三重的保险门装置，门高不到2尺，宽仅1尺5寸，这两个屋子墙上还有依稀可辨的软木痕迹，这是专门设备的隔声装置。这两间小屋的对门是大化验室，同时还发现在‘本部’的后边，还有个至少可容纳30到40人左右的屋子。‘第一〇〇部队’第二处杀害多少人，谁也不知道，但，1949年春天当地老乡，为了挖肥料上地，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也有人骨，后来越挖发现人的尸体越多，弄得大家谁也不敢挖了。据挖出尸体的老乡们讲，有男有女，有穿黄衣裳，也有穿蓝劳工服的。郑洪生老乡说：‘掩埋场西边一里来地（500米）的一长条，完全埋的是人’。张子斌老乡讲：‘不仅上面是人，挖到2米到3米深，还有人的尸体。’二处为了制造更大批残害人畜的细菌和烈性毒药，不知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到现在炼人炉里白骨犹存。地下室阴森得可怕，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灭绝人性！‘八·一五’光复那年，苏联红军快来到了，于是日寇就给每个劳工注射了一针，当时双阳县的300多劳工当中，就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都染上了严重的霍乱拉（一种毒性痢疾）。”现在尚存的“王”字房子，就是所谓动物解剖室、火化场及其大烟筒的遗迹，也就是以活人当“材料”，实验后焚化尸体的场所。现查北房长为80米，南北房长为45米；南房长

为80米。各房高为6米左右，宽为12米左右。在“王”字楼房旁，尚存两个原来大烟筒残迹。其中一个，高为4米，宽为2米；另一个直径为85厘米，高为130厘米，这是留下的实物见证。

四

根据调查，第一〇〇部队喂养小动物（鼠类）的三幢并排房舍残迹（原只残存有四面断壁，经散热器厂修整完好），各房长约为50米，高为6米，宽30米，它们之间距离15米左右。

据《审判材料》中平櫻供认：“第六分部内确实制造了大量细菌和化学药品。我本人几次因事到过该分部附设的仓库，那里把细菌和毒性毒药保存在特种铁盒中。走进仓库时，必须用浸透特种消毒水和布片，把口鼻蒙上，只有戴上橡皮手套时，才准许用手去摸那些铁盒子。为了严守秘密起见，这些盒子外面只标有一个用油漆写的号码，并没有写上任何说明。并且在一〇〇部队内还研究过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例如：研究过用飞机来达到这种目的。”

据《长春新报》报道：1950年2月，长春医科大学教育主任孙瑞宾、细菌系教授刘振寰、讲师房春哲、药理师徐景达等一行，随着长春市政府视察团，先后三次到一〇〇部队废墟进行了视察；视察团在《视察一〇〇部队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在一〇〇部队的第二处西北侧，有四个大型的孵卵室，每个约有125立方米，总计有500立方米，都是用电力保持恒温的，是培养大量细菌用的，如果只为制造马等牲畜预防或治疗用炭疽、鼻疽血清疫苗使用时，则可能供几千万匹马之用。在这个庞大的孵卵室北头，还有三个大长圆形高压灭菌器，每个直径有1米半，高3米，在这两种东西的周围，有十几个实验室、灭菌室、准备室、材料室等，都是用很坚固的水泥制的台子，现在还能

很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实验操作室的中间的北侧，正如该部队兽医三友，在伯力军事法庭所供认的那样，有两个用软木隔音装置的禁闭室，是用来提活人进行实验的。老乡庄岐说：“有几个带黑布窗帘的汽车，常常在夜间由街里回来，集在第二部的北面，拉的是什么都不叫看。”在那里工作多年的老乡们更证实了这个汽车是用来拉活人来进行实验的，并在烧却炉里及掩埋场发现了人的骨头及尚未腐败的着工人服装的尸体……。从三座长约 50 米、宽约 30 米的小动物饲养室来看，其设置，拿一般医学饲养场来比较计算，总可养二十日鼠、荷兰猪、家兔等几万只以上，按其二十日鼠一个月可繁一代，每胎 10-20 只来计算，去掉死亡率，总可增加 15 000 只，正常饲养 10 000 只活的，那么每只角最多也要有 5 000 只的二十二日鼠供为试验。《长春新报》记者王亚晖在“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中也报道说：“在‘本部’后面，现在地面仍残留下的不少耗子解育装置，据说这些耗子种类很多，有的装在瓶子里，有的装在类似中医大药抽屉似的解育器里。”孟吉老爹说：当初看耗子的李占发老爹和他是朋友；他听他朋友说，耗子房每天要供给第二部一大圈草筐（直径约二尺）被解剖完死耗子的消耗量……，李占发必须每天早晨要往外运出一煤油桶（重约 15 公斤）耗子。据李占发说，这些耗子不时要受到注射，因而满身孕藏着厉害的病菌！不仅看耗子的人一定要有预防装置才行，就是经过严密装备的李占发，也因为一次在睡觉中偶一疏神，耗子钻进衣服里而咬了一口而染病，为了使他再继续看耗子，费了大力给他治，他几乎因此死去。”

据《恶魔的饱食》一书记载：“1940 年夏，奇怪的灾难发生了，在当时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市）北边偏西北约 50 公里处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鼠疫，开始时发生在县城内

的鼠疫，没有几天就蔓延到县城外的农村地带，如燎原之火，吞噬了农安县一带。”

农安县那次发生的鼠疫是两种以上的混合鼠疫；而且“怪”就怪在本来主要应是在冬季流行的鼠疫，却在夏季开始流行起来。县以下各个地方，发病者接连不断，死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死者就有300多人^①。日本关东军把农安县因感染鼠疫致死的人数缩小，谎报为120多人。接着以哈尔滨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又发生了肠道伤寒病，一下子就蔓延到哈尔滨市，近10万日本人也身受其害。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车站北约1公里的人口密集的“三不管”贫民街地带，也突然发生了鼠疫。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争军事审判》中写道：“当时仅在‘三不管’的狭窄地区，就密密麻麻住了700多户，5000多贫民，而穿着白衣的防疫队员冲了进来，隔离患者，强行检查诊断，打预防针，挨家摸户消毒，整个‘三不管’住户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混乱之中。在鼠疫猖獗稍有缓和时，日本关东军就把所有的居民，强行迁移到底离此地两公里远的临时村落宋家洼子。接着日本工兵以‘彻底防疫’为名，把‘三不管’街的房屋烧掉了。”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细菌武器，惨害中国人民的实例。

五

1945年8月8日至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命令：“第一〇〇部队运走所有的贵重设备，并由工兵协助将建筑物毁掉。”据给这个部队当过杂役（工友）的刘方仁老乡说：“炸这座房子那天，我看见了若松

① 据农安县防疫站记载：死亡和被杀害298人。

(部队长)那小子直掉眼泪。”“八·一五”后不久，附近农民常来这里寻看。大广村农民王廷林说：“我进去那时候，楼上满是坏机器和破药瓶子，啥也没有。我进地下室里去，那时地下室也是些大机器，都被破坏啦！”它的外面冷水塔被炸的残迹尚存，塔基直径为8米，外厚为30厘米，高为90厘米。水塔基外有6个小垛，每个间距为4米，每个垛高为80厘米，宽为45厘米，厚为22厘米。这是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屠杀中国人民的实物证据之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和事实，是任何时候也毁灭不掉的。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 细菌部队拉古支队调查记

吉林省

突然发生的传染病

1940年夏天，位于中东铁路海林站以东15华里，牡丹江站以西20华里的拉古附近村落，突然发生了鼠疫。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染病，最初是在距离拉古站以西2华里处的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第四五七部队劳工营里开始流行的。四五七部队里（老百姓俗称“天成”部队）囚禁着大约五六百从关内外抓来的劳工，劳工们接二连三地死去。几天以后，这种“瘟疫”便传染到附近的农村，并以烈火燎原之势在拉古站一带蔓延开来。

拉古站附近村屯发生的鼠疫，是两种类型以上的混合型。鼠

疫本身主要是在冬季流行，但这里夏季就流行起来了，“怪”就怪在这里。疫情在急剧蔓延，患者相继死亡。鼠疫发生的急报传到拉古以西1华里左右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总部后，该部出于某种动机，马上派部队里的卫生兵去进行消毒，但对于鼠疫蔓延的凶猛势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场鼠疫死亡人数确凿数字无人统计，据拉古村当地60岁以上老人回忆，在“瘟疫”流行期，几天之内就死了几十人。有的一家几口人全部死光，关东军四五七部队劳工营里死的人更是不知其数。接着，在海林站以南30公里的新安镇一带发生了伤寒病（百姓称为“窝子病”）。新安镇一带是朝鲜族的聚居地区，十几个朝鲜族居民村，有无数朝鲜族农民染上了伤寒病。笔者调查了和平村和西安村，和平村死了30余人，160余户的西安村死了76人。

同时，驻在拉古以西2华里处的关东军四五七部队里饲养的2000多匹蒙古马与新安镇以北北崴子附近的日本开拓团饲养的几千只羊，也得了一种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造成了大量连续死亡的事件。

在这一连串的传染病蔓延的背后，有什么名堂呢？

关于1940年夏，拉古附近村落及新安镇朝鲜族聚居的村庄发生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原因，关东军部队作了各式各样的解释。他们说拉古站村落发生的鼠疫是“野外的老鼠窜入居民区把鼠疫跳蚤带到了住宅引起的”。关于关东军四五七部队饲养二千多匹马和新安镇北崴子附近日本开拓团饲养的几千只羊的死因，他们通过调查团进行调查，但结果是以“原因不明”不了了之。相反，深受“瘟疫”之害的老百姓凭着他们直观感觉，认为是“日本人在水源地撒了细菌”。还有的说是“与偷吃拉古以西一华里处的日本‘军马防疫厂’埋掉的死马肉有关系”。然而，不

管是什么原因，纵观各处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都有些共同之点，那就是：（1）传染病都是突发性的；（2）为预防传染病向日本关东军驻地扩大，日本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派卫生兵紧急出动，进行“防疫”；（3）消毒在短期内即告结束；（4）强行赶走传染病发生地区的老百姓，拆毁或烧掉房屋；（5）整顿街巷，对患者强制检诊，对居民强行隔离。例如，当新安镇朝鲜族聚居区发生伤寒病时，驻在海林福利村的日本关东军第六四三部队（七三一细菌部队海林支队）就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消毒，隔离患者。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对拉古、新安镇附近突然发生的各种传染病的“原因”就自然产生怀疑了。

关东军军马防疫场的真面目

战后，苏联将日本细菌战犯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地、秘密地进行细菌实验，并且在局部地区已经使用这种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的审判供词公布于世，人们才知道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并且它的魔爪（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曾伸到了海林，即海林支队。其实，除了公诸于世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外，关东军还有一支秘密的细菌部队，那就是所谓的“军马防疫场”，番号是满洲一〇〇部队。它下设两个分支队，一个驻在大连，一个驻在拉古。

一〇〇部队，是以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室实验为基础，新创设的一支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该队的根据地设在距新京南10公里处的孟家屯附近（现在的长春市西郊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所在地）。部队人数为800人，规模稍少于七三一部队。建有坚固的混凝土两层楼房和许多研究室，拥有宽大的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以供使用。日军统帅部为其单

独拨出巨款以供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制造细菌武器之用。

1935年编成的满洲一〇〇部队，它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一〇〇部队的部队长。

关于一〇〇部队的创建情况，前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犯防岛清有这样的供述：“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的诸次秘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的部队在活动。”为保守秘密起见，就将其中一个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的部队命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部队则称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姊妹部队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七三一部队主要是承担制造以人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一〇〇部队主要是承担以畜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并准备在前线和“敌后”同七三一部队配合，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它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同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庄稼和牲畜群等。

一〇〇部队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部分。第一部负责细菌战实战研究，第二部的机构设置组成如下：

第一科 制造炭疽菌及研究实验；

第二科 制造鼻疽菌及研究实验；

第三科 } 制造其它流行性兽疫菌及研究实验；
第四科 }

第五科 制造黑穗病菌和花叶病菌及研究实验；

第六科 制造研究牛疫病菌及其它化学性毒菌。

一〇〇部队的工作人员的配备同七三一部队一样，都是根据各自部队的性质，所承担的任务，选择较为优秀的、并有一

定研究能力和创造性的细菌学家、化学家、兽医专家和农艺家组成的。这支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准备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都各自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工作，以专门探究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主要任务

前边说过，一〇〇部队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单纯的实验、研究、生产细菌武器，而在于在实战中实际应用这种细菌武器，以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扩张，进行经济掠夺的目的。因此，他们所研究的炭疽菌，既有伤害人畜又有伤害植物的两种作用。一〇〇部队研究制造的细菌主要是伤害动物的一种。炭疽病也叫做脾脱症病。这种病的发病，是由一种耐久性很强的炭疽菌从伤口或者掺在食物里边侵入动物体内而引起的。动物在发烧的同时，全身粘膜出血，一两天就会死亡。鼻疽病是马和骡子得的一种传染病。按照法律規定，患了这种传染病必须向有关单位呈报，进行隔离。牲畜一感染上这种病，从鼻子里流出很多鼻涕，两周以后，几乎都要死亡。除了传染马匹以外，还传染狗和羊。因为没有可靠的预防方法和治疗方法，所以这种病成了家畜的大敌。

炭疽病和鼻疽病也能传染到人身上。把注射了病菌的牛、马和羊悄悄地放到“敌人”那边去，“敌方”的军马、家畜就会很快受到传染；同时饲养牛马、家畜的人也会传染上疾病而死亡。这就是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真正目的所在。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当时就是进行试验如何使用这种细菌，来消灭中、苏两国军队、军马和家畜的实验研究的。

从1941年到1942年，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研究制造的炭

疽热菌就有1000公斤，鼻疽病菌500公斤，其它化学毒药100公斤。倘把这些细菌全部用在战场上，那恶果将不堪想象。

从战场上缴获的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明确证明：“对苏作战一一开始，假如日军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转移退却到大兴安岭的话，就要用细菌或毒药对所有的河流、水库、水井进行污染，将所有的农作物毁掉，将所有的牛羊毒死。”——这就是关东军司令部给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下达的主要任务。

一〇〇部队及支队的实验情况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实验研究”并非仅仅是停留在研究室内的办公桌上或限于牛、马、羊等动物身上，同时也偷偷地使用了“木头”（细菌部队把人作为细菌实验材料暗号叫做“木头”）。

“……1945年8月至9月，使用活人进行了实验：为使被实验者无法觉察实验内容，便使用了催眠剂和毒药。被实验者是七八名中国人和苏联人。所做实验的药品中，有曼陀罗花、海洛英、蓖麻子。这些毒剂被放在食物里边。在两个星期之内，给每个被实验者吃了五六次掺上这些有毒剂的食物。在汤里主要是放曼陀罗花，粥里放海洛英，香烟里放海洛英特巴克特尔。喝了放有曼陀罗花的汤的被实验者，过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就进入睡眠状态，睡眠持续五个半小时。”这个残忍的活体实验的事实，是一〇〇部队第六科科员三友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认的（以上所引用供词都摘自这个军事法庭的《战犯审讯录》）。

这种实验结果，使“木头”衰弱下去。待达到实验目的后，就叫体质极其衰弱的“木头”泻吐，再佯称是治病，给“木头”注射“氯化钾”，将“木头”毒死。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句，除了上述活体实验方法，还通过把伤寒细菌掺进豆包或饼子里扔到贫民的住宅区，使传染病蔓延流行，然后借着预防的名义，到疫区去观察传染病患者的各种极端痛苦的症状以及如何死去的情况，并及时做出记录保存起来。根据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开头所提的发生在拉古与新安镇一带的突发性传染病，是一〇〇部队拉古支队通过一定实验媒介体所致。

一〇〇部队的特别演习

1941年夏，关东军司令部做过一个极端秘密的作战计划，这个秘密作战计划就是号召关东军各细菌部队在加紧研究生产各种细菌的前提下，加紧进行特别演习。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满洲一〇〇部队决定由村本少佐率领，组织了一个由军官、研究员、技术员组成三十多人的小分队。1942年夏天，这个小分队沿着苏满国境的得尔布尔河域野草丛中行进。

这个神秘的小分队带着大批的装备器材。有两只大型充气橡皮船，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大型皮箱、玻璃容器、水桶、长柄勺等，外边用布包着，表面上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走在队伍前头的村本少佐举起望远镜向得尔布尔河的下游望去。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是苏联的领土。在望远镜的视野以内，没有发现苏军人员的身影。

指挥官一挥手，队伍就停了下来。在有一人高茂密的水草丛中，开始了器材的组装工作。把两只橡皮船充起气来，在两只船的船尾上都拴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岸上。

船上装载的是大型金属容器和水桶。每只船上都有一个一〇〇部队的研究员。研究员用短桨灵巧地划着船向得尔布尔河的河心前进。当第一只船走出大约100米远的时候，第二只船

开始进发。

当拴在船尾的绳子绷紧的时候，两只船上的研究员就分别打开自己船上容器的盖子，把容器浸到河水里去。容器里装着大量的鼻疽菌。前面已经谈到，鼻疽菌是马、羊等家畜的大敌。

容器在水下缓缓放出鼻疽菌。在得尔布尔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就和流入苏联国境的额尔古纳河相会合。说到这里，一〇〇部队的实验目的就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在离苏联最近的国境上把大量的鼻疽菌放入河中，被鼻疽菌完全污染了的河水流入苏联境内，当家畜和人饮用了这些水，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畜死亡……。当时日苏两国虽然尚未进入交战状态，但实际上这是在实验的借口下进行的细菌战争。

“这次演习的名目，是一〇〇部队第六科的夏季演习……这次一共从部队里拿走了12公斤的鼻疽菌，演习班归来后报告实验完了。”从述原一〇〇部队部队长的供词中，可以推知大概把带去的鼻疽菌全部放入了河中，至于后果如何，在下游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队员就不得而知了。

进行这样规模大小的实验，是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日常活动。

一〇〇部队一四一支队在拉古的活动

前边已经说过，一〇〇部队在性质上属于细菌部队，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极端秘密的，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部队研究人员，外界人是无法知道的。笔者根据前日本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的供词，知道在拉古曾驻扎过一〇〇部队的一个支队，这就是一四一支队。日本细菌战争战犯高桥隆笃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

问：除一〇〇部队以外，关东军还有什么兽医部队曾准备

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和破坏活动呢？

答：“第一〇〇部队有两个支队，一个驻大连，一个驻拉吉。”

问：这些部队的细菌学专门干部是由谁负责训练的呢？

答：“第一〇〇部队各支队长及各兽医部长均由细菌学医生充任；这些部队内其余的人员是些没有细菌学知识的兽医。为培养新的细菌学家，所有这些部队中的人员都在第一〇〇部队内受过专门训练。”

高桥隆笃中将还供称：“自从‘关特演’（即1941年夏季展开的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缩略称呼）作战计划颁发之后，驻在满洲各日军军部内都组织了‘兽医’部队。”这些“兽医”部队分别部署在克山、东安（现密山）、鸡宁（鸡西）、东宁等城市内。这些支队的位置与苏联国境相毗邻，各支队的主要任务、目的，就是准备要在战争中与各特种部队（即细菌部队）相配合，实际使用自己制造出的细菌武器。各支队直接受关东军司令管辖。”

为掌握一四一支队的活动情况，笔者按照《战犯审讯录》中提供的线索，顺蔓摸瓜，查找证人，走访劳工，实地勘察，进行了大量调查。

首先找到了曾在一四一支队当过3年劳工喂过军马和试验鼠的姚庆林老人，77岁。后又访问了当年在一四一当过伙夫的杨贵福，71岁；马夫林政广，71岁；喂鼠夫姚庆贵，63岁。另外还有给一四一部队干过活的林会吾、张德志、常凤延、姚庆复等老人。

姚庆林回忆说：一四一部队给每个劳工发有贴本人照片的劳工证明书，同时佩带印有“一四一”字样的黄袖标。劳工在上下班时，必须向门岗卫兵出示证件，否则不准出入。日本人对劳工管制非常严格，他们对劳工规定只许在自己干活的指定

范围内活动，不许打听，不许走近日本人工作的场所。日本人工作的地方都用白布挡得严严的，就连火车通过拉古时都要放下窗帘，不许人们往外张望。日本人管一四一叫做军马防疫场，老百姓叫做马病院或西大营。

伙夫杨贵福证实：日本兵看守非常严，劳工在工作中稍不留心走出规定的范围，就挨嘴巴子，左右开弓，打完还得立正站着。他挨打大约就有十几次，这是轻的，重的则被打残或丧失生命。

关于一四一部队的人数，姚庆林证实，该部队有雇员三十多人（即细菌的专门研究人员），日本士兵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汽车兵、警卫兵等），中国劳工30人。这些劳工大多是拉古本地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当时日本人在雇用劳工时，其中一个主要条件就是不要有文化的中国人，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保守秘密。

应笔者的要求，姚庆林老人不顾年高体弱，于1985年冬天领我们找到了一四一部队的驻地遗址。顺着哈绥公路，由拉古向西行1公里处，即海林县海南朝鲜族乡道北村（过去叫良种场大队）与海南朝鲜族乡办造纸厂中间，有一片不长庄稼的荒草地，这就是一四一部队总部当年的所在地。

一四一部队占地面积约有八九垧地见方，营房入口的西侧是卫兵所，卫兵所的东侧是部队长办公室（老百姓俗称“红部”）。部队长每天乘坐小汽车上下班，副部队长则由士兵用马接送上下班，军官宿舍设在现在拉古油库西侧，相距大约1公里左右。

通过考察遗址得知一四一部队的全部设施有：部队长办公室及细菌试验室一栋、马舍四栋、炼马炉一处、瓢类动物室一处、简易铁匠炉一处、地下室一处。全部建筑物均由关东军特种部队军事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建成的。关于这一点，姚庆林老

人证实说：“康德4年年底，发现开始有日军的部队监视着一些关里来的劳工在这里施工。”由此看来，一四一部队是从1935年至1936年初建成的。同时与日本战犯川岛清的供词也相吻合。为了适应研究细菌的需要，日军专门从海浪河引水，沿拉古西山坡（老百姓常把西山称之为马坟山，因日本人经常把细菌试验死的马埋在西山坡），安装上来自水管管道，一直通向一四一部队以及军官宿舍。此外，还把部队长办公室，细菌试验室以及士兵宿舍安装上暖气设备和热水管道，随时可以使用热水消毒，并设有下水管道将脏水排出。

1945年8月9日，以别洛鲍罗夫大将为指挥的苏联远东红旗第一集团军开始从密山以南至绥芬河以北的地段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攻击，13日突破日军牡丹江防线。一四一部队与“四五七”部队的日军放弃未及炸毁的营房，仓皇出逃。战争结束，房舍内安装的各种设备全部被苏军抗议毁运往苏联。而后房舍的石头被附近的老百姓拆掉盖了民房。现在一四一部队遗址只剩下的地基尚依稀可辨。

一四一部队内部的机构设置，大致有如下各种：

第一科：负责细菌战的研究工作。

第二科：负责部队所属的马匹及部队内所有动物的血液破译，目的是要确定鼻疽、猪瘟、传染性贫血等病症。

第三科：负责供实验用的马匹和动物的运输。

第四科：负责细菌干部的训练。

这些科的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因一四一支队在败前全部溃逃，所以无人知晓。劳工们只记得支队长叫下河边，副支队长叫铃人，负责伙房的叫横山，横山当时40多岁，管马舍的名叫吉田，吉田当时30多岁。据他们回忆，一四一部队还有

十多个日本女雇员，部队长下河边当时四十多岁，从新京调来时没带家眷，士兵传说他和一个日本姑娘有关系。

姚庆林老人还证实：一四一部队饲养马匹有二百余匹，其中中国马一百二十匹，日本马七八十匹，鼠类动物三千五六百只，其中花鼠三千只，白鼠五六百只，猪五六十头，羊十多只，兔子三四十只，鸡三十多只。这些动物都是用来供抽血研究，如何将细菌传染给家畜的试验。

平时穿着白大褂，带着白帽子的日本“马兽医”，每天拿着针管和一个大肚子瓶子给马抽血（大肚子瓶子里边放着一个手指盖大小的白东西），一匹马大约抽25CC左右。他们每天平均得在五六匹马身上抽血，然后将瓶子摇晃一下便走了。除给马抽血以外，还给花鼠、白鼠、羊等抽血，根据动物血量，各种动物抽多少不等。

劳工们普遍证实。我们每天看着日本人从好端端的马身上抽血，还看着他们每天给马打药针。马被打上药针后，先是浑身打一阵哆嗦，然后咚的一声便倒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带有滑车的马床上，接着便由日本人把滑车推进火化炉进行火化。平时吃不饱的劳工们眼看着被送进火化炉的死马烧得吱吱啦啦直冒油，趁日本看守人员不在，常去火化炉偷撕被烧熟的马肉吃，日本人发现后，用手势阻止说：“药的干。”他们在火化炉炼不过来的情况下，经常分咐劳工事先在拉古西山坡上挖好一个个的坑，将马牵到大坑的旁边，然后马“大夫”拿着针管照马屁股上就是一针，马立时倒在坑里，随后让劳工把马埋好。劳工们下班之后，串联穷苦百姓连夜上山把死马挖出来割马肉吃。当劳工们和老百姓吃了这种马肉之后，只感觉到嘴发麻，有一个叫王万富的人吃了马肉后脸色逐渐发黄，很快就消瘦死了。

一四一部队利用“打药针”的方法，以平均每天一匹马的

速度大量屠杀牲畜。甚至每天就有几匹。为了使马的供应连续不断，每隔三四个月就从新京（长春）发来一批马，以一四一部队从1936年建立至1945年这10年计算，至少有三四千匹马死于这种实验中。

一四一部队的覆灭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宣战。关东军司令部对细菌战研究人员组织了优先撤退。原因一是细菌战研究人员中大多是日本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优先撤退，可保留这些人才；二是细菌部队研究人员，占有多年的细菌研究资料，一旦落入苏军手里，日军必将受到国际公法的审判。因此，一四一部队所有人员及其家属提前做好了撤退的准备；等到苏军越过东部国境线，于8月13日进攻到拉古时，他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所以一四一部队的人员没有一个被苏军抓获。然而，主管日本关东军一〇〇细菌部队的兽医中将高桥隆笃等却没有逃脱法网，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尽管关于一四一部队的详细情况无人得知，但我们根据高桥隆笃的点滴供词和劳工们的回忆，足以证实，一四一部队是在一〇〇细菌部队的领导下，确实干了大量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

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 地区进行活体解剖等罪恶事实

谢玉叶 刘美玲

活体解剖（不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活人细菌试验和解剖）是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一种特殊罪行。它是用中国人作为研究和训练材料而进行的解剖活人的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这种罪不容诛的行为，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本质。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用中国人进行毒药试验以及进行各种医学研究，其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

日本侵略者所犯的活体解剖等罪行，并不是一时的，个别的，在某一地区发生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达14年之久的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在他们的侵略铁蹄践踏之处所普遍存在的诸多的罪恶事实。犯下这种罪行的单位有日军的各级陆军医院，各级卫生队，甚至到基层的小队。同时还有不少民间医院及医学院校（后边的单位在中国东北尤为突出）参加，涉及的人员不仅有日军的随军医生、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还有头戴“博士”桂冠的教授、专家、医生和医学院校的学生。由于他们身份不同，搞活体解剖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对随军医生及卫生人员而言，目的之一是用活体做解剖材料，通过解剖人体的不同

部位与内部脏器，对医护人员进行有实感的教育，这自然要比空讲书本知识具体生动得多。目的之二是那些刚从日本院校毕业的日本军医，并没有实际经验，有的连简单的盲肠手术都不会做，用活人进行实际手术的练习，对于提高自己的本领真是再好不过了。至于那些专家学者则多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如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教授所干的。另据爱新觉罗·宪均的交待也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他说通辽医院院长山本升和军医少佐今村剑、米田等人，为了研究中国人的骨骼、皮纹，砍人头二百多个，剥人皮十五六张。以此为据，写成了《中国人头盖骨之形态》、《中国人的下颌骨》等论文，寄往九州医科大学。山本千和今村剑因此获得博士学位。

本文重点用事实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犯下的这一惨无人道的罪行。

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不久至宣布投降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惨死在那些“医生”们的手术刀及各种名目试验下。仅以抚顺战犯管理所曾被监押的日本军、警、宪人员所供事实为证。

据川口保（驻吉林海龙县日军独立守备队第6大队第4中队上等兵，第3分队长）供认，1934年间，中队将逮捕的10名中国爱国者交给一军医中尉做了活体解剖。那个军医中尉将被逮捕者带到兵营拐角处，先蒙上眼睛，为避免解剖动刀时被害者反抗，又用手枪将其击毙，然后命令士兵把该人衣服脱光抬到事先准备好的门板上，由他当场立即进行了解剖，边解剖边对集合起来的中队人员讲解人体构造。

据小林喜一（赤峰宪兵分队队长，宪兵中尉）交代，1935年11月间，赤峰宪兵分队将1名反日的犯人交给一个名叫渡边的军医，让他练习做切割盲肠的手术。渡边将该犯人麻醉后，用刀剖腹，找到盲肠，因技术不熟练，用了20多分钟时间也没能

把盲肠割下，只好又把腹壁缝合好。练习没有成功，也不能让被害者活下去，最后用刀将该人砍死。

据片相济三郎（哈尔滨日军陆军医院传染病室勤务，受教育者）供称，1936年6月间，医院以研究医学和教育40名新兵为目的，遵照院长笛井秀广少将的命令，将1名被抓的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活着做了解剖，将被害者的内脏一一拿出，向卫生兵们讲解。

据宇津木孟雄（北新京宪兵分队队长）交代，1937年11月间，北新京宪兵分队，应新京第二陆军军医大尉小野的请求，把1名关押的中国人送到医院做了所谓病理实验。1938年还送去过两次。

据太田秀清（关东军承德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交代，1938年12月间，承德日军陆军医院从承德宪兵分队要了1名被俘的抗日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据长岛五次郎（宪兵曹长，野副讨伐队第一工作队班长）供认，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学生十多人，来临江县八道江实习。奉司令官野副少将的命令，八道江日军守备队将诱降过来的义勇军战士10人交给学生，让他们在守备队的兵营里搞所谓病理实验而遭杀害。

据小野武次（富锦宪兵分队上等兵）交代，1940年10月，黑龙江富锦日军陆军医院，从富锦宪兵分队要了1名被捕的中国爱国者，由军医中尉金筑金吾做了解剖手术练习，并将其杀害。

伪南满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实验手张丕卿证实，1942年至1943年，该校解剖教授铃木真吉等先后解剖25人，其中多为中国人，也有苏联人、朝鲜人、德国人。

中岛宗一（西岗子警察队特务主任）交代，1943年，黑龙

江瑷珲国境警察分室抓了2名苏联间谍（中国人），以后把他们押送到西岗子日本陆军医院，供军医们进行解剖试验而遭杀害。

这是一份血淋淋惨不忍睹的侵华日军罪行录，我们也只仅仅选取了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部分事例，但仅仅如此，就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犯下的这种特殊罪行。特别是供认者均为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或为执行者，或为当时的负责者。如小林喜一，1935年时就是赤峰宪兵分队的分队长，他就有权批准送中国人去作解剖试验。再如宇津木孟雄，1937年时任新京宪兵分队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部员，他亲自批准将3名中国人送到医院作试验。军医竹内丰也亲手将1名中国俘虏活活地解剖了。这些由他们自己供认的罪行，不但更能从反面教育人民，而且也给那些千方百计要翻历史案的军国主义分子当头一棒。

二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实验和训练的目的，他们草菅人命，视杀人如儿戏，采用多种方式以极其残酷的手段用活人进行试验。下面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真是使人惊心。

其一，进行所谓“复生”的试验。浅井仙一（公主岭宪兵分队上等兵）交代，1937年秋，驻吉林省公主岭日军部队藤田军医少佐，搞出了一个什么“人工苏生器”。顾名思义，该器具大概有所谓起死回生之效能。藤田想验证其“发明”的效果，竟将1名40岁左右的中国人强行拉来，用绳子套住脖子挂在树上，将其吊成半死状态，再取下来用“苏生器”复生。结果试验没有成功，该人很快死去。这个“医生”为试验自己不成功的“发明”，竟然活活吊死了1名中国人。藤田的举动，说明了在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的价值如同小动物一样，可以随意进行试验。

其二，拔取手筋和脚筋。筋络是联接人体各个部位，使之互相协调，能进行各种活动的纽带。人一旦断了筋骨，自然失去了活动的条件。俗话说十指连心，平时断一手指，其痛都难以忍受，更何况活生生地把筋拔出。新京第二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大尉小野，这个曾多次用中国人做病理解剖试验的恶魔，犹感糟害中国人还不到家，竟从宪兵队要来被俘的抗日军战士，异想天开地做起拔取手脚的筋进行移植的试验。曾经被派遣押送3名俘虏去作试验的田村延夫讲：“在陆军医院当外科医生的小野，因负伤手脚不能动，想从中国人的手脚拔下筋来作移植。因此，我奉宇津木孟雄之命，押去了3名中国人，医院将活着的中国人抬上手术台，用刀扎入心脏，将捆住的手脚解开，把筋拿下来。这样的事，安藤还看见过一二回。”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遍查历史，恐怕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过。而这确确实实地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发生在一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法西斯暴徒之手，若不是日本战犯自己交待和揭露，一般善良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其三，剥人皮。据爱新觉罗·亮均（曾任伪满军政部医务课股长、课长、伪满洲军第二军管区军医处少将处长）揭发说，1936年他随检阅使于芷山检阅通辽医院时，在医院院长、军医中佐山本升的房子里，亲眼看见墙上挂了一张人皮，桌上还摆着四五个人头骨。山本升为了研究中国人的指纹、皮纹，在其任期内，从1934年夏至1937年夏，利用职务之便，竟从通辽监狱要来犯人，剥人皮达十五六张之多。除了供自己研究写论文外，还将人皮做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们，供他们研究之用。山本升自己对亮均说，日本国内医科学校很欢迎整张的人皮，他给国内医科学校送去了十几张。山本升及其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样置于中国人的磷磷白骨之上，透着浓烈的

血腥气。

其四，活切和活剖。通辽医院的医生们为了研究冻伤的防治，试验药物效力，同时也为了练习手术及采集标本，公然用因冻伤而被俘的抗日联军战士做试验。试验后，他们砍取了一百多个手指和脚趾留做标本，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与此相类似的是细菌战犯田村良雄。他于1943年退出“七三一”细菌部队后，又来到南满医科大学神经科病理实验室当技术员。为了个人作手术练习的需要，竟不用麻药切断了一个中国病人的两只脚，致使他因流血过多而很快死去。

上面的例证只是活切人体的局部器官，而在东北日本人主持的各级医院里，为所谓科研需要，却经常进行着活人解剖，其中以南满医科大学为最大祸首。这个学校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的产物。它表面上是个文化教育机关、治病救人的单位，实际上那里聚集着一批日本医学界的精华，他们披着教授的外衣，以占领者的身份，随意用中国人做为活体解剖的材料，致使南满医科大学成了残杀中国人的魔窟。我们从张丕卿的揭发控诉材料中能十分清楚地认识这个最高医务学府的真面目。

张丕卿1932年就开始在南满医大解剖教研室做实验手，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与他同时做实验手的还有刘学棋。他们负责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比如准备解剖器械、洗刷玻璃器皿，还要做解剖后的尸体处理等。因为他们是该校的老职工，长期在解剖室工作，因此日本人做什么事一般也不严格地防备他们，有些内情他们还是能略知一二的。

据张丕卿1951年6月29日揭发中说，在1942年秋到1943年春这短短的时期内，“日本人就进行过5次左右的极端残酷的活体解剖。解剖前，由当时的刘学棋实验手给日本人准备器具

与洗刷玻璃瓶子。解剖以后，由我、刘学棋还有一个日本人叫西村××等4人，一起收拾解剖后的尸体残骸，送往锅炉房焚烧或埋葬。”“受难人数，据自己所知，约有25名左右。一次是3人，一次是7人，一是次是12人，另外两次是2至3人。均为男性，年龄约30~40岁左右。其中据自己所知，有朝鲜人1名，德意志籍1名，露西亚人5~6名，其余均为中国人。”“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夜间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学校，当夜即进行解剖。在解剖的当时，于解剖室周围都由日本宪兵进行严密的警戒。”“解剖过程中，完全由日本人进行。其中由解剖教授铃木真吉做技术指导，解剖者为照井××和助手西村××、坂村××。”“解剖的目的是取出活体的脑脊髓、内脏、肌肉、皮肤等，进一步做成组织切片，进行研究。”“日本人每次解剖完了以后，便扬长而去。具体整理工作都是在次日上班以后，由我、刘学棋、西村××等人来作的。在这同时，我亲眼看到，受难者的头颅已被锯开，大脑被取出，背部正中已被锯成一个深沟，脊髓已被取出，胸、腹腔均被锯开，心、肝、脾、肺、肾、肠均被切去一部分作为研究的材料，双眼也被挖去。整个身体无一完整之处。在身上、解剖台上、地下均是血迹，淋漓的鲜血（是鲜红色），皮肤颜色和硬度均和活人差不多。”这些被害者是从哪儿来的？张丕卿前面讲了，是由日本宪兵押来的。他还听西村说：“这些人都是从衙门送来的，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醉熏熏的，呈昏迷状态。”

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了日本的医学专家们与宪兵、警察相勾结，活生生的中国人被他们一刀刀切割得七零八碎。他们的医学成果是以残杀大批中国人的宝贵生命为代价而取得的。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看看以下的用活人进行手

术练习和各种试验的事实。

关于用活人进行手术练习。侵华日军训练医生和卫生兵，多由军或师团的军医部主持，在所属的医院里进行。参加者有十几人，几十人不等，多者达二三百人。这种训练的时间都不长，几天或者十几天。因为时间短，除一般的理论教育外，多采用实际练习的办法，就是用战俘或老百姓进行惨无人道地活体解剖。由执刀者讲解人体构造及各种战伤的防治，以求速成。被用作解剖实验的人，有时一次一人，有时多达十来人，由参训的人分组轮流进行。这些人受训后，回到原单位，则依照此法继续训练本单位的医务人员。

有的医院自己组织医务人员训练，也是用中国活人作材料，作解剖练习。

也有一些单位如大队、中队的军医甚至小队的卫生兵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也从军队的战俘收容所、宪兵队要人练习手术，向一般的士兵讲解人体构造。

还有不是医务人员，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军指挥官，随便侵入村庄，抓走老百姓，进行解剖，向士兵进行教育。

虽然情况不一样，但都用中国人作为解剖材料。在手段上，有的用手术刀，有的用剃刀，有的用刺刀，有的先砍死后解剖，有的活着解剖等等。从下面的几个事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野蛮的杀人情景。

雨海惠（日军黑龙江旅河宪兵分队警务股）交代，1935年9月间，宪兵分队牡丹江分驻所，抓了1名中国爱国者，解送宪兵分队。宪兵分队把他交给了旅河陆军医院。该院的医生为了练习盲肠手术，就把这个人麻醉后解剖了，并将其杀害。

小川政夫（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军曹）交代，敦化市宪兵队经常砍杀中国人，砍杀后由军医进行解剖。1935年

9月，又砍杀了4个中国人。他因想看看怎么解剖人，所以也参加了。这次拉来了4个人，先把他们的眼睛蒙上，命令他们跪下，用刀把他们砍杀。军医马上作了解剖，向士兵作讲解说：“这就是鼻茸。”完了后，又砍下1个人头拿走。

白井完夫（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巡查）交代，1936年9月，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一次就砍杀了6名抗日军战士。其中的1名被广濑军官用剃头刀解剖了。向士兵讲解内脏的名称、位置，摘取了胆囊，砍下了脑袋。他后来把脑壳洗煮制作后，送给了满铁株式会社大连柔剑道场的波多江教师作装饰品。

竹内丰（虎林医院中尉军医，后调山东济南，在那里他还参加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俘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虎林医院时，于1938年1月8日，活体解剖了1名抗日军俘虏。先将俘虏绑在解剖台上，用绳子把四肢固定好，进行全身麻醉。这麻醉并不是为了减轻被害者的痛苦，而是怕手术过程中被害者挣扎和反抗。之后，就切开了腹部，先把盲肠取出，进行切除缝合。向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讲解腹部内脏名称、位置；又把小肠切断，作了两肠管横断面的缝合，讲解了小肠受伤后的手术要领。接着又把胃、十二指肠切开，做了胃肠吻合术。最后做了腹壁缝合术。做了这种残忍的解剖后，又向静脉里注射了吗啡予以残杀。就这样他还不甘心，又将死者的头打开，摘取了大脑，练习了头盖骨缝合术。竹内丰利用这个俘虏作了他所能作的全面练习，他的技术就是靠残害中国人得到的。依此他晋升到军医大尉，并经常主持军医和卫生兵的集训，俨然以专家自居。

还有一般步兵队的军医，也作解剖练习。比如滨江县巴彦县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5大队的军医森某，就作过这样的练习。1940年12月，第4中队砍杀了3名中国人，他就把1个人

的尸体绑在树上进行解剖。当然，不砍杀他也可以解剖，砍杀后马上解剖，不仅方便，而且仍然保持活体的样子，同样可以比解剖一般尸体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于是他就把这个个人的胸部，腹部打开，练习手术，摘取了胆囊，又解剖了睾丸、阴茎等。

三

关于毒药注射和空气注射试验。这两种注射，特别是毒药注射试验，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残杀中国人的手段。不管是医院的医生，或是宪兵队的医生，乃至宪兵或一般士兵，谁都可以随时使用。据小林喜一交代，1936年9月，赤峰日军宪兵队就将1名3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押送到满铁赤峰医院，先是进行毒药注射试验，以后又进行了解剖。据雨海惠交代，1937年8月间，黑龙江虎林宪兵分遣队，因怀疑倒木沟警察署署长某警佐及某警长、警士和1名农民是情报人员，将他们逮捕，审讯后送密山日军陆军医院虎林分院，由该院院长军医中尉二宫进行毒药注射试验，毒杀后进行解剖，练习做盲肠手术。

尤为残暴的是，日本侵略者用毒药试验做为杀人灭口的手段。他们为搞所谓“北边振兴计划”，抓许多劳工赶修军事工程，为保守工程秘密，这些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劳工，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岛貫仓藏交代，1938年5月，他所在的关东军第6国境守备队步兵第1大队第1中队本部，监禁有抗联俘虏约50人，强迫他们修工事。工程完工后，为灭口就对这些人注射毒药全杀害了，并且焚尸灭迹。他还交代说，1941年4月初，他调任关东军大连宪兵分队码头分遣队警务系伍长，中国渔民在大连满三山岛遇难，当时宪兵们收容5名遇难者，其中有两个人还活着，为怕他们暴露军事秘密，就让警察医生注射毒药，将

他们杀害了。

此外，还有一些军医纯粹是用中国人进行毒药或空气注射试验，从中观察人的生理变化，以做资料积累。重富广一交代说，1939年诺门罕事件中，参加作战的伪满军石兰部队起义，独立守备第16大队前去讨伐镇压，于7月下旬在兴安东省的喜扎嘎尔镇白狼东北，抓到1名40岁左右的伐木工人，大队随军军医青木亮向这个工人的静脉打了空气针，观察该人的生理变化。很快这个人呈半死状态，就将其砍了。小美野义利（新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情报班成员）交代，1940年9月，新京宪兵队逮捕了3名中国工人，军医大尉小管原武，想搞试验，就伙同卫生军曹户上，给这3个工人注射了空气，还打了毒药观察注射后的反映，在他们濒临死亡时，将他们的头砍下。为练习手术，又把1具尸体吊起来，进行解剖，打开胸部、腹部，取出内脏。据斋藤贤太郎交代，1941年他任滨江省哈尔滨分宝收容所所长时，奉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特高股泉屋警佐的命令，将伪新京保安局的1个日本医师带到监房。这个医师为试验他所研究的毒药效力，对4名在押的中国人进行了毒药注射试验，观察结果，4人全被毒死。

据原口一八交代，1942年4月，西城县国境警察队抓了1名苏联情报员（苏联人），后来把该人送给海拉尔红十字医院进行毒药注射试验，将其杀害。

据三品彦八（伪首都地方保安局属官、股长）交代，1944年8月，奉伪中央保安局山田俊介的命令，审讯1名被疑为搞情报的中国人赵某，年约27岁，经讯问并无证据，但也并不想释放，由军医向其静脉注射了氯化钾，30秒后即被毒死。

据岛贯仓藏（伪满保安局齐齐哈尔分室派遣宪兵曹长）交代，1945年6月，当时他是伪满保安局齐齐哈尔分室的派遣宪

兵曹长，奉该室事务官野明的命令，将正在监禁的1名朝鲜爱国者，注射毒药杀害。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犯下的特殊罪行。由于日本当局和一些当事者为逃避罪责，一再掩盖犯罪事实，因此可以说有关活体解剖方面不少内幕事实，有待于进一步揭露。我们希望当事者能够深刻自省，真正向中国人民谢罪。否则，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令人深思的是，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人，竟多是以拯救人的生命为己任的医生、学者、专家们。他们这些披着神圣外衣的“天使”，却都成了手执解剖刀的杀人刽子手。他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把抓到的中国人绑在手术台上、木桩上、门板上、甚至按在田地里，随意剖开中国人的胸部、腹部，取出内脏，挖掉双眼，切开气管，砍掉脑袋和四肢，甚至进行抽筋剥皮……不管被害人如何痛苦挣扎、呻吟，他们毫不动心，有的以杀人为乐，发出狞笑。是什么促使他们失掉人性，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的帝国主义教育和占领者的优越感，促使他们自认为是高人一等，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他们从来都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辱骂中国人是“肮脏的支那猪”。因此，他们就像对待牲畜那样随意宰杀中国人。二是侵略战争的特殊环境使他们获得了不易得到的好机会，作为解剖和实验的材料，除了使用大量的战俘外，还有不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包括年迈的老人，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有一些苏联人、朝鲜人和德国人等。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从宪兵队、警察局、监狱或是部队那里获得。有时他们自己也随便抓人，比如过路的百姓、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等等，也可作为解剖实验的对象。正像战犯竹内丰所交代的：“1938年1月，虎林（黑龙江省）陆军医院为了供

下级军官进行研究，从虎林宪兵团要了1名抗日军俘虏。当时我是军医中尉，我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在日本是不易获得这样好的研究材料的。为了提高自己的医术，为了对日本的战地医学有所贡献，我请求进行手术解剖。”竹内丰的供词道出真情，侵华战争为他们创造了在日本国内难以得到的好机会。占领者对被占领者有任意宰割处置的权力，为此他们遇到机会谁也不放过，都争抢着干。随军军医汤浅谦，曾亲自参加活体解剖过18个中国人，他不仅在押进供认不讳，宽大释放回国后仍不讳避。事隔三十多年，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时，仍然公开承认自己的暴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陆军医院是侵华日军随军医生练习手术的场地。”“每一个日军医院都进行过活人解剖，只不过是后来回国的军医们不肯说出来罢了！”

血写就的历史事实，毕竟是客观的，不肯说出来，并不能将其抹灭。遭受过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受害者的后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将牢记这受屈辱的历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日本鬼子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战务班长 宪兵曹长)

这是我在1940年9月上旬，奉新京宪兵团长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在市内新发路宪兵团军官宿舍附近，对逮捕的3个中国工人直接犯下的罪行。

虽说是9月，仍然是灼人的暑热。用混浊的呆滞眼神浏览着报纸的特高股长小林少尉，把手伸向电话，拨动号盘。

“啊，是大尉吗？日前决定的事，今天做，合适吗？……好，那么等着！”

“咔嚓！”他把电话听筒一放，叫着常跟在身边的小美野伍长，命令说：“今天要干了，准备好！”

“国民党地下组织的3个嫌疑犯，什么也没有交代，终于决定要秘密地处理了。”回到屋里的小美野一边傻笑着一边摩挲着胳膊对桐原军曹说。

“哈哈……你，想杀吗？哈哈……”太田曹长显出轻视人的样子，大笑着说。

午后的阳光逐渐西斜，两辆汽车箭一般飞驶在大同大街上。

在前面车上坐着今天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山垣内翻译，再加上宪兵队司令部的小笠原军医大尉和土仓卫生曹长。紧跟在后面追逐似地奔驰的是太田曹长驾驶的车子。在这辆车中，穿着通红的长靴、缠着日本刀的小美野伍长，和接着倒戟刺竹剑的桐原军曹，好像是踩在背手绑着的3个中国人身上进行押送，可以看到很刺目的套在左臂上的白地红色“宪兵”二字。

“就要到了。让你看看我的本领！”

小美野出发前，太田和桐原嘲笑说：“尽管是剑道三段，恐怕也不能把人头高明地砍掉吧！”小美野对这句话非常生气而又没有办法。同时，他也担心杀不好，感到焦躁不安。

车子卷起沙尘，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大道上往南岭疾驶。不一会儿，发出咔的一声，停在齐腰深的草丛旁。

急不可待的小林少尉对一下子跳出来的小美野抬了抬下巴。

小美野对拥挤在狭窄车中的中国人高喊：“下来！”然后抓

住他们的后脖领子拖了出来。

3个人都是经过几十天严酷拷问，饿着肚子，转动着敏锐的眼睛，摇摇晃晃地下来的，但是，急转过来，眼光往四周一扫，6只眼睛刚敏捷地一碰，就感到周围的空气紧张。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喘息声逐渐大了起来，带着压制不住的怒火，厉声喊道：“我国际运输的干（我在国际运输干活儿）！”他步步逼近前面那威然而立的小林少尉。

小林少尉结结巴巴地说着“唔”，后退了一二步。在旁边的太田曹长立刻喊道：“这个混蛋！”朝青年踢去。青年哐的一声仰天倒下，但是立刻站了起来，挺胸瞪着小林少尉。

“支那猪猡，还过来吗？”

桐原军曹用倒戗刺竹剑使足劲儿狠抽下去，竹剑弯成弓的样子抽进青年的肉体。在青年的面颊上倏地鼓起了大大的紫色道子，从嘴角到脖颈淌着鲜血。青年咬紧牙关，“呸”的吐出一口血后，愤怒地哆嗦着想要抬起身体。小美野也呆不住了，突然靠近，像要挫服他似的一脚踢去。随着“啊”的一声，青年一头栽倒在地，鲜红的血从鼻子和嘴里喷了出来。看到血后越发疯狂的小美野还要踢。这时，在旁边的中国人像要把小美野的耳朵撕破似的突然尖声喊道：“鬼子不干（畜牲，别打了）！”

小美野的脚好像一下子被钉住了。对他的暴行不能忍耐的一个40岁左右、有着结实体格的男人，使劲迈着一步。

“畜牲！什么叫鬼子？……”小美野向这个男人的脸、胸脯乱踢去。此时在四十多米远的前面挖好坑的山垣内翻译和小笠原军医回来了。瘦削的身材，洼抠脸儿，在尖尖的鼻子上架着无杠眼镜的小笠原军医大尉，把单薄的嘴唇一张一合，惊慌地喊道：“再不要动手了！弄伤了或是弄软弱了就不好研究了。”

山垣内翻译一边靠近太田曹长，一边接住捆中国人的绳头

说道：“挖坑就挖出四具尸骨，这一带是杀不了少人的地方呀！”

像种猪一样肥的太田曹长环视一下四周说道：“据说建国^①时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中国人被砍头，在哪里挖都是人骨。”

小林少尉高喊道：“喂，从那个年轻的家伙开始收拾！”然后与小笠原和土仓一起走向挖坑的地方。

小美野走近那个要把流出来的血弄掉而抖动着头的青年，连续使劲把他背着的手往上反拧，猛推到挖坑的地方。

四具尸骨令人厌恶躺在坑前。坐在那里的青年，用力抬起满染血污的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沉下去的夕阳。被这种平静姿态所威压，太田和桐原一边以嗤笑掩饰尴尬，一边看着小美野，小美野想起出发前的话已经失去平静，突然拔出日本刀，在小林的脸旁说道：

“少尉，可以干了吗？”

小林看到小笠原军医和土仓卫生曹长拿出各种解剖器械，便慢腾腾地走近那青年。青年刚一站起来便“呸”的向小林吐出一口血痰。

小林“呀”的叫了起来，惊慌地踉跄后退，衣服粘上了一块带血的痰，脸上一下子变成土色，尖声高喊着：“这个畜牲！哼，砍！”

步步逼近的小美野，咔嚓一声把青年的头砍了下来，骤然间喷出来的热血染红了草丛。小美野随即把面前残缺的躯体踢进了坑内。他完全因震惊而头脑发涨，血往上涌，对着桐原军曹拉过来的40岁左右的中国人，在刚想说“把这个家伙也给砍掉”的一瞬间，便把带血的刀挥动砍下。

这个中国人重叠地落在坑中青年的尸体上，还没有砍掉的

① 指伪“满洲国”建国。——译者

脑袋扭转过来，每漏出嘶嘶的一点气息，黑红色的血就咕嘟咕嘟地流出来，眼睛死盯着往下看的小美野，带上血的尸骨阴森可怕地排列着。

“啊！”小美野惊叫起来，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拼命挥动着手，总觉得扭转着的那个头颅越来越大，要往自己身上压过来。

“嘿，顽固的狗东西！”

他一边喊叫，一边捡起脚下的石头，发疯似的对准砍口投去。

“混蛋，今天晚上可以下手了！”旁边的太田和桐原互相看着傻笑。

山垣内押着的三十五六岁的中国人，撕得破烂的上衣露出气得哆嗦的红铜色的厚肩膀。

小笠原军医好像在说“这次该看我的了”，指着因血湿得一塌糊涂的地面，吩咐小美野说：“在这里给我铺上草！”

桐原和小美野铺满了草，土仓卫生曹长拿着注射器站了起来。

“叫他在这里躺下！”

小笠原军医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向山垣内和小美野使着眼色。

那两个人高喊：“到这边来！”不管是拖还是拽，中国人的脚都像陷进地里似的一动也不动。太田曹长一面吼着“走”，一面用刀背狠打他的小腿。

从后面被敲打的中国人突然摔倒了。桐原和山垣内抓住他的脚脖子，拖拖拉拉地拽着。被愤怒的中国人砰的一声踢到腹上的桐原，像是要掉进充满血的坑内，“啊”的一声惊叫起来。

“反抗吗？”小美野喊叫着猛扑上去勒紧了中国人的脖子，桐

原拾起扔出去的竹剑，“这个也让他受受！”对准皋丸狠打下去。

中国人“喔”的低沉呻吟，急速蜷曲身体，忍受着痛苦。在小笠原军医的暗示下，小美野、桐原、山垣内、大田四个人像被弹起似的扑上去抓住了他。

在被卷起衣服的右腕静脉上，扎进了闪着银光的毒针，小笠原军医的纤细手指在微微的颤抖中推进了。3秒、5秒……毒素一会儿便浸入了体内。

男人“呜呜”呻吟着，愤怒和痛苦使得他嘴唇哆嗦、痉挛，逐渐苍白起来。用冰冷的蛇一样的眼睛死盯着他的小笠原军医，用眼神向土仓曹长示意，像是对小美野说让那男人张口，拿白色纸包蒙住脸。小美野在紧咬着牙不张口的男人嘴里插进棍子，企图撬开，土仓把白色粉末毒药倒了进去。那个男人的痛苦达到极点，疼得弯曲全身，想要压制腹部和胸部的痛楚，拼命反转手背，但是每用一次力，反而使麻绳深深陷进手腕，从紫色肿胀的地方渗出血来。

军医的薄薄嘴唇上浮出冷笑，一面看守着这个男人，一面看着表。25秒、30秒……男人咕咕地想要呕吐，哇的吐出血来。他喘了一口气，用闪光的锐利眼睛盯着军医尖声喊道：“鬼子！日本鬼子！”头发一根一根地倒竖起来。四个宪兵苍白的脸互相望着，惊惧得呆立不动。

中国人痉挛地抽搐着身体，完全不动了。

小笠原军医想要用手术刀从胸部切到腹部，但是因为忘记带来大型手术刀，稍微犹豫了一下，一边对小美野说：“喂，用刀把这里给我切开！”一边用手术刀啪啪敲打着中国人的胸部。

小美野用带血的刀在乳部的上端噗哧扎了进去。小笠原操作的手术刀噗哧向腹部切了下去，接着，从相反的方向再切。然后小笠原军医带上白色的橡胶手套，开始把腹部切碎。

夕阳已经沉没，天快要漆黑了。在土仓准备好的蜡烛照耀下，6个人的脸色紫黑，抽搐，痉挛。军医伸手把切开的肋骨咔嚓咔嚓地拆下来。骨头下面那满是血的内脏，在蜡烛的亮光下陡然露了出来。军医轻易地插进两手，在当中搅弄了一会儿，取出红黑色像血块似的东西，在发红的眼睛前出示道：“这是肺脏。”在熏人的血腥臭味中，6个人不由得把军医的脸和橡胶手套上托着的肺脏相比较。在挺直的尖头便帽下，笑得像抽筋一样的发青面孔，并不是人的形象，而是一只带血的野兽。

咕噜一声咽下唾沫的桐原尖声喊道：“混蛋！刚才还那样讨厌地胡闹，现在就老实了。”

“请您再把别的地方给我看看，军医先生。”小美野装腔作势地喊道。但这个声音却像卡在嘶哑的嗓子里。

军医把肺脏砰的一声扔进血坑里，又用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在肚里开始搅弄。

没有一声咳嗽，在令人难受的沉默当中，只听到咕噜咕噜搅动内脏的声音。胶皮手套突然停止，军医激动地声音发抖地尖叫：“活着！”小美野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不由得往坑内望去。

但是，在成为血海似的坑里，惨白的月光照耀下，只是躺着两具惨死的尸体和四具骸骨。吓得打了一个冷战的小美野，耳里听到不知所措的小林少尉的声音：“什么活着！傻瓜。”

“哈哈……”太田曹长突然发出茫然失措的笑声。

“军医先生，断气已经20分钟啦，还有那种荒唐事吗？”他勉强大声喊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还活着。你看这个！”军医指着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的心脏。

“嘿，的确在动！”14只眼睛恐怖地战栗着。在朝鲜和中国

东北有20年宪兵侵略生涯的浸透着很多人鲜血的小林少尉脸色黝黑，毫无血色。7个人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眼睛所看不到的中国人的反抗力量，都不作声，好像被迷住似的盯着那心脏。

“啊，回去吗？”桐原说。大家像被弹起来似的正要活动。

“稍微等等！平时也需要一个星期的解剖，现在再干一会儿。”军医又蹲下来，把手伸进尸体肚皮里。

“你们是砍活着的人头，而我可是玩弄死的人。嘻嘻……”笑着的小笠原军医的脸，在蜡烛光下像恶魔一样晃动。

“噢，这是膀胱。”“这是肝脏。”“这是胆。”

在军医手中接连不断切割的这个中国人被脔割了。

周围充满血腥气，累至的夜色把这些魔鬼紧紧地包围住了。

“该回去了吧！”

难于忍受的小林少尉给山垣内使了一个眼色，向东方走去。军医仍然固执地想要干下去，但是因为大家都想溜掉，只好遗憾地轻蔑地看了一下。

小美野、桐原拖着腿，把割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急忙把土盖好，象逃跑似地回到汽车里。

“喂，开足马力！”

载着鬼子们的汽车在灯光闪烁的新京街头疾驶着。

旧部队名：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队二大队本部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战争嫌疑犯被拘留的时候所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当时的上司和同事的具体描写，也许有欠准确的地方，谨在此表示歉意。

但重要的是，我在任职的时候，对很多的中国人曾给予难以言喻的困难和痛苦。现在想起来实在抱歉。我在表面上老实，

但在内心却想，这都是在长官的命令下干的——并没有谴责自己的心情。

中国的谚语说：“牵牛到河边是可以的，但是强撩住牛脖子喝水是不行的。”

当时我想，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自我宽慰，因而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战争。

现在，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由衷进行反省的同时，我认为必须制止再次引起战争。我本身也打算要为曾经受过苦的很多人们，为了和平，贡献自己的余生。

小美野义利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群 鬼

——取被捕农民的活胆

藤冈顺一

（股长 警佐）

被悬崖峭壁所阻断，曲折的山路急剧向右拐去，眼前明亮地开阔起来。平缓地往上倾斜的村公路隔开北边的山麓和南边的梯田，成为弓形，大大地弯曲延伸着，消失在东南方重叠的秃山之间。四五天前下的小雪像被刷子刷过似的聚集在山麓，露出漆黑而荒芜的大田地表。

这一带是本溪湖东南方约10公里的山岳地带，是从所谓宝库的东边道前往三角地带的岫岩的交通要道。重叠的高山成为自然的城墙，易守难攻，完全是为游击战设置的坚固城堡。

沿着这个村公路，从头顶到脚尖都是黑色的伊藤警察队，由于连日行军，精疲力尽，脚步沉重，把枪当作扁担，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慢腾腾地走着。也有人在腰里挂着西洋式军刀，再在背上背一把日本刀。

1936年2月上旬，为了防止东边道以及三角地带蜂起的抗日联军的汇合，想要进行夹击，调动在安奉线^①各站盘踞的警察队和进入这个山区的关东军奉天警察署伊藤警察队，乘着村人庆贺春节的时机，由村落到村落进行袭击，逐个践踏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从早上就阴着的天空已完全被雪云笼罩了，山和树林都被灰色的烟雾覆盖着，看不太清楚，尽管还是下午3点左右，可是已经像傍晚的时候了。

我在昨天晚上喝白酒^②过量，醉得两腿摇摇晃晃的，接着时时作痛的肚子，可是神经却非常集中，盯着离开队伍两米左右、走在斜前方的一个中国农民的身影。他挑着五六个很重的大口袋，往前弯着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地面默默走着，那神态像是过度忧虑着什么似的。

“那个家伙果真是密探吗？还是象他一口咬定的是农民呢？”我感到有点疑惑。他看起来像是40岁上下，有结实的体格，像是握着锄头接连劳动过来的人，有满是大硬骨节的手，在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一双善良的眼睛，在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陈旧的帽子和补缀的棉衣浸透着土腥气，怎么看也是那种为每天生活所迫而刻苦投入全部精力的一直在种田的农民。

“是的，这个家伙的确是农民。可是，一旦捕住就不能放过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密探，无论怎么说，只有拷问和死在等待

① 安奉线即今丹东至沈阳的铁路线。

② 是日本酿造的白色甜米酒。

着他。那个时候，我虽然因为肚子痛而不能分得功劳，但是，作为弥补，在拷问的时候不是还可以参与吗？……尽量在现在这个时候想想妻子的事情吧！”我一面嘲笑，一面像在网里期待着食饵的毒蜘蛛一样，眯着惺忪而充血的醉眼，望着那农民的身影。

那是今天早晨10点前后的事了。我们沿着山麓的道路，从枝叶整齐的松树林木之间来到有七八户农家的村子时，小队长威风地挺立在足有两搂粗的老松树根下，发出了“一齐搜查！”的命令。红色的春联在每家的门旁或门板上贴得很好看。像焦急地等待着欢乐的春节似的这个安静的村子，一瞬间被狼一样突然扑过来的日本鬼子所蹂躏，门和门板被踢开，窗子被打破，家具等物被随手破坏，喜庆的春联也被撕成碎片，散落在院子里；被脏鞋所践踏，预知凶恶的野兽来襲的村民已经逃走了，我们便把所有的屋子逐一破坏。正当我们想要撤走的时候，四五个人以功臣自居，连拉带扯地把一个农民样子的中国人带到公路上来，然后在2月的寒天里光溜溜地加以殴打拷问，百般折磨。

“你是密探吧？”

“喂，坦白吧！”

那农民顽强地不断说着同样的话：“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久松分队长怒道：“好，那么你背上这些东西跟着来吧！要是逃跑就枪毙！”他强迫那农民背上塞满掠夺品的口袋，一走慢就猛推，一直拉到这儿来。

我一边想着这些情况，一边盯着那农民，那农民突然转过身来，视线相遇。他惊慌地把视线避开。看到这个样子，我吓了一跳。“混蛋！窥伺机会吗？想要逃跑吗？好，要是逃跑就逃

逃看！先开一枪……抓住逃跑的家伙也是大功劳，拿枪打死了就不能拷问了。不管怎样，最好先瞄准脚。杀死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我心里这样打算着，肚子疼痛也完全忘记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得意，等候着那个机会。

道路再次弯曲起来，上了山中坡道，到了陡峭的半山腰时，听到“大休息”的命令。大家都选择个合适的地方，随意拿着枪坐下来，开始吸烟。也有因过分疲劳而睡在道边上的。那里一侧山坡像被切开似的可以看到红土的表层，形成墙壁，略微平坦而宽阔的空地是适宜的休憩场所。

分队长、警察部长久松和小队长正畅谈着什么，突然站了起来，走近成为墙壁的山崖边，注视着撕破秃山而形成的深邃的洼地，显出专心考虑什么事情的样子。不久，便像拿定主意似的把叼着的烟还未吸完就吐的扔进了洼地，向蹲在部队后尾的农民举起手来呼唤道：

“喂，到这儿来！”

农民正在想着什么，没有任何警惕的样子，大步走近分队长旁边。

“分队长这家伙又要拷问了！这家伙有意思。那个混蛋也许要逃跑。好，要是逃跑就开枪。”我这样想着，一下子拿起枪，跑了过来，想不到七八名同事手里拿着枪早已围了现场，筑成一堵无处逃跑的人墙。

“坐在那儿！”

分队长抬了抬下巴，向洼地的尖端示意，农民用探寻似的眼神看着分队长，他突然说：

“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又把东西搬到这儿来了，就让我回去吧。我怎么也得回去呀！”他一心要求回去。

“喂，想回去吗？要是想回去就早一点说实话吧！怎么样？”

你是密探吧？喂，快说！说是密探。”

分队长转过胖墩墩的不倒翁似的身体，歪扭着黝黑的脸，露出一大排镶金的不整齐的牙齿，像“祭神舞乐的狮子”那样，大声逼问之后，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了一下周围的我们。“这小子要干什么？”我这样想着。他推测着大家的心情，显出得意的样子，眯着残忍的眼睛呆看着。要想随意指使鲁莽的部下，最重要的是使他们吓破胆子。他想发挥自己的残忍性的时候，总是叫人看见那阴惨的笑容。

果然，这个家伙迈出一步，猛抓住农民的左手腕。

“混蛋！还不坦白吗？”他象狗吠似的叫道。他在刚拉起来的时候就用力把对方的胳膊往后反拧。

“呜呜……”那农民发出痛苦的呻吟，被拧得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地痛得浑身乱动。

“我是老百姓。你说我干了些什么啦？为什么非对我这样呢？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他不断地呼叫。

“这个家伙是顽固的东西！还不说吗？媽的！也要这个吗？”分队长朝那胳膊痛得受不了而微微颤抖的农民的肩头，又不断地用脏鞋猛踢。农民把痛苦得扭歪的脸拼命转向后边。他瞪着充满愤怒和憎恨的泪水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分队长厌恶地瞪着他的脸。

“混蛋！越来越不想说啦！好，叫你看看！”分队长把拧着的胳膊松开，突然拔出腰里的日本刀，明晃晃地指着农民的眼睛。

“怎么样？还说谎吗？这次可是这个啦！这次只有坦白啦！”他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按着农民的头往前推去。他嗖的把明晃晃的刀抡过头顶，狠狠地大声喊道：“说呀！”

凄惨的杀气像送出的电光一样飞快地射入人们的肺腑。一

瞬间，瞑目的农民睁开勃然大怒的眼睛，转过头来说道：“魔鬼！我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记住这个仇恨！”他牢固地握着拳头，极度愤怒，抖动着身体，瞪着久松。他眼泪已经干涸，目光炯炯，像要穿刺这群杀人鬼似的闪耀着。他样子可怕，好像马上就要咬断人的喉咙。

久松全身受到这种锐气的压迫，发出低低的呻吟声，摇摇晃晃倒下去似地砍了下去。一下子被喷出的鲜血顶起来的头颅，飞出三四十厘米，随后划成半圆形倒转过来，猛然睁大燃起仇恨烈火的眼睛，好像要把那群杀人者一个一个刺死似地瞪着，突然向洼地落去。

我好像听到落下去的头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刺骨的寒气使我清醒过来。

久松分队长脸色苍白，像擦试冷汗似的用衣袖抚摸着脸，一只手提着滴血的亮晃晃的刀，放心地直立着。

这时，分开人墙的小队长麻泽警部补^①慌慌张张出现了。他油光的脸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着细长的残忍的目光，进来之后首先对着久松心满意足地笑着，然后不管不顾地走近尸体，拽着脚从洼地的边缘拖拉拉的运走了。要干什么？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睬也不睬，像要遮挡住尸体似地弯着腰，很快解开尸体的棉衣，露出胸膛之后，一眨眼工夫拔出了军刀，从胸部到腹部直着切开，接着沿下部肋骨横着切进去，用手和刀撕下肉来，剥下沾满血的淡黄色脂肪和肉，露出白色的肋骨。

在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的时候，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黑红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① 警察职级之一，地位次于“警部”的警察。——译者

是呀，这些家伙的目的原来是这个！疑云久久笼罩着头脑，现在突然被吹跑了。虽然逮捕了却放置不管，不捆上绳子而叫他当苦工，本应夸耀“功劳”却连本部也不报告，而拉到深山里面，仅仅在休息的时间就慌忙杀害……一切缘由就在这里。是呀，这是为了偷偷治疗淫荡腐败生活中得的恶性疾病，是为了过更加糜烂荒淫的生活，满足丑恶的欲望……只是为了这个而干的。

眼望滴着仇恨之血的人胆，心满意足地微笑着的小队长，撕开农民的衣服，把它包上，再用白色的毛巾裹好，随便放进口袋，把带血的刀擦完收回刀鞘，才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环视一下大家的脸。

“别在那里发呆，来帮忙！”他一面骂着，一面开始拉尸体。吓了一跳的我们，慌忙跑上前去，把农民的尸体拉着扔进深深的洼地。

小队长环视了这一带之后，想早点从现场逃脱出去，用嘶哑的嗓音高喊道：“准备出发！集合！”分队长擦擦着发青的脸，被什么东西迷住似的走了起来。

我曾经听到过取胆的话，可是为了取活人胆而杀人的这种事情不但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今，我也实际上一起砍头，一起切取了活人的胆……不，是为了取活人的胆而惨杀人！魔鬼——是的，完全是魔鬼！

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农民最后的叫声和闪耀着愤怒、憎恨的炯炯目光，仍留下了活生生和深刻印象。啊，那个农民的仇恨，再加上紧靠着那个被残酷杀害者的尸体而哭叫的遗属的满腔仇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房，惭愧得心如刀绞。我从心底非常憎恨我的过分丑恶的过去。

说到警察，在日本从很早就受到国民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这样想。但是，这完全是意料不到的错误。

现在，我还想有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把日本的警察在日本和中国所干的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暴露在人世上，要求必须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可耻的行为。此外，我就是死也不会再重复过去的罪恶了。但我也必须告诉晚辈，劝告他们，再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并且，在亚洲想再重复这样的罪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从全世界根绝侵略战争，特别是根绝和防止灭亡人类的原子战争，我认为必须倾注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简 历

学历：初中毕业

出身：小资产阶级（商店店员）

出生地：新潟县

旧所属：伪满奉天省警务厅经济保安科

年龄：49岁，笔者已去世。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谋 杀

——借口预防注射的毒杀

中岛宗一

（委任官）

铺着白瓷砖的地板用水洗得很干净，四面的电灯把大手术

室照射得通明，在中央的手术台周围，那全身穿戴着雪白的帽子、手术衣、口罩的两位大夫和几位护士小姐，是正在拯救受病菌毒害而濒死的重症患者生命的科学家及其协助者。全力以赴的紧张空气充满了室内。

手法熟练的护士小姐依次传递手里接到的刀、止血钳子、镊子、纱布等等，手术敏捷地进行着。在大切开的胸部露出的心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胀一缩的情景。

这里是武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为了学生的实地学习，手术室的顶棚是圆形玻璃盖的，从上面可以看到手术的情况——这是一种教室。我们靠近，屏住气息，凝视大夫精巧动着的手指。

“这是在手术中最为困难的心脏部分的大手术。”听到给我们作向导的护士小姐这样低语，我清晰地想起11年前的一件事情，自责的念头不由得冲击着我的胸膛，心如刀绞。在齐齐哈尔市全福胡同，有一所挂着北满资源调查所牌子——粗体字写成——的房子。从正面出入的人不多，在后门有时可以看到出入的人影。不知真相的人，总觉得这是一所冰冷凄凉的房子，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幢房子原是黑龙江省地方保安局军官宿舍，现在充作黑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特别搜查班的工作室。

1945年6月中旬的某天，我在这幢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和同事中的黑龙江省地方保安局第一股股长委任官表胜、委任官荒木彻志、岩木清人、福津精治、大仓参次，以及警务厅特务科警尉小林芳郎、成田正一等一起，在有些不平静的轻微兴奋中，预想今后会出现的事件而热烈谈论着。

“龙江省的成绩上不去，莫非都在睡觉吧！”在中央的督促下，特务科长齐藤润吉叫来了科员河野明，进行了申斥和鼓励。顺次轮班，担任这项工作的该第二股股长荒木了。

“快点搞个什么事件！”河野催促着说。如果不搞个事件，不但有关成绩，对于获取工作费的预算也有影响；不仅不能搞豪华宴会，对于河野来说，还面临着不能养活在龙江饭店用女招待名义窝藏着的小老婆的切身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制造一个事件。这样，根据荒木的情报工作，就出现了所谓“苏联在满谋报工作员”的案件。在1944年初，齐齐哈尔市逮捕了一个30岁左右的朝鲜人。

尽管用吊起来、灌凉水、殴打等刑罚连日连夜地逼迫招供，但是，那朝鲜人嘴里吐露不出这样的事实。荒木害怕他的计划落空，发疯似的更加残酷地拷问。但是，不论怎样拷问，这个人都不屈服，坚持说这没有事实根据。在他前面，荒木已很快地感到束手无策。荒木把那朝鲜人受到残酷拷问而受伤、身体极度衰弱当作好事，仿佛认为“就这样死去反而倒好”，没有予以任何治疗，扔在单人牢房就不管了。朝鲜人不屈的气魄使自己肉体恢复了健康。

此后，对于这个朝鲜人的处理，荒木同河野和齐藤商议过。由于已经作为重要嫌疑犯报告上去，也有体面的问题，还希望找到什么更好办法，但是从科长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指示，不能一直关在保安局的单人牢房，只好又把他转移到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的拘留所去。这样也有一年多了。

特务科长更换，中央保安局的科员春口宗男作为新任特务科长到任了。那时，正是日本处于最后紧要关头，盛传将在日本本土作战。在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也进行得越来越公开和活跃。预料到由于苏联参战而出现的紧急局势，日本急于加强镇压人民。这是1945年5月底前后的情况。春口办完事务，遍访了有关各机关，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6月中旬的某天，在保安局官厅的事务官室，听取了河野和荒木的报告。

“警察局急于清理拘留所，催着要赶快处理这个家伙，怎么样？和科长谈谈对他的处置吧？……”荒木对河野小声说道。

春口问河野：“什么事呀？”

“老实说，有一个人很不好办……”

河野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把责任都推到前任科长齐藤的身上，报告了这个案件从逮捕到今天的经过。

“这样一来，事到如今，打发也打发不了，又不能解送。”河野感到为难地说着。

“还说什么！他们打算把这件事还拖到什么时候？”春口责问道。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总拖下来，打算早早处理掉算了。我好几次和科长商量，但是无论怎么说，科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所以就……”河野稍微看了一下荒木的脸说道。

还没有听完河野辩解的话，春口就好像是被人看到他气量大似的下了指示：“好，我负责，马上就干掉！”

“荒木君，科长这样说了，就要赶快去办！”河野用兴奋的语气回过头来看着荒木说道。

“要是干掉，那用什么办法才好呢？……”他又自言自语道。

“怎么样？使用过去的注射办法试试看！”荒木提出了早就想好的计划。

“注射吗？唔，那也很有意思呀。我从元吉科长那里听到过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宣传，究竟是有多大效力的东西呢？试一下看看也好嘛！”由于春口赞成，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决定了。

所说的这种注射，是1938年4月的事。那时，随着中央保安局的成立，担任防谍工作的第三科设立了“特别室”，研究试制在跟踪、谍报、伪装、变装和爆破、防火等活动中使用的器械、药品。到了1941年，特别室扩大成科，成立第八科，聘请

东京帝大医学院毕业的元吉为科长，录用了几名高等工业应用科学和药物专门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研究和试制向来用于阴谋策划的杀人注射液、麻醉药、催眠剂等各种毒药。并且，委托奉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几名医师合作研究。就这样，在这里极其秘密地制造了各种药物，分发到地方保安局去使用。

被铃声召唤，我到了事务官室，当时，他们三个人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实说，是处理一个朝鲜人的问题，也想请你帮帮忙。”河野对我说。

我代替荒木担任第二股股长刚到任不久，听到河野这样说，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还没有交接完毕，所以，关于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谈……”荒木于是简单地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是吗？那就干吧！”我高兴地接受了。

为了让那个朝鲜人在打注射针的时候老实一点，不得不对他进行巧妙的欺骗。荒木对他说：“明天解职，决定让你回朝鲜。但是，现在传染病正流行，必须进行预防注射，否则不能乘火车，所以必须打完针后才能出发。”这样一番，那朝鲜人同意了。为了防止泄露秘密，注射在旧保安局军官宿舍内进行，到场者只限部门的有关人员。注射由曾经担任过卫生兵的戚出来做。具体问题就这样商定了。

“可千万别出错！”在河野交代完之后离开事务官室的我和荒木，面对面傻笑着小声说道。

“明天可有意思了！”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旧保安局军官宿舍等着把那朝鲜人带来。

“怎么啦？怎么费了那么大的事！……”荒木等得不耐烦，

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围着屋子转。

“嗯，该来了吧。”我也站起来，透过窗户眺望着街头。

大陆特有的夹衣季节很快地过去，一下子暑热来临，午后两点钟的太阳今天也像是火烧似地照射着大地。拉着客人跑的人力车夫，脸上充血，通红通红的。

“来了！来了！”出去了解情况的神津的声音，使我们慌乱起来，曾经商量好的准备工作似乎混乱了。看到额头上出着汗进入屋内的志村，荒木等不及地说道：

“怎么啦？很费事吗？”

“一走到外面，那家伙就脸色苍白地倒下了！”志村一边用手绢擦汗，一边开始谈起那朝鲜人的情况。

根据志村的报告：昨天荒木对那朝鲜人宣布“明天释放”，晚上他就几乎没有睡觉。今天，从早晨起，他就注意外面什么时候来接他，坐也坐不住。带他走的志村等两个人陪伴着他，他很精神地走到屋外。不过，走了几米，他就晃晃悠悠地东倒西歪起来，一下子就像喝了似的摔倒了下去。

他坐在太阳光照不到的微暗的单破牢房里，一步也不许走到屋外去。过了一年多，突然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一时痉挛不住而出现脑贫血。

“经常说的无精打采这个词，说的就是这样。人是格外脆弱的东西。只一年左右没有晒到太阳，就成那样了！”志村一边傻笑着一边这样说着。他突然又严肃起来。他说：把那朝鲜人抱到军官宿舍里，泼上冷水，让他稍为休息，担心他是否能活动，就申斥地问：“你这样回得去吗？”他紧咬着牙站起来回答道：“没有问题。”

“一心想要回去的家伙是很担心的呀！就是那样，也还是要回去！”

志村奇怪地补充道。

“是吗？这个家伙看来是完全相信能够回去了！”

荒木对着我的脸傻笑。我也笑起来，大大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正经地问志村。

“因为他太难受了，正让他休息。”

“快一点叫他去舒服不好吗？还不开始吗？”我和大家商量着说道。

“哈哈，让他舒服去吗？那么带他来吧。”

在荒木指示下，志村出去了。

“喂，科长先生，好好干呀！”他嘲弄似的从外面喊着，伪装成科长的我，体会到一种滑稽心情，一屁股坐在铺着擦布的大桌子前面的转椅上，俨然一副科长的样子，伺机行事。

砰！砰！砰！敲门声。

“嗯！”随着我漫慢的回答声，那朝鲜人被志村抱着似的进来了。

“这是科长，想要和你谈点什么。”我装着好像是以我为中心正在开着什么会议似的，荒木在当中告诉站着的朝鲜人。朝鲜人听到荒木的话，对我恭敬地低下头来。我对他抬了一下下巴说道：“你坐下！”他坐在志村拿出的椅子上，仍然不停地喘着气，痛苦地大口呼吸着。

在我前面的他，高高的身材，健壮的骨骼，使人感觉到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健康的。现在看起来，颧骨高高地突出，眼窝塌陷，在宽阔的额头上垂下来的头发蓬乱，红褐色，完全失去了光泽。

“我想，荒木君已经对你说过了，调查的结果，搞清楚了你没有嫌疑的事实，因此决定今天释放。”我装模作样地说着。他凝视着我的脸。我和他视线相遇，不觉又有那种滑稽的心情。我

对他露出安慰似的笑容，说道：“长期的拘留给你带来了不幸呀！”

我想，自从用没有事实根据的罪名加以逮捕，一年有余，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也没有向谁申诉的办法，充满怨恨和苦闷的长期狱中生活，只用一句安慰的话是不能消除他所受的那种程度的痛苦的。但是，想到现在就要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他相信这一点，那种痛苦和怨恨便好像能由于今天的喜悦而抹掉。他用无言的微笑回答了我的谈话。

“听说你想回朝鲜去，回去打算干什么呢？”

“是的。因为家里是干活的农民，我也想回去当农民。”

“噢。那么，你们家几口人？”

“妈妈和妻子，再加上孩子，有三口人。”

“是吗？那个孩子很让你挂念了吧？”

处子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命运的境遇，怀念那等待丈夫的妻子、盼望父亲的爱儿，悄悄流着的眼泪濡湿了枕垫。处子安眠之夜不知有多妙！现在，可怜的妻子不久就能够会面了，他的眼睛闪耀着生气勃勃的光亮，他的思念飞向了遥远的故乡。他透过窗子盯视着空中的远方，不由得稍微叹了一口气，轻轻点了一下头。

“你没有旅费吧？虽然少了一点，你就拿去吧！”从河野那里拿来的准备好的10元钱一沓，200元钱，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来，我当面交给了他。他惊异地直盯着我的脸，畏缩地后退着。荒木对他说道：

“是科长特意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还是收下的好！”

“谢谢！”

在荒木催促下，他从我手里接过钞票，放在膝上，用两手摸弄着，从俯视的眼里，喜欢的泪水一滴一滴把这沓钞票都弄

湿了。我看到这个样子，和同伴们一起在现场久坐，细看这个逐渐钻进圈套的即将被捕获的东西，像不断舐着舌头的魔术师那样，心中暗自高兴，一致点头会意。

随着一阵砰砰敲门声，没有等里面回答，大仓就进来了，向我报告说：

“科长，请的大夫来了！”

“是吗？已经请来了吗？在哪儿打针呢？”荒木和我商量似地说道。

“马上就完，就在这儿吧！”我说道。

“那么就领大夫到这儿来吧！”荒木对大仓指示道。

由大仓领着进来的成田，穿着白衣罩衫，戴着口罩，一只手拿着注射器。“呀，您辛苦了！”我致意道。他沉默地轻轻点了一下头。

“那么就请快一点吧。”荒木催促着说。朝鲜人把手里拿着的钞票很郑重地放进上衣口袋，脱却了因有污垢而连条纹也看不清楚的衣服，把已经磨破仅有残余样子的衬衫袖子卷了上去。

“不用站着，坐下也可以！”成田不叫他站起来，仍旧让他坐着。

“那么，借一下您的桌子用吧！”他说着，在我前面的桌子上伸出了手臂，开始用脱脂棉擦拭。一下、两下……在那被污垢弄得看不清楚本来面目的胳膊上，显现出苍白的肌肤。在肌肤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大的静脉。在静脉上，猛一下子扎了进去。刚一扎进去的时候，他意外地看了一下成田的脸，什么也没说，一动不动的。

一秒、两秒……我们用眼睛把注射液量的减少和他的脸颊慢慢地进行比较。注射液还没有减少到一半，他“呜”的低沉呻吟着直立起来，突然当场朝天仰倒。

在屋外偷看情况的人蜂拥跑来，和我们一起围上了他，注意看他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样子。

“呜！呜！”他横眉立目，从嘴里吐着白沫，呻吟着。

“喂，快点！快点！”荒木害怕呻吟声音传到屋外，慌忙大喊着。小林抬起一只脚，用脏鞋踩上去，堵住他的鼻和嘴。

“哈哈，看样子好像是完蛋了。”

看来，他连哆嗦一下都不行了。小林收回踩上去的脚，露出咬紧的牙齿，看见了那副惨相：往上翻着眼睛半开着，唾沫泡和土玷污了面部。

“特意叫你早一点去舒服一下吗？露出这么怨恨的叫人害怕的凶相！”小林说着，呸的吐出一口唾沫。

抓到了很大猎物的猎人，沉浸在兴奋之中，在尸体前畅所欲言地谈笑着。我们连话也说得厌烦了，在全关闭的屋子时感到暑热突然袭来。

“喂，冰镇啤酒等着呢！快收拾！干干净净地来一杯！”我督促大家着手处理尸体。

我们把尸体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之后，到委托医生那里，让他写好注明是心脏麻痹致死的验尸证，叫来了市卫生队，就要送火葬场去了。

“闻到给阴曹地府送礼的钱的气味了！”我们这样说着，从死者口袋里抽出泪迹未干的钞票，塞进腰包，抢先跑到外面，拥进街上的高级饭馆。

于是，“为庆祝赫赫战果，干杯！”我们忘记过了多少时间，发疯似的一边喝酒一边敲敲打打，喧闹了一个通宵。

日本的医学在世界上仅次于德国，高度发达，我曾经引以为荣。但是，我所夸耀的医学，现在在我的眼前，却不是用这种力量救活处于濒死境地的人，相反，像用我的手所做的那样，

是杀害本是身体健壮的善良而和平的人。在中国，现在正期待用10年的时间消灭地方病，并倾注全力进行扑灭细菌的科学的研究，而我们的医学却是培养细菌以促进传染病流行的医学。

简 历

原籍：长野县下伊君子郡

出身阶级：农民

最终学校名称：南信学院二部毕业

学校毕业后的职业：农业

最后所属：黑龙江省警察厅特务科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10月8日，齐齐哈尔市白济工厂。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搞阴谋，送便侵略者贫困自己的利益、侵犯其他民族而惯用的伎俩。

当时统治东北三省号称精锐的张学良军队，就在一夜之间就受到铁道守备队少数兵力的毁灭性打击。满洲事变^①的起源——柳条沟事件就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他们甚至指出引退的清朝末代皇帝。用那皇帝，以“日满一体”、“三德一心”、“五族共和”为建国大计，以建设“至道乐生”为目标，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帝国在那陷入贫穷和军阀压制的困境中的东北三省，伪装成救世主的模样，可是，在这背后却建立了731石井细菌部队，并以“反满”、“抗日”、“盗匪”、“间谍”等罪名逮捕了很多民众，不经审讯就作活人实验，反复进行残害，这就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是关东军。

如果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那么，我作为它机构中的一员，从1932年起担任“满洲国”警官，迈入侵略中国的行列，直至日本战败，13年间大部分是过着特务警官的生活。我对善良的居民使用阴谋手段，把他们培养成密探，操纵他们，玩弄权术，把中国人民投狱杀害，等等，我是一直埋头于这些阴谋工作的。

1956年，我作为中国在押战犯，从拘留到缓期起诉，终于回国。当时，使我最感痛苦的事情之一，是见到带有星条旗徽记的在空中飞行的军用飞机，见到乘着吉普车到处跑的美国兵。一旦有事之时，他们果真会为了我们日本国民而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吧？我不得不抱有这种深深的疑虑。

1945年8月，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满洲，关东军以执行作战计划为借口，“不战而暗堵盟军齐向朝鲜国境进却，铁道全线不通，开垦团、少年义勇队和日本大将流离失所；为此自杀、饿死、得传染病而死亡的不计其数”。今日中国的日本遗孤问题就是因此而带来的。对同胞尚且如此残忍至极，对原来的当地居民那就更加恶毒了。例如：为了阻止苏联军队的进攻，听说计划炸毁松花江大坝。如果这个计划实现，那么，吉林、长春两市市民中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将会被全部吞没，这种结果不是很明显吗？日美安全保护条约，美军的核保护伞，对于我们日本国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通过本身的体验，不得不强烈反对。

我当年在苏联拘留时，从一个苏联人口中听说，“不论是什么国家，只要留驻别国的军队，就绝对不会带来和平。”这样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年轻一代的人们，必须警惕统治者的阴谋！

中島宗一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侵华日军在敦化遗留的 废、毒弹及处理

王义杰 王仁学 陈延生

自1931年9月23日，日本关东军天野旗田清水支队，从吉林经蛟河侵占敦化时起，至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入敦化，日军投降为止，敦化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煎熬了整整14个年头。

日军在侵占敦化期间，曾先后修建了许多军用设施。1938年5月，首先在城区西郊原国民义地修建了一个永备机场(西机场)并修了一条铁路专用线。1942年，在敦化沙河沿又修建一个大于西机场的永备机场，亦修了一条通大桥车站路专用线。1944年还在营地位的八棵树、秋梨沟、龙蒲梁河三处各修建了一个野战临时飞机降落场。在敦化北山、小山嘴子535.5高地上，日本人修建了炮台，小山嘴子山上配置的是要塞炮，口径为240毫米，因此535.5高地亦称炮顶子。

同时，日本侵略军在敦化还驻有重要指挥机关和大量部队。据资料记载，日军投降前，敦化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第139师团约2万余人，指挥官是富永恭次中将，所属各部主要分布在沙河沿和敦化城内。此外，还有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8大队及满军两个团。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将他的司令部从牡丹江市

迁至敦化。同年8月下旬，在敦化神社（现农机公司一带），喜多诚一率僚属及两个师的兵力向苏军及88独立步兵旅分遣队（原抗联队伍）投降。

妄图负隅顽抗，运进大批毒弹

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后，日本关东军妄图延缓其注定失败的命运，于1945年4月至1945年7月间，从外地向敦化运来大批弹药，其中大部分是化学毒剂弹。

据目睹者陈延生（原市民政局局长）讲：“当时我是火车司机，经常在图们至敦化区间跑车。公元1945年4月至7月间，日军就从五常、图们等地运来大批弹药，每天约有4列车（每列38节），均运到东机场，存放在河沿屯。东机场专用线以北的山沟里，没有库房，只露天堆放。当时卸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农安、榆树抓来的劳工，这部分劳工在日本投降后，基本上都回乡了。”

据查，日军在秋梨沟站东也卸了大量弹药，主要存放在秋梨沟至河北屯沿途。另外还用汽车向大山、马鹿沟、江东等地运送了部分弹药。这些弹药在日军投降后分散遗留在县内各处，后因各种原因，部分弹药散落到存放点附近的沼泽、草丛、灌木林中。这些毒弹，使曾遭受日军蹂躏14年之久的敦化人民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遭到危害。

仅在敦化，因废弹造成的伤亡人数达五百多人，包括处理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废毒弹伤亡事故。仅举几例如下：

（一）1954年，在搬运毒弹时，有1名车夫和1名民工中毒。

（二）1954年，在挖弹坑时，1名工人被炸伤。

（三）1958年，废委会工人傅立叶，因毒剂容器破裂而中毒。

(四) 同年，处理废弹工人刘洪亮、刘庆阳，因毒液泄露，造成糜烂性染毒。

(五) 1969年5月20日，官地公社官地大队铁匠炉用废弹打铁时，1发105口径的糜烂性毒剂弹破裂后，使在场的工人和社会员9人染毒，经抢救脱险。

(六) 马鹿沟1名村民因在六二三(今三三〇五厂)厂处理废毒弹现场活动，被染毒，腰部糜烂，经抢救治愈。

(七) 1956年，废委会工人因废弹爆炸，造成庄明有、李宝成、张守乘3人死亡，于志一、李万乐2人重伤。

(八) 1958年，因废毒弹爆炸，造成废委会工人孙福臣、孙炳杰、戴吉学等5人重伤。

(九) 1968年，贤儒铁木社工人张祥被废弹炸死。

(十) 1987年，大桥乡办企业的梁××被废弹炸死。

动用大量人、财、物，搜集埋藏废毒弹

为保障我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东北革区决定对日伪时期遗留的废毒弹进行搜集、处理。遵照上级指示，于1951年成立了“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由县长隋振任主任，六二三厂(三三〇五厂)厂长张克文任副主任，成员有田玉才、陈延生、张洪斌、谢树春、杨俊峰、吕文良等人。

敦化曾是日军对苏作战的重要防线，实属战略要地，故日军在此存放了大量的弹药。日军准备对苏作战时使用，所以在清理搜集弹药时发现存放在县境内的废弹中，化学毒剂弹占有很大比重。数量最多的是大桥，其次是秋梨沟、沙河沿、马鹿沟。在大山、尔站、江东、凉水泉子等地也发现了废毒弹，这些废毒弹主要是320毫米、240毫米、150毫米、105毫米、90毫米、75毫米等几种口径的炮弹，其中含相当数量的化学毒剂弹(75

毫米、90 毫米、105 毫米、150 毫米及 500 公斤、800 公斤航弹），多是毒弹，有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全身中毒性 4 类。含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双光气、二苯氯丙申、氯化苦、苯氯乙酮、亚当氏气等多种化学毒剂。普通炮弹多半是分坑埋在地下，一般坑长 7 米，宽 3 米，深 1.5 米，每个坑存放 2 汽车左右，弹箱上盖有油纸和草席，然后用土覆盖。

1952 年秋，吉林省军区后勤部军械科长刘可鞠率参谋张福恒、傅立叶等人来敦化处理日遗弃的废、毒弹。

1953 年，在哈尔巴岭南炮弹沟、四棵杨树两侧的山坡上，由季光明负责，组织二百多名民工，昼夜分班，长达两个多月，挖了一个长 25 米、宽 12.5 米、深 10 米的大坑（土质为风化沙石），将本县境内各处搜集的毒弹（以大拆为主）埋在坑内。这些毒弹分别标有红杠、黄杠、绿杠、白杠。那时，上级一再强调“宁可错埋 10 发炮弹，也不漏掉一发毒弹”，所以绝大部分标志不明、种类不清的废弹也埋入坑内。此坑于 1945 年 4 月间装满毒弹后封顶，坑顶覆盖土 3 米左右，在坑四角各置有一个刻有“日遗毒弹埋藏处”字样的石碑，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号坑。

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是两年处理完，但因毒弹数量大，分散，又都散埋在地下，短期内未能清理完，故于 1954 年 4 月 15 日结束第一阶段工作后军方人员撤回，由县政府废弹处理委员会负责全部废毒弹处理工作。他们先后在各地采取拉大网、钢针探查等办法，又搜集到大量毒弹，并于 1954 年 11 月 17 日至 1955 年 2 月 5 日在原一号坑下方 40 米处，又挖一长 20 米、宽 10 米、深 8 米的大坑。此事先由杨俊峰负责，后谢树春接管。当年埋入废毒弹占全坑 1/4，并简单用土覆盖，剩余部分每年冬季封冻后用爬犁将当年搜集的毒弹运入坑内掩埋。至 1958 年坑内毒弹基本装满，本县内毒弹亦基本清理完毕。之后，用风化砂覆

盖，覆土厚度约3米左右，并将一号坑石碑移过来两个，以标示坑的位置（即二号坑）。

二号坑内，除本县废、毒弹外，还有从沈阳运来的1车皮、梅河口运来2车皮、集安运来1车皮、保康1车皮，计5车皮废毒弹，合250吨左右，有毒弹和燃烧及不明标志的废弹等。

另外，在本县秋梨沟明川村西南山也埋有在敦化北片发现的废毒弹3万余发，坑长5米、宽5米、深4米，也是以毒弹为主。

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于1963年撤销。

1965年至1966年，三三〇五工厂分两次将10万余发废毒弹埋入2号坑内，其中有苏式燃烧弹，也有毒弹。

在处理整个废弹期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常年从事搜集、处理废毒弹的40余名正式工人，每年还需动员大批民工挖、运、埋毒弹，最多时一冬天动用民工500余人。仅1954年冬天就动用大车37台，牛马爬犁40余张，用工3 060个，支出现金17亿多元（旧人民币）；1953年前的第一阶段处理工作中，还动用汽车35辆，牛、马、爬犁50张，运了近半年时间。

（敦化市政协供稿）